烽火完達山

李明顺口述
雷再润整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

烽火完达山

李明顺　口述
雷再润　敕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烽火完达山

Fenghuo Wandashan

李明顺 口述

雷再润 整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5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2 插页：2

印数：1—22,5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慧 责任校对：张金英

封面设计、插 图：秀 中

统一书号：10090·371 定价：0.64元

前言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访问了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基地之一的宝清县。

当车开进三江平原向南疾驰时，那高耸宏伟的完达山横亘天际，遮住了遥望的视线。它郁郁葱葱，莽莽苍苍，绵延几百里，矗立在宝清、密山、勃利三县之间，成为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方，成为三江人民同日寇作战的天然屏障。我望着那烟雾汨汨的重重山峦，看着这一座座披翠挂绿的山岗，宛如离别故乡多年的游子一眼望到了亲人，思潮顿时翻腾不息，把四十多年前在这里燃烧的革命烽火，从记忆的底层一一浮现出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在东北军张作相部当排长，目睹了日寇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出于爱国和对日寇的仇恨，我从叛变投敌的队伍中拉出一排人，插入完达山，同日寇、汉奸展开了血与火的搏斗。

一九三五年春天，赵尚志同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四团来到了宝清，我即率领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二年，四团扩编为四师，我的游

击营也扩编为三十二团，我任团长。先后在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五军参谋长王效明、政委季青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转战在宝清、密山一带山区，壮大了队伍，打击了敌人，成为一支有影响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七年春，日寇为推进其侵华战争，扩大统治地盘，在完达山区开始实行“归屯并户”政策，把山区的人民统统赶下山来，圈在“集团部落”里，用警察或自卫团看守起来。从此，我抗日联军的处境日渐艰难。到一九三八年冬，我三十二团失去群众的支援，供给断绝，队伍里又出了叛徒，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山林里，濒临绝境。在此形势下，我们凭着抗日救国的坚强毅力，突破重围，把队伍撤到了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一路上，且战且行，到达目的地时，仅剩三十五人了。

人少了，但抗日的烽火并未熄灭。我把同志们作了适当安置，就带领一支小部队回到东北，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进行了七年敌后斗争。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十四年的抗日救国斗争中，我三十二团的指战员获得无数次的战斗胜利，享受过胜利后的喜悦；也经受了多少次艰险挫折，倍尝着失去战友、亲人的悲哀与痛苦。正是胜利与失败的交织，喜悦与悲痛的融合，构成了我们抗日到底的决心，鼓舞和鞭策着我们渡过了东北抗日斗争史上的艰难岁月，终于迎来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胜利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十四年的战斗历程，

思念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每当这时，我就总想写点东西，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教育后代，缅怀先烈。但因忙于工作，终未如愿。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同所有抗联老同志一起，遭受了残酷折磨。不要说写革命回忆录，就连参加抗日斗争的历史也被颠倒、篡改，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亲信们鞭笞我、拷问我及至把我关押起来的"罪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和辽宁省委很重视党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在此情况下，我决心在有生之年把我三十二团以及与之有关的抗日斗争事实写出来。应我个人请求，辽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派雷再润同志将我口述的事实，整理成了《烽火完达山》这本小册子。

在我访问宝清的第二年，我爱人周淑玲和雷再润同志再次访问、考察了我三十二团战斗过的地方。我们两次访问，都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宝清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原抗联五军政委季青同志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讲了许多重要的抗战事实，而且对写书提了指导性意见。当年同我一起参加牡丹江战役的姜德同志，在接收宝清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的赵鸿丰同志，带领我去接受鸡西的原东安地委副书记白如海同志，还有光复后在鸡西组建东进委员会的陶宜民同志，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谨此深表感谢！

我已八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所写的事实尽管经过调

查核实，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难免有误。诚望读者，特别是抗联的老同志，予以批评指正！

李 明 顺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DD850/50

目　录

一、上山抗日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日寇妄图变我东北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展开了。九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宣言，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爱国军队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之后，又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人民群众和爱国军队中，组织和发动抗日斗争。在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领导下，抗日的烽火迅速燃遍了白山黑水之间。

但是，在这关系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另一方面，公然引狼入室。就在日本关东军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政府竟然训诫东北各地驻军“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致使沈阳城一夜沦陷，几天之后，辽、吉两省落于日寇之手，整个东北大好河山很快踏遍了日军铁蹄，东北人民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狂嚣：“我们可在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中国领土”。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则歇斯底里叫喊：“我们要四个钟头占领上海，二十四小时占领南京”。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东北军吉林军区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五营二连当兵。我们团驻防在牡丹江南的铁岭河一带。

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东北军广大士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寇决一死战。东北军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一听说日寇占领了自己的家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流着泪找到营长、团长，诉说保家卫国的决心，要求开往前线消灭日寇。我不知道日军入侵东北的数目，后来听说才有一万多人。可我们东北军有二十多万！我想：“没事，日本鬼再强，我们再差，二十个对付它一个，还对付不了吗？”

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日寇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城市，没过几个月，竟然窜到了哈尔滨。这时，士兵们有的咬牙切齿，痛恨日寇嚣张；有的在唾骂蒋介石政府卖国；有的惶惶然为个人和军队的前程担心……这时，我才弄明白，日寇所以进犯得这么快，就是因为蒋介石卖国政府下了“不抵抗”的命令。

“我不明白，外国人到中国杀人放火，为什么不许中国人自卫？蒋介石不许抗日，是不是他得了日本人的好处？”我想不通就问。队伍里也有有文化、知多见广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蒋介石把军队调往关内对付共产党，把东北让给日本人了，这就叫“攘外必先安内”。啊，原来是这样！从此，我逢人就讲，使许多人认清了“不抵抗主义”包藏的祸心。于是在士兵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坚决主张抗日的势力。

旅长邢占清顺应人们的正义要求，决心与马占山等人一

起率队抗日，守住哈尔滨。

但是，团长赵秋行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军连连败退的情况下，先是消极动摇，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投靠了大汉奸熙洽，干起了卖国求荣的勾当。

熙洽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的“闲散王族”，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头面人物。“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任张作相部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事变的第三天，他就派人拿着他的密函向日寇表示投降，把吉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了他一个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的头衔。由此，他变成个出卖民族的败类。赵秋行就充当了这个败类的忠实走狗。

赵秋行投降日寇，严重地影响了六七五团官兵的士气。我想，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敌人打来了，我们不去保家卫国，反而帮敌人来对付老百姓，这不是丧尽天良吗？我曾暗下决心脱离这支队伍，独树抗日旗帜。后来，因为营长英占彬坚决主张抗日，串通了几个抗日坚定分子缴了团部人员的械，防止了赵秋行策动全团投敌，我才又安下心来。

不久，吉林二十六旅改为自卫军，旅长邢占清当了师长，营长英占彬晋升为旅长，有个外号叫“张铁嘴子”的当了我们的团长，我也当了排长。之后，我们团在哈尔滨、巴彦、依兰等地，同汉奸于芷山的队伍进行过多次战斗，虽然胜多负少，但我团的战斗力受到很大损伤。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寇进逼哈尔滨，邢占清调我们团去保卫哈尔滨。当我们到达哈尔滨市郊时，已是二月初，中国

军队正在吉林自卫军总部指挥下，与日寇展开激战。由于汉奸张景惠等人的破坏和我军没有构筑坚固的工事，在敌人强大的立体攻势下，我们坚守了两天后，败退下来。从哈尔滨退到呼兰河，然后经巴彦、新甸、木兰等地，迂回到了依兰县，在一个名叫粉坊的村子里驻扎下来。

我们的队伍虽然驻扎下来了，但因一路败退，心绪并未安定，军纪糟糕到了极点，要吃要喝，见鸡抓鸡，碰猪宰猪，老百姓遭了大难。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受，对我排的弟兄们说："我们打了败仗，保卫不了老百姓，已经丢了脸，再乘机熊老百姓，这和土匪有什么两样！"我告诫大家："谁要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要军法论处！"因此，我队伍里没有敢胡作非为的。

有一天，我排的一个士兵突然问我："排长，你听说没有，团长正在策划率队投降日寇？"

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我。我立刻在队伍里作了深入了解，证实确有其事。

夜深了，弟兄们躺在老百姓的土炕上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我却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从赵秋行投敌后我的表现看，"张铁嘴子"深知我是坚决抗日的，他要投敌，肯定不会饶过我和我排，他甚至会首先把我这个排的人除掉。我闭着眼睛琢磨着对付他的办法。我想：带着弟兄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干掉吧，可他尚且没有叛变的行动，担心打虎不成反被伤；不下手吧，又怕他一旦宣布投敌，我们后悔就晚了。想到这儿，我心如火燎，猛然翻了个身。

"排长，想家了吧？"躺在我身边的陈友才，被我碰

醒，悄声地问我。他原是朝阳县六家子村人，为生活所迫逃荒到了吉林省磐石县一个山沟里。仍生活不下去，才当了兵。他为人耿直、豪爽，我们俩处得很知心。

我哪有什么家可想啊！九岁那年，我的父亲劳累而死，随母亲、姐姐讨饭谋生，十三岁时，就给有钱人家扛活，种种非人的待遇，使我无法忍受，遂于十九岁那年，只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讨着饭徒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为资本家摆船、背纤。艰辛的生活，象滔滔的松花江一样没有尽头。

我是这样，广大黎民百姓，也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侵占东北后，人民群众遭受蹂躏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

想到这儿，我决心抢在“张铁嘴子”行动之前把队伍拉出去。于是，我悄悄地同陈友才谈了想法，合计了拉出去的具体方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以出早操为名，把全排人集合起来，拉着队伍出了村。一阵急行军，离开驻地就是十几里。我选择了一块荒辟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士兵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我故意问：

“怎么样，弟兄们，累不累？”

“排长啊，”士兵们说，“再累也心甘，这是做人的路啊！”

“对，”我鼓励大伙说，“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让子孙后代骂我们！我们要追得鬼子狗趴兔喘。”

弟兄们听我们这么一说，精神顿时更加振作，有的笑着

问：

“就凭我们这几杆烂枪，还有那个时候？”

“能不能赶着鬼子跑，不在于我们这几杆烂枪，而在于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我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有人手中有一团的兵力，不去打日寇，却在暗中策划投降敌人！这种人没有骨头，枪再好，也不过是只癞皮狗！”

弟兄们一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心中已猜着了八九分。有一个性急气粗的士兵问：

“排长，你说这人是谁？咱们去收拾他！”

“前有赵秋行，已成了民族败类；眼下还有‘张铁嘴子’！”接着，我把“张铁嘴子”暗中策划投敌的事讲了一遍。弟兄们听了都很气愤，目光不由地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期望我拿出办法来。

看到战士们的情绪这样高涨，我想起了当时在东北军爱国士兵中流传的一支歌曲，我开了个头，大家跟着唱起来：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唱完歌，大家的情绪更加激昂。我提高嗓门说：

“我姓李的是中国人，决不干出卖祖宗的事情！现在国难当头，愿意抗日的站过来！不愿意的不勉强！”我往地当央一站，立刻有二十几个人站到了我身边。也有几个人没动弹，强调家中有父母、妻子，放下武器回家了。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为防备“张铁嘴子”追击，我化名“田德”，拉起队伍向东进发。后来，人们习惯地叫我“天德”，把我们这支自发抗日的队伍叫“天德队”。

松花江两岸的平原地带，是日寇和汉奸武装比较集中的地区。在这里，我们这支小队伍很难站住脚。为了长期坚持下去，我们选定了完达山与三江平原交界的地区作为抗日活动基地。

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向东进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四月份，进入了横亘宝清、密山、勃利之间的完达山。

方圆几百里的完达山上，森林茂密，灌木丛生，栖息着多种飞禽走兽，生长着各种山菜野果；山下，是肥沃的三江平原，盛产大豆和小麦。发源于山区的挠力河、七星河、宝石河，水量充足，养育着肥美的鲜鱼；沿河两岸的低洼地区，是一片沼泽，栖息着水鸭、野鸡和雁类。“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谚语，就是三江平原物产丰富的真实写照。这种自然条件，既为抗日战士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设下了天然屏障，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我们以完达山和三江平原作战场，同日寇汉奸展开了生死的搏斗。

这期间，由于生活极度艰苦和屡遭敌人的袭击，弟兄们有的牺牲了，有的逃跑了，到达宝清西部山区时，我们三十几个人的队伍，仅剩五、六个人了，还常常几天吃不上饭。

有一天，我们又饿又累，躺在青龙山山坡上休息，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响，眼前冒金花。陈友才突然坐起来说：

"李哥，这样不行，咱们得想点办法活下去！"

"有什么办法，你说吧，我听你的！"

"那不是车吗？"陈友才指山下奔驰在大道上的四挂套大车说，"我们可以求车把式帮帮忙！"

我想，那个年月能拴起四挂套大车的，一定不是穷人，就同意了他的建议，下山把车截住了。我说：

"掌包的，对不起了，请把马借给我们骑几天吧！"接着，我跟他讲，"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用老百姓的东西讲借讲还，请你放心。"

掌包的中等个，腿脚有点瘸。他听我要卸他的马，急忙笑脸相迎地说：

"如今国难当头，支援抗日，人人有责。莫说用我几头牲口，就是有用我的地方，诸位也自管吩咐！我要为抗日出把力，正愁找不到你们呢！"说着，他从腰里掏出足有半块砖那么大的一个小包裹，递给我说：

"老总你们拿着，这是五两烟土，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看，这人够朋友，急忙通了姓名，原来他叫周国昌，是徐马架子村人。我表示谢意，把烟土收下，马也不卸了。他临走时，诚恳地说：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周国昌好交朋友。诸位如不

嫌弃，万望日后登门作客！”

之后，我们真的成了朋友。借他的烟土，我们加倍偿还了。他也给我们帮了很多忙。为了团结抗日，在他的要求下，我与他对天盟誓，结成了“把兄弟”。他兄弟二人，有个老母亲。他长年跟车外跑，练就了一副能说会道的嘴皮子和见机行事的本事，村里人背地里都称他“花舌子”。我在和他接触过程中，发现这个人不简单，和各个大小“绺子”(注)都有联系。于是对他渐渐产生了戒心。

有一天，我们正在周家休息。突然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进了大门。我和弟兄们立刻抄起家伙准备打，周国昌急忙拦住，胸有成竹地说：

“不要紧张，都是朋友，没事！”

队伍进了院，他领着我们迎出去，来到带队的跟前向我介绍：

“这位是权队长，我的朋友”，他又向权队长介绍我说：“这是我的盟弟，也是抗日的，报号‘天德’。”进屋以后叙谈起来，才知道权队长叫权胜，他的队伍原属吉林自卫军二十八旅，保卫哈尔滨的战役失败后，旅长丁超动摇了，权胜拉出这部分人，坚持抗日。

经他这一介绍，我感到权胜的这支队伍还比较可靠，又考虑我们人少力单，容易被敌人或大股土匪吃掉，就主动要求加入了权胜的队伍。

经过多次战斗考验，我受到了权胜的信任和重用。一九

注：绺子是土匪队伍的代称。

三二年冬，权胜病了，已不能继续带队打游击。他和我商量妥当，然后把队伍集合起来，当众宣布：

“今后我们这支队伍由‘天德’指挥。队内一切事务，统由‘天德’裁决。诸位要服从指挥，奋力杀敌，共举驱逐日寇、光复祖国的大业！”

打这，权胜更名改姓，隐居在山林里。后来，被伪宝清县自卫大队队长杨保贵探知杀害了。噩耗传来，弟兄们万分悲痛，要求立即下山攻打自卫队，取来杨保贵的狗头为权队长祭灵！我说：权队长把弟兄们交给我，我要对弟兄们负责。眼下，我们人数不多，武器不精，不能意气用事。待我们积蓄力量，练好武艺，不愁没有报仇雪恨之日！我发誓：“三年内如不消灭杨保贵及其自卫队，请弟兄们拿我的头颅祭灵！”大家听我这么一说，情绪安定了，表示一切听从我安排。

从此以后，我带领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战斗在完达山区，驰骋在三江平原上，同日寇、汉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火烧警察署

日寇占领宝清县后，把全县分成七个区，分别建立了伪警察分署、警察分队和自卫团，对抗日人民实行了残酷统治和武装镇压。

距宝清城不过七、八里路的夹信子警察署，是宝清城南的一只看门狗，死死地盯着夹信子、徐马架子、靠山等村的抗日群众，以及活动在大、小梨树沟子、百石河子一带的抗日队伍。

夹信子警察署署长俞殿昌，是个视抗日武装如眼中钉、肉中刺的家伙。他欺我人少枪杂，缺吃少用，整天象苍蝇一样，叮在我们队伍后边乱嗡嗡。有时把我们搅烦了，就摆开阵势和他拚一拚，但他又立刻往回缩，往往打不着。针对这种情况，我和弟兄们一起制定了“诱敌深入，攻其不备”的作战方案。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宝清县伪警察署拟召开各分署署长会议，交流“讨伐”抗日队伍的“经验”，表彰“讨伐有功”人员。

俞殿昌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为了邀功请赏，他决心抓紧“讨伐”抗日力量。对此，我派陈友才带着几个骑兵，到夹信子附近的徐马架子村诱敌，我率主力分别埋伏在大梨树沟沟里和沟外的山丘上。

署长开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俞殿昌求功心切，几乎天天进山“讨伐”，却没有一点“战绩”，长瓢似的脸上堆满了愁云。

一天下午，一个狗腿子跑进俞殿昌办公室报告说：

“俞署长，有几个，‘马胡子’(注)正在徐马架子做饭，这可是送上嘴来的肥肉！”

俞殿昌一听，顿时眉开眼笑，拍着巴掌，喜不自禁地说：

“真他妈老天爷有眼，该着我老俞露露脸！”仿佛他已经立了“功”。

他集合了警察队和自卫团的大部分兵力，计六七十人，分两路向徐马架子包抄过来。俞殿昌高兴地对左右人说：“我这些人突然袭来，‘马胡子’就是长了翅膀，也难以逃出我的‘圆圈阵’了！”

敌人眼见到了徐马架子村。陈友才等人故作惊慌，一边零乱地鸣放几枪，一边策马向大梨树沟子奔驰。俞殿昌一看人跑了，唯恐失掉“立功”的机会，就大声呼喊他的喽罗：

“冲啊，弟兄们！打死一个，赏二两烟土；捉一个活的，晋升一级！”于是，一些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就拚命冲了过来。陈友才等人边打边撤，俞殿昌率队步步紧追，不觉到了我伏击阵地的前沿。

当敌人刚刚到了“口袋口”时，我诱敌战士被几个亡命徒追急眼了，回身一阵猛烈炮火，敌人被阻堵了“口袋”之

注：“马胡子”是敌人对抗日武装的诬称。

外。见此情况，我非常着急。打吧，敌人会逃掉；不打吧，又怕陈友才等人吃亏。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埋伏在对面山上的两名青年战士，误以为伏击战已经打响，就开了火。这一下子暴露了目标，我只好立即命令伏兵投入了战斗。

敌人一听两边山上响起了枪声，知道中了埋伏，就急忙往回撤，致使这次“装口袋”的计划没能实现。

天黑下来了。同志们都为这一仗没能取得预期胜利而闷闷不乐。特别是那两个提前开火的小战士，更感到有负担。陈友才等同志，因为没有完成引敌入瓮的任务也有些焦躁。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开一次会，统一认识，总结经验教训。

刚刚打扫完战场，我就把队伍集合起来，带到了一个破炭窑里。我先开了腔：

“弟兄们！咱们这一仗吃了亏了吗？没有，一个弟兄都没有受伤，而敌人却被我们打死了二十多名，还缴获了几支枪，这是不小的胜利嘛，为什么精神不振？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我们没有吃败仗，只是没有按计划消灭更多的敌人罢了！”

“这事都怪我。”陈友才语气沉重地说，“没沉住气，到嘴边的肥肉又掉了！”

“请大哥处分我们俩吧！”那两个提前开火的小战士哭着走到我的跟前。

“没有取得预期胜利，不怪大家，只怨我考虑不周，对战场的复杂情况估计不足。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弥补。”

我这么一说，弟兄们的情绪又陡然高涨起来，陈友才首先说：

“我倒有个想法：俞殿昌倾巢出动，我们可不可以选几个精壮弟兄，组成一支小分队，绕道取他的老窝？”

经过讨论，大家都说老陈这个意见行。

我选了十几名枪法好的战士，由小道直取夹信子；其他人，由陈友才带着向夹信子活动，作为应变的后续部队。

大约夜间十点钟左右，我带领小分队到了夹信子村，俞殿昌的队伍还没影呢！伪警察署大院里，除了两个把门的，一个看电话的，几个伙夫外，一个穿“黄皮子”的(注)也没有。我们一枪没放就进了警察署大院，把几个看家的缴了械后，又迅速收缴了警察署和自卫团的库存枪支、弹药、军装、粮食等，一把火点着了营房和办公室。这天夜里，西南风刮得正盛，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顿时把警察署的老窝烧了个一塌糊涂。然后，我们撤到了村外，埋伏起来。

当俞殿昌带着惊魂未定的喽罗们，回到夹信子村南时，一见警察署大院燃起熊熊的大火，心中早已明白了八九分，顿足捶胸，后悔莫及。他担心我们还没有撤离，急令其部下停止前进，就地观察动静。恰在这时，我带领埋伏在村外的队伍，向敌人发出了猛烈射击。俞殿昌及其喽罗们，立刻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我们一阵风似地撤向了大梨树沟，进入了深山密林。

第二天早晨，被烧成废墟的警察署大院前，摆了一大排

注：“黄皮子”是宝清县当地人民对伪警察的蔑称。

花头棺材。死者的家属趴在棺材上，拍手顿足，哭声震天，俞殿昌梦想中的“庆功”会，竟然变成了吊丧会、送葬会！俞殿昌垂头丧气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活象一只丧家犬。侥幸活下来的喽罗们一个个象丢了魂似的，低着头，哭丧着脸，一副活不起的样子。而夹信子村的人民，却象逢年过节办喜事似的，喜形于色，奔走相告，暗暗解恨。

三、全歼自卫大队

随着宝清县各级伪政权的建立，各种反动武装相继出现，伪自卫团就是其一。据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三三年，宝清全县自卫团人数已达两千二百多人。

除此之外，宝清县里还组织了伪自卫大队，负责统管全县自卫团，指挥、配合各自卫团“讨伐”抗日力量，成为县公署的一支“御林军”。全大队一百多人，枪好马壮，人员都是从各区抽调上来的骨干分子。大队长杨保贵，是宝清县四区本德堡的大地主。日寇一来，他就拼凑起汉奸武装，当上了自卫大队大队长。邓子儒是宝清县靠山屯人，在老民国时当过屯董；宝清沦陷后，跟杨保贵拉起了自卫队，当上了中队长。

自卫团团丁，是按每四十垧地摊派一名的原则抽出来的。所以，自卫团从官到兵，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有些大粮户不愿出人，就花钱雇一些兵痞、无赖、大烟鬼或惯于“砸疙瘩楼子的”（注）来充数。因此，它虽然反动，但没多少战斗力。

各屯子里的自卫团都是本村人，干坏事时也多少有些顾忌。但县自卫大队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异乡人，要吃要喝，

注：宝清人称明火执仗进宅抢劫的强盗为“砸疙瘩楼子的”。

非打即骂，看到谁不顺眼，就是“嫌疑犯”；碰到几个人在一起唠嗑，就是“思想犯”。猎民们从山里回来被他们碰上了,就以私通“马胡子”为名,进行刁难。因此，宝清人民恨透了这群豺狼，强烈要求除掉它们。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被害的权队长，复仇的怒火油然而生。

一九三三年夏天，一个化名“三省”的人，带着一支很大的队伍，协同几支抗日武装，攻打宝清城。没攻下来，撤到了距城四十多里的本德堡，呆了几天就撤走了。随后，我带队来到这里。当地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我部也是“三省”的人呢。

“三省”的队伍驻进了杨保贵的家乡，这可搅动了杨保贵的心肠。那里住着他的爹妈，还有他的财产。杨保贵坐卧不安，一再派人去本德堡探听消息。得到的情报往往使他更加坐卧不宁。要去攻打吧，那在三江平原上赫赫有名的“三省”可不是好对付的，不去打吧，家中老人的安危和财产损失姑且不说，自卫大队长的脸面往哪里搁?

一天下午，杨保贵刚刚睡完午觉，没精打采地进了大队部办公室。中队长邓子儒早已呆在那里听候吩咐。杨保贵见了邓子儒就说：

“老邓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邓子儒知道大队长的心事，就宽慰他说：

“办法倒没有，不过我分析，‘三省’呆不长久，早晚得撤走！”

这话，丝毫没减轻杨保贵的心中负担。

恰在这时，一个侦察兵进来报告说“三省”撤走了。这个情报，顿使杨、邓二人脸上扫去了愁云。杨保贵详细地询问了本德堡的情况后，对邓子儒说：

“明天，除留下几个看家守门的以外，其余全员到本德堡去‘讨伐’！”

邓子儒一时不解其意，反问道：

“‘三省’不是撤走了吗？”

“老邓啊，这方面你还欠思虑。你想‘匪众’在我的家乡驻扎了好几天，能不以财物诱惑民众？定然会有人见财起意，助纣为虐；再说，如果没有内线，‘匪众’怎敢到我的家乡抢掠？咱们得去查一查！教训教训这些刁民！”

邓子儒是个机灵人，杨保贵的话刚说到半截，他就领会了全意，明白了杨保贵是想不冒任何风险，既可去借抓“同伙”、查“内线”之机捞一笔外财；同时，还可以回家乡显显威风。

“讨伐”“三省”的命令一下达，整个自卫大队轰动了。士兵们怕“三省”，不愿意去送死。宝清城人民高兴地议论说：“就杨保贵这几个虾兵蟹将去打‘三省’，可有一出好戏看！”

这天下午，本德堡有个农民从城里回来，向我报告了情况。我觉得“三年内消灭杨贼的诺言有了实现的机会，便立即把队伍召集起来，研究对策。

首先，我们分析了敌我状况：整个自卫大队，算上喂马的、做饭的、打旗的、吹号的，总共也就是一百多人，通常能拉出来的，也不过八十来人。他们贪生怕死，战斗力不强。

而我们虽然人少，武器差，但是人人抱定了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可以以一顶十。

统一认识后，大家异常振奋，纷纷出谋献计。最后决定，在本德堡前的大豆地里设伏兵，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

本德堡地处平原，周围是大片长满了大豆秧的开阔地。站在村前向南瞭望，可看出十几里远。为防备杨保贵的亲友给他通风报信，我们研究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夜幕降临了。我站在本德堡的大街上，把口笛吹得吱吱响，战士们很快集合起来了。有的战士故意问我：

"队长，天都这么黑了，有新情况吗？"

"刚刚得到情报，明天杨保贵带着自卫大队来'讨伐'，我们人少武器差，干不过他们，回避回避！"我故意大声地回答着。说完，拉起队伍就往挠力河方向开去了。

鸡叫头遍的时候，我们又悄悄地回到了本德堡，钻进村前的大豆地里。战士们各自选好了地形、地物，作好了就地战斗的准备。

三江平原的夏夜是宁静的。蟋蟀的鸣叫，萤火虫的蓝绿色闪光，更增添了田野的清静和凄凉感。向村里望去，一片漆黑。唯有村犬的几声吠叫，标志着这天幕底下还有村庄。蚊子、小咬一群群地扑来，防不胜防。地是潮湿的，豆秧上挂满了露珠。战士们一进豆地，裤腿就被打湿了大半截。我们在潮湿、寒冷和蚊虫叮咬中熬过了四个多小时。战士们看看天已放亮了，就悄悄地把子弹推上膛，上了刺刀，象猫等老鼠似的，圆睁双眼，谛听着村里的动静。

这天早晨，杨保贵吃完早饭，太阳已升起一丈多高。他

穿上马靴，戴上茶镜，紧了紧武装带，斜背上“大镜面”匣子，把日本人给他的战刀挎在腰上。门外，马弁牵来了备着沙鱼皮鞍子的枣红马，一副银克斯镫，在初升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杨保贵走出门来，对着早已集合好了的队伍挥挥手，军号顿时响了起来——自卫大队出发了。

杨保贵虽说经常回家，可是要象这回，由八十多人的马队护卫着，心中无忧无虑，还是头一次。他骑在马上，悠闲地东看看，西望望，似乎沿途的风光也比往日吸引人。大道旁的大烟地里，连片的烟花象成群的彩蝶落在绿色的大地上，红的、黄的、紫的、粉的、白的，花瓣儿迎风晃动着。杨保贵不时地吆喝着：“传令前队，加快脚步！”丘八们的心情可与杨大队长不一样，不管他怎么喊叫，前队的人马总是象漏气的皮球，提不起神来。因为他们知道“三省”的厉害，每走近本德堡一步，就是向死神靠拢了三尺。沿途老百姓看到杨保贵的队伍下乡，无不愤恨，咒骂道：“这些不得好死的东西，不知又到哪儿去作孽！”

几十里路，个把小时就到了。来到本德堡前，杨保贵一看村民们的屋顶上还冒着炊烟，鸡不叫，狗不咬，一派升平景象，就想抖抖威风，下令说：“冲锋前进！”随即，军号声中混杂着人喊马叫声，村前的大道上扬起了一片尘土。

这一切，我们趴在大豆地里都听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

当杨保贵得意洋洋地带队进了自己的老窝——杨家大院后，拴好马，架上枪，还没来得及派出岗哨时，我一声令下，三十几名战士跃身而起，一拥而上，把杨保贵的人马全部包

围了。当杨保贵和邓子儒认出不是自己的人时，我们的枪口早已对准了他们的胸膛。自卫大队的士兵们被吓得蒙头转向，无一敢去抄枪。杨保贵、邓子儒已呆若木鸡，两只胳膊举起来不敢动了。就这样，一枪没放，连十分钟也没用，八十多人的自卫队官兵，就乖乖地作了俘虏。

收缴了自卫大队的全部武器后，我把他们集合起来，让杨保贵和邓子儒跪在地当央。村里人听说我们缴了自卫大队的枪，抓住了杨保贵，不约而同地围拢来看热闹。我站在一个土堆上对乡亲们说：

“我叫田德，人们都管我们这支队伍叫‘天德队’。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为了开发和保卫这块土地，不知流了多少血汗！今天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怎能容忍日寇来横行霸道？怎能允许汉奸帮助敌人残害我们的骨肉同胞？杨保贵甘当日寇的狗奴才，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接着，我历数了他杀害权队长，镇压抗日人民，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种种罪行，最后问大家：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对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应该怎么办？”

“枪毙！”

“千刀万剐！”

“杀一个少一个！”

人们无比愤怒，呼声此起彼伏。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命令战士，一枪结果了杨保贵的狗命。

枪响之后，我回身一看，只见那个战士又在举枪瞄准着

邓子儒。邓与杨虽是同伙，也干了一些对不起乡亲的事，但他毕竟与杨不同，当一些遇难的乡亲们求到他时，他还办了些"积德"的事。我让他与杨保贵跪在一起，是为了教训教训他。我说了声："也不能都杀嘛！"就用胳膊把那个战士的枪管一搪，枪也响了，把邓子儒的帽子打出了一丈多远。这时我看看在场的伪兵，个个面如土色。邓子儒跪在那里，吓得浑身发抖。我命令他站起来，他已站不起来了。我就叫一名伪兵把他扶起来。

见此情景，觉得很有必要对他们再教育几句，我就说："如今国难当头，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为国分忧，为民族解放出力，万不可步杨保贵之后尘！希望诸位今后改恶从善，共赴国难，否则，再让我碰上时，可没这么便宜的了！"伪兵们口口称是，邓子儒更是千应万诺。我一声令下，将他们遣散了。

考虑到县城里还有伪国兵三十团和宪兵队、日本守备队等反动武装，我带领战士们立刻撤离开本德堡。战士们背上缴获的八十多条枪，骑上马，我挎上杨保贵的"大镜面"，骑上他的枣红马，抄起他的日本指挥刀，向东一挥，队伍直奔挠力河方向而去。战士们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不由得举枪对空鸣放。胜利的枪声，战士们的欢笑声，混合着战马的嘶叫声，使这个宁静的村庄顿时沸腾起来了。

队伍离开本德堡，过了挠力河子，经过肖发亮子，绕过小尖山子，很快进入了密山地界。当县里得知杨保贵的队伍被歼灭，兴师动众来"讨伐"时，连我部的踪影也没寻着。日后，伪宝清县县长齐耀武在《宝清县志》中写道：县自卫大队

与“三省”交战中，大队长杨保贵为国捐躯了。这些家伙，真是王八吃秤砣，铁心当汉奸了！

全歼了宝清县自卫大队，枪毙了杨保贵，使宝清、密山一带的伪军、警察、宪兵等大为震惊，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从此，我们的队伍由原来的三十几个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成为宝清、密山一带日寇、汉奸横行霸道的一大障碍。

四、夜攻专卖局

消灭了杨保贵的自卫大队后，我们远远地避开敌人，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兰花顶高山里坐下来总结经验教训，研讨克敌制胜的上策。会上，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去找共产党；有人主张乘胜前进，再痛痛快快地干它几次。我觉得大家的抗日热情可嘉，但拿的主意却脱离实际，就耐心地解释说：

“听说共产党有救国上策，但我们在深山老林里，上哪儿去找人家？我看，咱们就是抗日，争取更多山林队联合抗日。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四面八方一起打，还愁日本鬼子垮不了？”

经过一年来的战斗实践，特别是提前实现了为权队长报仇雪恨的誓言，大家对我的话都很尊重，一致表示赞成。从此，我们分成若干个小队，深入到群众和山林队里作宣传和争取工作。很快在群众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争取了一些抗日山林队，如活动在宝清、密山一带的“九江”、“八河”、“四海”、“查海龙”、“明山”、“顺天”等队，先后加入了我部。

随着队伍的扩大，人吃马喂，枪支弹药，各种军需品的用量大大增加了，因而经费发生了困难。虽然当地老百姓也支援了我们一些，但远远适应不了战斗需要。为了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暂时解决我们的经费来源，我想到了本德堡

"专卖局"。

那个时候，伪满洲国刚刚成立，它发行的"老头票"(注)还没有建立起信誉，人民群众中的交易，多用大烟土作"硬通货"。如果能搞到大量的大烟土，我们手中不就等于掌握了通用货币吗？

日寇占领宝清后，为了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从根本上消灭中国人民的反抗力，在三江平原上强迫老百姓种植大烟，并在各地设立了"专卖局"，垄断大烟土的购销。宝清县本德堡的"专卖局"就是其中之一。

在"专卖局"里任职的日本人和伪职员，不仅日常收缴烟土时打骂百姓，敲诈勒索，用大烟坑害老百姓，引起了群众的愤怒。因此，各地"专卖局"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消灭了杨保贵的第二年夏天，为了寻机拔掉本德堡"专卖局"，我率部经常活动在挠力河子中游一带。

一天上午，从本德堡来了一位农民，见到我就愤愤不平地说：

"他妈的，我们堡子的'专卖局'也太霸道了，日本鬼子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拉屎，自卫团也跟着帮凶，尽熊老百姓！"

"那里有多少兵马？"我打断了他的话。

"就那么二十几个'自卫团'，还有几个日本人，使的都是老掉牙的枪。老百姓不敢碰它；要是你们去，那还不象收拾小鸡崽似的！"

注：伪满发行的十元票额的货币。

这个人是个放“鱼亮子”(注)的单身汉，和我多次打交道，办事说话都很有着落。

“你敢不敢带我们去一趟？”我以试探的口吻对他说。

“那有什么不敢！往这送粮我都不怕，还怕什么？”他坚定地说。

第二天，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由那位农民引路，我带着队伍，从挠力河子西岸，向本德堡进发了。

太阳一落，成群结队的蚊子、小咬直往身上糊。大约夜间十点钟，我们来到了本德堡“专卖局”的大院附近，潜伏在一片青纱帐里，观察敌人动静。

“专卖局”的主要支柱是自卫团。自卫团的营房就在“专卖局”的院里，是一大趟砖砌的房子。营房的门窗敞着，屋里没有灯光。借着月光看到，营房前边有个砖砌的掩体，一个哨兵来回地走动着。我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身边的一名战士，贴近他的耳朵说：“摸上去，捉个舌头来！”于是那个战士迅速地向敌哨兵爬去了。当他接近敌哨时，敌哨似乎有所察觉，忙转身向掩体走去。这时，只见我战士一个箭步窜上去，单臂搂住了敌兵的脖子，遂即用手枪顶住了他的脊梁骨：“敢声张，立刻打死你！”我一看捉住了哨兵，立即带着队伍来到了敌营房前。

“我们是‘天德队’，是抗日队伍，这营房内的情况，你要如实说，我不杀你！”我紧贴敌哨兵耳边悄声说。

注：捕鱼的一种工具。

这个人是当地人，去年夏天我们全歼伪自卫大队，枪毙杨保贵时，他还是村民百姓，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厉害。所以，他一听我报“天德队”，就吓得说话都连不成句了："我说，我说，说实话……”他简要地讲了自卫团的全部情况。

接着，我进行了战斗部署：由四、五个战士分别把守门窗，由陈友才带着十几个人在院子外作后卫，我带领其余战士负责进屋缴敌人的械。为了看清目标，命令那个被俘的哨兵先进营房点着灯，然后我带领二十几名战士冲进屋，齐声喝道：

“不许动！我们是‘天德队’，是来取枪取烟土的，不是要你们命的。识好歹的，都要规矩些！”

团丁们正在长条炕上睡觉。因为天气热，每人只穿了一条裤衩。大枪和衣服都在墙上挂着。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霹雳般地喊声惊醒了，一看黑压压站了一地人，枪口对着他们，都吓傻了。我命令他们到院子里站排，遂即收缴了他们的全部枪支：二十几支大枪和两只手枪，还有一些弹药。

我们正在屋里收拾枪支，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喊声：“跑了，跑了！”随后便是一阵枪声。原来，驻守在“专卖局”后院的几个日本鬼子，在我们收缴自卫团枪支时，发觉前院情况不对，就连上衣也没穿，从后院跳墙逃跑了。守卫门窗的人发觉后打了几枪，没打住。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来取大烟土和收缴自卫团的枪支，就没再追击。

我从团丁的口里得知，大烟土全部存放在后院仓库里，钥匙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逃走了，钥匙也带走了。战士们

将库门砸开，把库存的一千二百多斤大烟土全部搬出，命令团丁扛着，我部战士押着他们，撤离了本德堡。

我们用缴获的这批大烟土，换来了布匹和粮食，还从伪兵三十团换来了几十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从此，我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了。

五、智取"木营地"

我们搞垮了"专卖局"后，又在宝清北部拔除了几个敌伪据点，然后就很快转移到了宝清南部相比邻的密山县境内进行休整。敌人以为我部营地设在宝清北部，就在入冬以后，集中大部分兵力向宝清北部的四区、六区、七区压去，妄图在大雪封地之后将我一网打尽。

当我们搞清了敌人的动向时，决定挥师北上，进攻宝清南部，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经过多方侦察，我们决定拿宝清南部大脑袋山西麓的"木营地"开刀。

"木营地"是日寇侵占了完达山区后，为了对付驻扎在山林里的抗日武装，掠夺林木资源而设立的。在宝清南部山区有几处"木营地"，大都在山林深处。唯有大脑袋山西部的"木营地"，设在关门嘴子山北麓、挠力河西岸的冲积平原上。从狼洞沟和关门嘴子山上砍伐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向这里。木材堆积如山，占了三、四里方圆的地面。

大脑袋山西部的"木营地"周围，用密密匝匝的铁刺网圈了起来，形成了一道带刺的铁围墙。围墙只留一个大门，座东朝西，昼夜由荷枪实弹的自卫团团丁把守着。围墙四角，筑起了高耸的炮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网。月夜望去，四个炮楼犹如四个无头魔鬼，直挺挺，阴森森，令人望而生寒。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少年来，当地人民没柴烧，就进山去砍；建房没檩木，就进山去伐。但自从设立了"木营地"以后，山就成了日寇的山；树成了日寇的树，人民通向南山里的道路被截断了。老百姓眼巴巴地看着山林被日寇毁坏着，盗伐着，树木日见稀疏，无不痛心疾首。

我们早就盯上了这个"木营地"，因为它也是我们进出山的障碍。只是考虑它地处平原，易守难攻，距离较近的夹信子、小城子还有警察署和自卫团，才没轻易下手。这回敌人已集中力量到北部"讨伐"去了，邻近据点的兵力已大为减少，拔除这个"木营地"的机会到了。

为了有全胜的把握，我们派人潜入"木营地"内部，探清了它的全部情况。这个木营地的头子叫刘海楼，是个死心踏地效忠日寇的走狗。他心狠手黑，对"木营地"的苦力们非打即骂，对抗日队伍更是恨之入骨，他曾一再给日寇出主意："抓住抗日游击队的人，剜眼剥皮，他们就不敢和皇军对抗了！""木营地"内虽然仅驻守着三十几名团丁，但他们多是生活在山林子里的鄂伦春族青年炮手，惯于骑射，性情骠悍，被日寇汉奸收买之后，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力。"木营地"的财产，除了堆积如山的原木外，还养了二百多匹马，拴着几十辆大车。在这里干活的苦力，都是从宝清各区用摊派的办法抽来的。

摸清了"木营地"的地势及其防守情况后，我把战士们召集在一起，研究最妥善的取胜方案。

"最好抓几个押车的团丁，叫他们把我们领进去，给它

来个里外开花！”副官陈友才首先谈了想法。

“敌人白天行车，夜晚不出营，我们怎么能抓到？”一个战士发了言，把人们的思路又引深一步。

“就是白天才好！白天敌人往往会麻痹些，我们可以瞅机会下手！”接着，我说了白天行动的具体想法，大家听了，都说这个办法可行。

我派战士从驻地附近找来一个会赶爬犁的伪屯长，责令他给我们准备一匹快马，一架大爬犁。我安排好了后续部队，带上几个身体强壮、枪法好的战士，坐上伪屯长赶的马爬犁，就向“木营地”出发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事。

过晌的阳光，照耀着三江平原上的白雪，折射出刺眼的光线。马爬犁急驰在大道上。战士们眯细着眼睛向前望去，一片树林子出现在大道的尽头。铺满积雪的大车道，象一条银色的带子，消失在灰茫茫的树林里。

当爬犁驶进树林深处时，我命令伪屯长停下来，就同战士们一起进入道旁的林木深处，等着后续部队，并寻找可以设伏兵的地方。没过一个小时，后续部队上来了，我把他们领到事先选好了的地方隐蔽起来，等着“木营地”的大车队到来。

大约下午三点多钟，大道的远方出现了一个小黑点，缓缓地向我们这边移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黑点”越来越大，原来正是敌人的大车队。我安排好伏兵，就带着选出的几名战士，坐上爬犁，迎着车队驶去。

离车队已经不过两三丈远了。我欠身向前观望，只见一

辆辆大车全是空的，除了车夫之外，再没有别人。大车的后边，有一架马爬犁，坐着几个团丁，脖子缩在老羊皮袄的衣领里，怀里抱着大枪，两手插在袖子里。我悄声对伪屯长说："放过大车，向马爬犁冲去！"于是，伪屯长扬鞭催马，爬犁后边掀起了一溜雪烟。

敌我双方相遇了。由于我们怀揣短枪，一身农民打扮，并没引起敌人的警觉。团丁见我们的爬犁向他们靠近，就大声喊：

"你们他妈的不要命了，往跟前凑什么！"敌人声音虽高，但脖子仍缩在羊皮领子里。

看样子，敌人还没察觉我们的意图。我偷偷告诉伪屯长："再往前靠靠！"

敌人见我们的爬犁直向他们冲去，便从衣领里伸出脖子，似乎有所警觉，一个家伙嘶哑着嗓子威胁说：

"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说着，几个团丁从袖子里伸出手来端起枪，但并未拉枪栓。

"老总，可别开枪啊！我这马刚刚上套，一见着牲口就往前凑！"伪屯长编着谎，脸上故意呈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

"不要怕，大白天行路，他不敢往身上打！"我小声地给伪屯长打着气。

当我们的爬犁几乎与敌人的爬犁挨上时，团丁咋呼着，搬动着枪栓。这时，没等我下命令，战士们从怀里掏出手枪，一个箭步蹿上去，枪口顶着团丁们的脑袋："缴枪不杀！"我战士齐声大喊，吓得伪团丁浑身战慄，连声说："饶命，

饶命！”乖乖地把枪递了过来。

敌爬犁、车队都停下了，埋伏在路旁树林里的战士们也赶上来了。我把伪团丁和车夫集合起来训话说：

“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专打日寇和汉奸，诸位不要怕，我们不伤害大家，只求你们把我们带进‘木营地’去，然后，你们各奔前程。不过有一条，进‘木营地’时，如果谁敢泄露真情，我就把他的脑袋敲成碎片！”随即，我向他们讲了进门时如何回话等事项。他们连连点头，表示言听计从。为防意外，我令战士们卸下了伪团丁的枪栓。然后，把伪屯长打发回家了。我同几名战士和几个伪团丁坐在爬犁上，大部分战士分别坐在几辆大车上，就继续向“木营地”开去了。

到了“木营地”天已完全黑了。守门的团丁在淡淡的月光下望见来了一溜大车，便高声问：

“干什么的？”

“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连自己的人都不认识了？”押运的团丁诙谐地回着话。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守门人又问了一句。

“碰见‘马胡子’了，打了好半天才闯过来。”伪团丁完全按着我们的意图应付着门岗的盘诘。

“哪一股‘马胡子’？有多少人？”门岗有些胆虚，想问个明白。

“听说是‘天德队’，有百十来人！”

“在哪儿碰上的？”

“不太远，就在前边。”

门岗不作声了。就这样，我们四、五十人的队伍，稳稳当当地进了“木营地”。

进了大门以后，我急令伪团丁带我指战员分别奔向门岗和炮楼。当我游击队的枪口对准门岗和炮楼的伪团丁时，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人在开玩笑呢。但不过几秒钟，他们就明白了，乖乖地交了枪。

随后，我们冲进了自卫团宿舍，缴了团丁的械。这时，我命令战士们拉上“木营地”的二百多匹马，驮上“木营地”库存的五六千斤高粱米，背上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地踏上了归程。

第二天，县里调动了夹信子、小城子自卫团等反动武装来“讨伐”时，我们已安全地撤回到密山地界，把差一些的马卖掉，作为活动经费；用选出的好马，武装了一部分骑兵队。

从此，大脑袋山西边的“木营地”就一蹶不振了。

六、周庆山和他的侄女

周庆山，是宝清县三道河子村周方禄的儿子。一九三五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四团来到这里后，周方禄的家就成了革命军的联络点，周庆山及其大哥周庆发、三哥周庆生、五弟周庆林、侄女周淑玲，就成了革命军的地下情报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建立和强化他们的野蛮统治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财富。在宝清县头道岗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每天都有满载木材的几十辆大车一字排开，有一里多长。为防抗日游击队截击和车夫偷卸木材，还配了二十多名武装警察和自卫团押运。这一切，早被周庆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九三五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周庆山偷偷来到了人民革命军三军四团的临时驻地太平沟，向团长郝贵林同志报告了木材车的全部情况。郝贵林听了很高兴，立即决定当天下午去劫车。

下午三点多钟，周庆山作向导，郝贵林带队，来到了三道河子附近的单家亮子。这里是木材车打尖、喂牲口的地方。道旁是一片森林，树木长得又高又密。郝贵林同志观察了一下地势，决定把伏兵安排在道旁的森林里。在进行兵力部署和战前动员后，同志们就开始构筑工事。

山林里的积雪，虽已到了二月间，但并没融化，一脚踩下去，还有半尺深。战士们站在雪地上，冻得手脚发木。但求战心切，一想到胜利在即，就忘了寒冷，有的在培雪作掩体，有的在擦拭枪膛、枪栓和子弹，有的已作好准备，在焦急地眺望大道的远方。

下午四点多钟，运木材的大车开过来了。铁车轱辘碾着积雪，吱吱嘎嘎地响着，车老板甩着响鞭不住嘴地吆喝。押车的头目大声喊道：

“前边就是单家亮子了，作好‘打尖’、喂牲口的准备，只给半小时啊！”

声音传到了路旁的森林里，我指战员听了，暗暗笑骂道：

“你他妈还咋呼啥，用不了半小时，就叫你玩完！”

这时，在路边瞭望敌情的周庆山进了林子，向郝贵林报告了观察到的情况：还是四十几辆大车，二十几名押运人员。

郝贵林听了，立即对全体战士说：

“押车的，多数是自卫团士兵，他们大部分是从当地大粮户中抽上来的，也有少数是雇来的穷苦百姓。对他们要一打二吓唬，以缴械为目的，不要轻易伤人，更不许伤着车夫！”

郝贵林同志部署完，最后一辆大车已来到眼前。这时，只见郝贵林把匣枪当空一挥，“哒哒哒！”一连串的子弹飞出去，打得树枝直颤，枝杈上的积雪一劲往下落。枪声就是命令！战士们立即开了火，手榴弹排子枪一起响了起来，同时齐声呼喊着：

“伪兵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不要替日本鬼子卖命了！”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声激烈，喊声此起彼伏，手榴弹在木材车周围掀起阵阵烟雾。

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蒙了，有的钻到车底下藏匿起来；有的弃械逃窜；有的腿肚子转了筋，直挺挺地坐在车上不会动弹了。刚才下令“打尖”的那个家伙，趴在装满木材的大车后边，一边督战，一边射击，被我战士当场击毙了。这个家伙一死，树倒猢狲散，敌兵立刻举手投降了。战斗没用半小时就结束了。

这场战斗，共打死敌人两名，伤敌三名，俘敌十几名，缴枪二十多支，子弹上万发。我军仅有一名战士负了轻伤。

晚六点多钟，郝贵林同志带着队伍，战士们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同周庆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三道河子村。

乡亲们早已做好了饭，烧开了水，迎接人民军队凯旋。周方禄带领儿女迎到村头，忙把伤员和郝贵林让到他家，让孙女周淑玲用盐水给伤员洗了伤口，把积存多年的红伤药拿出来给伤员敷上，包扎好。战士们坐在滚热的土炕上，吃着饭，同乡亲们唠着刚刚打完的这一仗。大伙兴奋地说：

“这一仗，要不是团长不让往死里打，敌人一个也别想活着！”

周方禄老人插嘴说：“嗬，听见了吗？郝团长，你饶了敌人，这还是一条‘罪’呢！”

老人的一句玩笑话，说得郝贵林和满屋的人都笑了起来。

为防御敌人跟踪报复，吃完了饭，郝贵林就带部队回太平沟了。

单家亮子伏击战的第二天，县里开来了“讨伐”队。因为三道河子人民早有了防备，“讨伐”队没有抓到人，就一把火把周庆山家的房子烧了。从此，周家父子叔侄的心，就和抗日队伍贴得更紧了。

由于郝贵林同志的引见，我和周方禄一家也熟了。我的队伍开到三道河子时，常到他家歇脚；有了任务，也常求他的儿孙们帮忙。

因受长辈的影响，十七岁的周淑玲思想进步很快，参加革命活动的胆量也越来越大了。先是，每当抗日队伍来到时，她给同志们烧水、做饭、浆洗缝补，做衣服、绣军旗等；后来，就同父辈一起搞情报，作交通，成了抗联三军的地下工作者。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托周淑玲的三叔周庆生买了些手榴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暂存在她家。

一天夜间，我派副官陈友才带领一名青年战士去取货。他们到了三道河子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陈友才和伙伴正在山岗上观察村里有无敌人，忽然听到正在打场的周庆林高声喊道：

“‘黄皮子’来了，‘黄皮子’来了，快跑啊！”

周庆林喊着，卸下打场的马骑上，哥哥周庆发抻着尾巴，一起往山里跑去。陈友才一看敌人追来了，朝伙伴喊了声，拨马往回跑。周庆山行动缓慢，没跑了，就故作镇静地留在场院里干活。

敌人漫山遍野地向山里追去，枪声混杂着敌人的吼叫声，渐渐地远了。

周淑玲惦念着亲人们的安危，在屋里坐卧不安，就到院子里，朝着枪响的方向瞭望。

这时，她猛然想起了她三叔给我们买的那一麻袋东西，还放在她家的棚顶上。里边装的什么，她并不知道。她想，既然是给山里人买的，一定是"犯禁"物资。于是，她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屋，搬来梯子，爬上了棚顶。解开麻袋口一看，脑子里嗡一下子响起来，头发似乎都竖起来了，麻袋里边原来装的是手榴弹、炸药，还有红袖标等等。现实不许她胆怯，不容她多想。她很快冷静下来，使尽全身的力气想把它搬下来。可是麻袋连动也没动。敌人一会儿来搜查怎么办？她想去找四叔。但四叔早已被敌人死守在场院里。她祖父在屋里，但年老多病，帮不了忙。这可怎么办？她急得汗流满面，在屋里直打转转。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四姑的老公公王爷爷来了。她求他帮助搬下来，并送到了沟塘子藏了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在山上乱放了一阵枪，一无所获，就回村了。他们先是把周庆山绑上，吊在大梁上抽打，逼问他跑的都是什么人等等。恰在这时，王爷爷藏完麻袋回来了。敌人把他绑上，吊起来，同周庆山一起受刑。敌人打累了，也逼不出口供，就把他俩卸下来，灌辣椒水。不管敌人用什么刑罚，他俩一口咬定不知道。气得敌人捶胸顿足，白瞪眼儿没办法。

"讨伐队"讨伐了大半天，只讨了个没趣儿。太阳快落山

时，象夹尾巴狗似的下山了。等到敌人已经走得无影无踪时，周淑玲蹦高撒欢地向后山跑去，边跑边喊："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

不一会儿，她的父亲、三叔回来了。几个长辈人凑在一起，唠起刚刚过去的这场灾难，都夸奖说：

"别看淑玲人小，可补了一个大漏子；要不，这祸也不知要闹多大！"

从此以后，周淑玲在长辈人的眼里越发成了大人了。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周庆林把自家的瘦马套在小车上，拉上女扮男装的周淑玲及其继母和异母兄弟，同周庆发一起上了山。经过几天的跋涉，来到了密山县的张老儿亮子，找到了我三十二团。从此，周庆发一家同我们全体指战员，转战在完达山区，度过了东北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经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介绍，我同周淑玲结了婚。

周庆发带领全家上山后，敌人以"纵匪入山"的罪名，将周庆发的父亲周方禄折磨得奄奄一息，出狱不几天就去世了。周庆发的小女儿周淑贤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周庆发的二妹妹也被折磨成了残废。周庆山和周庆林仍给抗联搞情报。一次，因叛徒告密，他二人被捕，经人保出，才幸免于死。

七、加入抗联

经过几年的战斗锻炼，我部很快壮大了，不仅吸收了一些劳苦农民，而且还收编了一些山林队。人员增加了，战斗力增强了，但问题也多了。特别是来自山林队的一些人，他们虽也抗日，但怀有不同的私心。有的感到自己人少力单，怕被别人吃掉，是找我部作靠山的。加入我部之后，关心的仍是他们原来那个小“山头”的利益。有的山林队加入我部后，作战虽然也很勇敢，但纪律性很差，每到一处，往往侵犯群众利益。有的山林队过惯了乌合之众的生活，对于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和铁的纪律很不习惯。一打起仗来，有的不听调遣，有的行动迟缓。加入我部的各山林队，虽然表面上取消了“山头”，但实际上仍有绺有股，互存戒心，磨擦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我很伤脑筋。有时遇到老百姓告状，说我的部下抢了他们的东西。我一时火起，恨不得枪毙几个，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妥。管严了，一些本来抗日决心就不大的人，岂不容易弃队投敌？不管也不行，这样下去，既违背了抗日救国、保卫人民的宗旨，又败坏了我“天德队”的声誉。从抗日大局出发，对这些人我采取了既管、又不严管的态度，寻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这样，我带着这支成分复杂的自发抗日队伍，坚持到了一九三五年。

这年春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一支远征队，到勃利、密山、宝清一带开辟新区。我听老百姓说，这支队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军容整齐，战斗力很强，深受人民拥护。我想：这支队伍既不同于从东北军里拉出来的义勇军、救国军，也不同于反日山林队，会不会是共产党组织的？即便里边没有共产党，也肯定是由治军有方的爱国将领带起来的。如果将我的这支队伍并入该队，经高手严加整训，战斗力岂不会大大提高？为此，我派副官陈友才下山查访，主动和三军这支远征队取得联系。

陈友才一去十几天没消息。我以为他出事了，就在驻地——宝清县兰花顶子山上加强了防务，同时派人下山打听陈友才的下落。

已经是初夏季节。山林的拂晓充满了生机。暖风吹抚着树木，微微的树涛声，象是在窃窃私语。晨雾弥漫了山谷，随着轻风，飘上了山腰。不知疲倦的布谷鸟，似乎担心人们贪睡误了农时，天刚蒙蒙亮，就东山叫，西山应，“布谷、布谷”叫个不停。放哨的两个小战士被这山林的春光陶醉了，年龄稍大些的问伙伴说：

“唉，你知道布谷鸟为什么总喊‘不归’吗？”

“大概是惦念咱们陈副官了。他一去十几天不归，连鸟都着急了！”小战士顽皮地回答着。

“净瞎编！听老人说，布谷鸟是受苦人屈死后变成的。”年岁稍大些的战士讲起了布谷鸟的故事。

“听，山下有响动！”年龄稍小的战士打断了伙伴的话。

稍大些的战士向山下望去，只见陈友才领着一个军人朝

密营走来了。那个人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匣枪和“图囊”(注)交叉地挎在左右肩上，边走边与陈副官交谈着。我看见了急忙走出营房迎上前去。陈友才喜形于色，拉着那个人的手向我介绍说：

“这位是金策同志，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团的政治部主任，我请他来商谈联合抗日的。”陈友才从人民革命军里学会了“同志”这个词。我握着金主任的手，简要地作了自我介绍，并对他前来我部表示热烈欢迎。

金策同志是朝鲜族人。他言谈爽快，待人热情和蔼，不仅中国的四书他读得烂熟，还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说：

“我们进入完达山后，就听说有个‘天德队’在坚持抗日。几次派人和你们联系，都因为没有找到你们而落了空。今天要不是陈副官引路，作梦也不会想到在这深山老林里见到你们！”

金策在我们的密营里住了五天，谈了许多大事情。从“九一八”事变，到日寇妄图侵吞整个中国；从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全民抗日；从我党派出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等大批优秀干部深入东北，发动和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到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及反日山林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讲得生动具体，娓娓动人。陈副官在一旁不时地插上几句，讲的也都是在三军四团

注：装作战地图和文件的背兜。

的亲眼所见，越发地增强了金主任讲话的感人力量。我听着，心象长了翅膀，随着金主任的话语在翱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光明世界。

在我的请求下，金主任给我部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形势报告，着重讲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讲了三军军长赵尚志英勇果断、足智多谋、誓死抗日等情况，讲了三军四团团长郝贵林爱兵爱民、机智勇敢、身先士卒等情况，讲了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各抗日武装，奋勇杀敌的情况，讲了东北各爱国力量联合抗日的大好形势。最后，他兴致勃勃地说：

“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东北城镇乡村，抗日的红旗插遍了白山黑水之间，喜人的形势在向我们招手！弟兄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保卫神圣的国土吧！让我们枪口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吧！”金主任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指战员的心，有的落下了眼泪。

通过几天来与金主任的接触交谈，使我切实感到共产党精文通武，胸怀大略，唯有她才能肩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日的重任。我诚恳地向金策同志提出：取消队号，愿无条件地将我部编入四团，听从郝贵林和金策同志指挥。金策同志兴奋地双手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接着，我同金策研究了整编我部的具体事宜。之后，他回团向郝贵林同志汇报去了。

金策同志下山不久，就同郝贵林同志带队来到我部驻地，向我全体指战员宣布：“从即日起，原‘天德队’被收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四团游击营，李明顺同志任营

长。”郝、金二同志率队在兰花顶子山上驻了二十多天，协助我整训了队伍。从此，我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步上了党指引的光明大道，在人民游击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壮大了力量。第二年春天，四团扩编为四师，郝贵林任师长，金策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我游击营扩编为游击三团，我被师部委任为团长。第二年秋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我部被编为该军四师游击八团，我任团长。一九三七年春天，八团改为三十二团，下设五个连和一个直属排——少年排。我仍任团长。少年排的战士们，多是一些烈士遗孤，十三、四岁的穷孩子。

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冬，三军四师撤离了宝清。临走时，金策同志要我团留在宝清、密山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并指示我说："宝清的山水你们都很熟悉，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留下来，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一定能打出一个新局面，有力地配合各抗日军开辟新的游击区。"接着，他讲了日寇正下力量安顿东北，妄图染指华北、华中，乃至全中国。他说，我抗日军民掀起了抗日热潮，但敌人也在调集兵力，对我实行"围剿"。为适应形势发展，抗联四、五、六军可能相继进入完达山区。在四师撤离后，要我多与他们联系。我亲自送金策同志到驻地的山脚下，他回转身来，紧握我的双手说：

"明顺同志，你的担子好重啊！但我相信你能担当起来，要坚持下去！如果实在坚持不了时，就撤到江东(注)。

注：三江平原上的人们把乌苏里江以东称江东，实指苏联。

那里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支持我们的。”

以后，我牢记金策同志的指示，在远离三军四师的情况下，主动取得进入宝清、密山地区的各抗日联军（如五军）的领导与支持，方向明确，任务具体，满怀信心地同日寇、汉奸展开了斗争。

八、夜会邓警尉

一九三六年初春，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三江平原和完达山区的抗日斗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日伪军龟缩在县城和几个较大的据点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这种形势下，我军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迫使敌人出战就歼。这就需要大量的艰苦周密的侦察工作。

一天下午，交通员送来了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同志的指示：命令我十天内摸清宝清城内外的敌人实力情况，速送师部。

宝清境内的反动武装，有日本守备队，伪国兵三十团、伪警察大队和森林警察大队，还有各区警察分署的警察、自卫团等，不要说深入其内部侦察，就是去取现成的材料，没个十天八日的，恐怕也跑不完。任务如此之重，要求如此之急，如不采取非常手段，是难以完成的。这时，我想起了三年前枪毙杨保贵时，被打飞了帽子的邓子儒。

自从我部一举全歼了伪自卫大队后，我虽然基本上没离开宝清，但却没见过邓子儒。侦察得知，这个当年被吓得筛了糠的中队长，如今竟在伪县公署警务科当上了警尉。但人们也反映，自从那次“陪绑”之后，他处事更加谨慎，老百姓有个大灾小难的求到他，也还肯给说几句好话。所以，他虽身在伪警务科，但民愤不大。据接触过邓子儒的人说，

他对于我，既惧怕，又感激。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想起了郝贵林同志来我团时说过的一席话：对于敌人营垒里的人，我们是立足于打的。不打什么也没有，唯有打，方能立足，方能争取，方能战而胜之。但敌人营垒并非铁板一块，对于其中的顽固分子，务求彻底歼灭；对其中的动摇分子，则在打的同时，努力作其分化争取工作。

对照郝师长的话，我觉得邓子儒具备可以争取的条件：

（一）邓子儒身为警务科的警尉，接触全县反动武装头子，如能争取过来，对我军有用；

（二）他是我的“手下败将”，参加过死的“典礼”，深知我部厉害；

（三）邓系当地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对我部更是望而生畏，后虑无穷。

我召开团部干部会，谈了对邓的看法，研究了对他的争取问题。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但怎样去争取，由谁去争取，争论较大。有人主张派人潜入城内，待其下班回家时，拦路截住，绑上山来，从其嘴里挖出情报了事。有的提议将邓的家属绑来，然后开出索要敌情的提纲，投寄邓子儒，令其“照单付货”，之后释放人质；有的主张以我个人名义写信给邓，言明大义，望其弃暗投明，免得祸及自身及至妻室儿女等。

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欠妥当，难以达到目的。为此，我提议，由我亲自去会邓子儒。这意见一提出，首先遭到了副官陈友才的反对，他说：

"你当初全歼了伪自卫大队，断了他升副大队长的梦想；又枪毙了杨保贵，差点给他揭了盖儿，还敢登门？！"

老侦察员董志也反对我去"冒险"：

"你不杀他，他说了几句感激话。现在还不是又替日本鬼子干事了？汉奸是不讲良心的。你去，凶多吉少！"

"这个世道，良心还值钱啦！人心隔肚皮啊，还是小心些为好。"参谋长薛东范插了一句。

我坚持要去，讲了三点理由：（一）邓子儒贪生怕死，守家待地，我来个夜入其宅，攻其不备，不怕他不就范；（二）三年前令其给杨保贵"陪绑"时，我警告过他。这次出其不意地闯入他的内室，他容易接受我们的条件；（三）我已想好了防范措施。接着，我讲了进入邓宅后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听了，情绪平静了下来。

翌日下午，我安排了各项军务，制订了应急的防范措施，派出了几组侦察人员，化装成商人，腰间和脖领里各插一支手枪，就下山去会邓警尉了。

到了宝清城，已是夜晚。我翻越城墙，来到了邓子儒的院外。大门还没关。我向院里张望，屋里亮着电灯。邓子儒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一条大狗，跟着他摇头摆尾地蹿前蹿后。

我进了院，不卑不亢地向他走去，并主动跟他打招呼说：

"邓警尉，生活好悠闲哪！"

大狗听到生人的声音，"汪汪"叫着扑过来。邓子儒大喝一声，这畜生夹着尾巴跑了。

“嗬，你的权威还不小哪！”我说着，来到了他的跟前。他显然已认不出我来了，借着玻璃窗的灯光，端详我的面容：

“你？你是——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声音倒好熟！”

“你的官当大了，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真是贵人多忘事！进屋细看看就认识了。”不等他让，我就向屋里走去。

进了屋，我摘下礼帽，从长衫下掏出手枪，顺手扔在炕上，脸上同时掠过一瞬间的冷笑：

“怎么，真的不认识了吗？仅才三年没相见吧？”我偷眼观察他的举止形态和意向。

这时，他认出了我，傻愣愣地站在地上。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三年前的事。那是枪毙了杨保贵的时候，他吓得跪在地上起不来。我对他说：

“邓子儒，你的脑袋究竟还能长多久，这要由你自己选择：是从此改恶从善，站到抗日人民一边；还是继续当汉奸，与人民为敌。”

邓子儒当时发誓说：

“我邓某的心是肉长的。罪责在身，抗日军不杀，我已感激不尽，不敢再与抗日救国潮流相对抗，不敢以——身——试——法！……”

我看他愕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指了指炕沿儿对他说：

“你坐下。我今天来府上，不是找你算帐，而是有点事相求，不知肯不肯帮忙。”我语气平和，但一派正气。

“李团长有事尽管吩咐，不杀之恩尚未报效万一，有用我处，当效犬马之劳！”念过几天私塾的邓子儒，说起话来总

是文绉绉的。不知是出于怕，还是出于真心，他说得倒挺象样。

但是，当我把搞情报的事跟他谈了后，他表现有些惶惶然。见此，我觉得有必要开导他几句，就说：

“当初，你在汉奸队伍里任职，但没跟着杨保贵干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给你留了一条命；今日，你又在汉奸政权中任要职，但仍处事谨慎，没有多少民愤。因此，我受部队委托来找你。你不是说‘不杀之恩未报’吗？今天要你给搞点情报，就是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希望你尽心竭力！”

邓子儒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低头坐在炕沿上不言语。我捡起手枪，插在腰间，跳下地，来回地走着，眼睛偷偷注视着他。

“这事要是让宪兵队知道了怎么办？”邓子儒慢慢抬起头，以惊恐的眼神望着我，说出了他的疑虑。

“你能去自首吗？不然，他们怎能知道？”

经过长时间的开导，邓子儒终于镇定了，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并留我在他家住下。

“临来时，我曾安排部队，如果我七天不归，必是出了事，可来你处询问情况。所以，你必须尽一切可能，在七天内提供所要的情报，以免发生误会。”这话，与其说是对他的嘱咐，还不如说是对他的警告。邓子儒是个机灵人，他深明“询问”一词的真正含义，连连点头称是。从此，我安安稳稳地在他家住下来：白天睡觉，夜间出去活动。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邓子儒的卧室里休息，忽然院里传

来了日本人说话的声音。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右手习惯地落到了枪柄上，向窗外望去。只见邓子儒领着一个日本人走来了。难道他领人来抓我吗？我拔出双枪，躲进了里屋。

日本人进了屋，邓警尉急忙泡上一杯“香片”（注）送到他的跟前。我顺着门缝往外看，那个日本人，不到三十岁，身穿一身黄呢子军装，坐在邓警尉的太师椅上，品着茶，嘴里吐着烟雾。

“邓警尉，情报的不妙啊！”鬼子的两撇铡刀眉，上下掀动了两下，目光投向了邓警尉的脸。

“啊？！”邓警尉以为鬼子已经知道了他的底细，简直有些惊慌失措了。不过，惊慌出在这种场合，也很得体。

“你的，军人的不是！”鬼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边吐着雾，边磕着烟灰，“刚刚听到不妙，就如此惊慌，要是‘马胡子’打来怎么办？难怪三年前你的全军覆灭。”日本人横三竖四地数落了他一顿。而邓警尉似乎从鬼子的话语间悟出了真意，渐渐平静下来。

“出了什么事吗？”邓子儒小心翼翼地探问。

“‘马胡子’下山了！”这个日本人好象故意在胆小鬼面前显威风似的，声音好象把棚顶的纸都震动了。

“有情报吗？”邓警尉的神态、语气完全恢复了正常。

“昨日，一个‘马胡子’来投诚，说山上派出几个侦察组，连匪首‘天德’都进城了！只是不知他同谁联系。可要注意啊，邓警尉！”这个日本人，又暗暗地挑了一句邓子儒

注：香片，茶叶名。

“走麦城”的事。

“请太君放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马胡子’狡猾狡猾的，投诚人的话，也许有诈，我已派人去侦探。如果确实马上责令俞殿昌率队进剿，给它来个乘虚而入！”日本鬼子得意地一笑，把烟头撇在地上。

“太君宏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对付几个‘马胡子’，还不是如探囊取物！”邓警尉边点烟，边信口吹捧着日本人。

两个人谈到下午四点多钟，日本人走了。我从里屋走出来，敞开门，驱除满屋的烟臭味。

“这人是干什么的？”邓子儒送走日本人回来，我问。

“警务科的指导官，常到这儿抽烟喝茶。他奸诈狡猾，心狠手黑，很不好处！”

“既然日本人已知道我进了城，必然加强盘查、戒备。你是否尽快跟我谈谈，我早些离开这里，也免得出了事情连累你。”

他说还有点情况没弄上来，明天上午他搜集一下，晚上谈。

第二天晚七点，突然全城戒严，开始了大搜捕。我知道，这是敌人按着叛徒提供的情报，开始行动了。邓子儒还没回来，我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心里有些紧张。会不会是邓子儒要借刀杀人？我在他家里，如果出了事，难道他不考虑抗联会如何惩治他？想到这，我的心平静下来。

晚八点左右，邓子儒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见了邓子儒劈头就问。

“警务科已确知你进了城，全城戒严，主要就是抓你。”邓子儒由于紧张，本来就缺少血色的脸，越发地显得苍白。

“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不慌不忙地说着，“躺”在了他的太师椅上。

“怕是宪兵队亲自搜查。警务科的人们都回家了，到那儿去谈谈吧，能保靠些！”说完，他给我找出一身伪警察服穿上，就领着我向警务科走去。

一路上，邓警尉在前头走，我作为他的“护卫”，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哨卡，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全城阴森可怕的气氛中，在捕人的警车怪叫声中，在通明彻亮的伪警务科办公室里，邓子儒有数据、有事实地谈着敌情，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本子上记几个符号——这是唯我自己才知其含义的符号，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这天晚上，我们两个谈到了深夜。除了他讲敌情外，就是我跟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

“我是伪警尉，将来抗日胜利了，也没好；现在给你们通情报，让日本人知道了，也没好！”他对未来，充满了悲观、恐惧情绪。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话虽然带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从正义战胜邪恶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你为抗日出了力，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给日本人效劳有什么好处呢？有一支歌唱得明白：‘日本打猎，你当狗，打猎回来吃狗肉，早完也是不长久！’给日本侵略者卖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希望你为抗日多行善

事，这才是正道！”针对邓子儒的悲观情绪，我讲了这番话。他听了，很激动，向我表示：

“有抗日联军作后盾，我的胆子壮多了，今后有用我邓某之处，尽管发话！”

从此，我和邓警尉真正成了朋友，他帮了我许多忙。这年春天，我要亲自到望山坡自卫团去摸情况，邓子儒同望山坡自卫团团总“四大个子”（名王生）联系妥，并亲自出了保票，我就更名改姓到望山坡当上了“自卫团”。他还几次营救过被捕入狱的抗联家属和抗联地下工作人员。

我在邓警尉家住了六天。因为获悉敌人要对我部“乘虚而入”，就抓紧搞到了所需要的情报，提前回山了。

九、“李山东”大义凛然

回到部队后，汇总了各组侦察来的情况，派人送给郝贵林同志，就开始准备迎击“讨伐”队了。

这场战斗，要从“李山东”说起。

那个时候，在宝清县二道河子的山沟里，住着一个姓李的山东老头，叫什么名字，人们很少打听，只叫他“李山东”。他虽已六十开外，但身子骨挺结实。他对日寇入侵中国恨之入骨，对汉奸的忘祖行径，更是咬牙切齿。他看到我们与日寇、汉奸周旋，常常慨叹：“嗐，我就是老了！”

是的，“李山东”可不是那种“守法”的草民。民国初年，“李山东”家乡遭兵患，又逢天灾，他就只身来到了东北。到东北后，仍找不到出路，就加入了陈忠山的“绺子”，报号“大德字”。从此，他就和这个不公道的社会挑战了。

“大德字”为人轻财重义，好打抱不平。他对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往往以绳系之，索取重金。但对穷苦百姓，则往往有求必应，有难必救。所以，他虽闯荡江湖大半生，但到了花甲之年，仍手无积蓄。最后，靠朋友帮助，在二道河子沟里“压”了两间“马架子”。晚年，在兰花顶子靠烧炭为生。

因为他多年浪迹江湖，形成了一种豪放不羁的性格。他喜欢结交天下义士、豪杰，憎恨奸诈邪恶的小人，崇尚朴实

诚恳。所以，他虽隐居深山，更名改姓，但登门拜访的人，仍经常不断。在山里打游击的抗联指战员累了，渴了，常到他家歇脚，喝水；冬天里进山的农民冷了，也常常到他家烤火；过路的人饿了，也常去他家讨口吃的。这样，日久天长，引起了“讨伐”队的注意，常常来“李山东”家堵截抗联战士，或抓“嫌疑犯”，搅闹得“李山东”不得安宁，恨不得杀他们几个解解恨。

当我们研究迎击“讨伐”队时，有人提起了“李山东”，说在他那里设伏击比较有利。“李山东”的为人和他家周围的地势，我都比较熟。就在一天下午，我领着队伍来到了他家。

我们来到“李山东”的门前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李山东”正坐在房前晒太阳，气哼哼地抽着老旱烟。他听见山下有脚步声，就站起来，手打遮阳向下望。

“李大叔，又不认识了吧？”他似乎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老花眼，我们每次来，他总是这样望个不停，你不说话，他往往辨认不出是谁。

“噢，是李团长啊！我还以为那些‘黄皮子’又回来了！”“李山东”把烟袋锅子使劲地往鞋底子上磕了磕，然后重新装上一锅子，点着递给我。

“他们来过了？”我问。

“刚走了还不到半顿饭的功夫。这些杂毛混种畜生，走到哪，遭踏到哪！这不是嘛，“吃红饭的”（注）送给我一

注：完达山区的人们称猎民为“吃红饭的”。

只狍子，还没舍得吃一口，就让他们一下子祸害光了！剩这一张皮子，还让留着，说明天回来时带走。这帮狗东西，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简直不让老百姓活了！”“李山东”气得声音有些颤动了。

“明天还来？”我高兴地叮问了一句。

“还来！说是明天回夹信子路过这儿！”老人说着，愤然不平的情绪还没消。

“正好，我们就是来找他们的。明天你老配合一下，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些狗东西！”接着，我讲了这场战斗的打法。“李山东”一听要打“讨伐”队，而且还让他参加，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老菊花，两眼眯成了一条缝，恳切地说：

“分给我什么任务，你说吧，李团长，我保证完成！”老人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使我看到了一个刚强老人的英姿，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目标——东南方，谷地拐弯处的最高峰；

“任务——观察敌哨，通报军情；

“方法——发现敌情，砍倒顶峰上的那棵小松树。”

我以指挥官的口吻，给眼前这个内心充满仇恨的老人下达了任务，引得同志们哄然大笑。

老同志也随着青年人的笑声，捧腹弯腰地哈哈笑个不停。接着，我讲了我们的潜伏地点，以及他的伪装等。为使老人不受牵累，我特意嘱咐他：“明天早晨，你带着一把斧头，一把锯和一条绳子，装扮成去东南山砍松树明子的。待枪声将停未停时，你就回来，以免敌人生疑。”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李山东”在东南山上发出了敌情信号，我阵地立刻进入一触即发的战斗状态。又过了约半小时，俞殿昌带着三十几个喽罗，懒洋洋地出现在山下的小道上。当他们毫无戒备地进入我伏击圈时，我阵地顿时响起了炮火，打得敌人哭爹叫娘，滚进了小道旁的树丛里，凭借树木对我还击。我一看，敌人已经展开，考虑子弹珍贵，又担心敌人闻到枪声来增援，打了一阵子，就撤退了。这次，共击毙伪警察四人，打伤了几名。

俞殿昌遭此意外打击，又不知我部有多少人，更不知为何乘胜而退，尽管我阵地枪声渐稀，最后停了下来，他仍不敢进，也不敢退，只匿在树丛中乱放枪。

就在这时，“李山东”背着一捆松明子回到家里。俞殿昌见了，虚发几枪，弹头在“李山东”的左右掀起了一股股烟尘。老人急眼了：

“哪个朝代不要老百姓？我一个烧炭的穷老头子有什么罪，你们拿我当活靶？”

“你家后山上还有没有‘马胡子’？上去看看！”敌兵对着“李山东”嚎叫。

老人的腿脚本来很利索，但他故作艰难，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又下来，足足耗去了一个多小时。敌人确知我部已经撤走，就一拥而上，来到了“李山东”的“马架子”跟前。

俞殿昌对着“李山东”骨碌了两下眼珠子，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大事似的，一声喝道：

“来人，给我绑起来！”随后，他抽出匣子枪，板起“狗头”，用枪管点着“李山东”的脑袋，威胁说：

“你这老不死的，敢勾引‘马胡子’打我们，我要你的命”！

俞殿昌的喽罗们一拥而上，把“李山东”绑在了一棵小树上。但他并不老实。

“你当署长的，说话可要有点根底！凭什么说我勾引‘马胡子’？”“李山东”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冰凉的枪口顶在脑袋上，毫无惧色，反口咬住了俞署长。

“啊，要凭据？”俞殿昌说，“这还不是眼见的吗？昨晚是不是‘马胡子’住在你家？”原来他骨碌眼珠子想的是这个！

“是。”老人冷冷地回答，“住在我家就是我勾来的吗？”老人又反挑了一句。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俞殿昌不住地磕打老人的脑袋。

“从这里到夹信子警察署是多少路？你俞署长心里不是明镜吗？我这老头子一步挪不了三寸远，怎么去报告？”

“刚才打起来时，你为什么不作声？”俞署长显然是在找茬了。

“吃完早饭，他们走了，我也上山去砍松明子。枪响了，没见人，我怎么知道是你们来了？”老人不慌不忙地编着谎，敌人无懈可击。

“‘马胡子’在你家的后山上设下埋伏，难道你不知道？”

“他们出门，我上山，军事行动，谁敢问一声？你当军人的，比我明白！”老人讽刺了一句。

“你给他们做饭，烧水，留他们住宿，就凭这一条也有罪！”

“我有什么罪？张作霖的东北军来遭踏我，我得受着；满洲国的警察队和日本守备队来了，我得招待；‘马胡子’来了，我敢往外撑？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哪个来了，老百姓不得听！”“李山东”有理有据地反驳着。俞殿昌恼羞成怒了：

“你这个不知死的老东西，还敢顶嘴！”“啪”就是一耳光。

“听说俞署长住过讲武学堂，也算是中国人中了不起的人！不过，你右手拿着枪，左手打一个被绑着双手的糟老头子，这是不是有损署长的英名啊？梁山好汉里有一个人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大老虎，成了英雄；可没听说有哪一位打死一只猫出了名的！你是英雄，就去追赶打你们的那些人，抓他几个为打死的部下祭祭灵，这才叫好样的！你打我这个老头子算啥本事！”

俞殿昌虽然坏了良心，但他毕竟是吃中国饭长大的，中国话还听得明白，“李山东”的话，句句损得他张口结舌。最后，他给自己垫了一句下台的词：

“今天我姑且放了你。不过我要警告你：以后要是来了‘马胡子’不报告，我就宰了你，吃你的肉，扒你的皮，拿你的骨头当柴烧！”说得何等凶！老头儿不但没怕，反觉好笑。

“烧了更好，免得再遭这份罪了！”老人又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

不知是没听见，还是装没听见，俞殿昌命令喽罗给“李山东”解开绑，又让几个士兵抬着四具尸体，搀扶着受伤的喽罗，呼啦啦象送葬似的下山了。“李山东”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脸上再次堆起了菊花般地皱纹——他“嘿嘿”笑出了声儿。

十、掩护薛副官

一九三六年的冬天。

一天晚上，因为儿子们都没在家，周方禄拴上大门，叮嘱刚过门的四儿媳崔桂芳和大孙女周淑玲早点睡，然后自己也早早躺下了。睡到二更天时，山里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老人醒来了，孙女醒来了，四儿媳也悄声地从西屋走过来，站在老人的炕沿前。

"听到枪声了吗？"新媳妇趴在周淑玲的耳边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你四婶说什么？"老人没听清儿媳的话，抬头问。周淑玲凑近爷爷的耳朵说了几句。

"唉，说不定又是什么地方发生事情了。"老人满怀愁绪，把早已灭了火的旱烟袋锅磕了磕，嘱咐儿媳和孙女说："准是咱们的队伍跟敌人碰上了。可要精神点，万一有情况，好接应一下！"

四儿媳回自己的屋了。爷爷和孙女躺在炕上，再也睡不着，侧耳聆听着外面的动静。

枪声渐稀，最后终于停了。夜，又恢复了静谧。祖孙二人正朦胧欲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又驱走了他们的睡意。爷爷急忙坐了起来听了听，说了一声"是自己人"，一骨碌下了地，连鞋也没顾得提，就出了屋。他开了大门，随之，一

个高大的身影闪进门来。老人细一看，原来是薛东范。他是我三十二团的参谋长，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薛副官。”

“碰上敌人了？挂花了吗？”老人见薛副官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就急忙搀扶着他进了屋，并关切地问起了他遇敌的经过。

这天白天，我带队同俞殿昌的警察队整整周旋了一天。日落后，才把它们甩掉。晚上我率队驻进了太平沟子。同志们睡下后，一个兵痞出身的战士逃跑投敌了，并连夜领敌人来围攻。我同薛东范观察了一阵子敌人火力，选了一处薄弱点，一阵猛烈炮火，把敌人撂倒了五、六个。我们乘机一阵呼喊，冲了出去。但薛东范的腿挂了花。我派战士搀扶着他走，行动很迟缓。当我们来到三道河子附近时，发觉敌军已经追上来，就嘱咐他去周方禄家暂时躲避一下，我就带队转移了。

薛东范到了周家，周方禄老人一方面拿出了以前用剩下的红伤药，让大孙女给他敷上；一方面吩咐四儿媳做饭。

薛东范的伤不重。周淑玲用盐水给他洗了洗，敷上红伤药，包扎上了。

伤口刚包扎完，四儿媳还没做好饭，就听村里的狗吠成了一片，还夹杂着妇女、儿童的哭喊声和敌军的叫骂声。薛副官张罗着要到窗外柴草垛里藏一藏。老人说：

“那哪行！敌人既然进了村，哪里翻不到？”

这时，敌军的马蹄声已听得清清楚楚。老人急忙拉住薛东范的手说：

“日常，你不是总说我象你的父亲吗？今天你就当我的

儿子，一切听从我安排！”随即，他把四儿媳叫进屋来说：

“桂芳，情况紧急，马上行动！把薛副官领到你的屋去，老四没在家，你俩就装小两口儿！”

“这怎么行！”薛东范有些迟疑。

四儿媳是个苦人家的孩子，来婆家后，因受长辈和同辈人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她领会公公的心意，也体谅薛副官的心境，一把拉住薛副官进了自己的卧室，并立即把幔帐放了下来。

门外传来了马蹄声和敌人的嗥叫声：

“开门开门！”“嘣嘣嘣！”一声声的嚎叫，一阵阵的敲打，在这兵慌马乱的深夜里，好不令人心悸！不安和愤怒的心情使人们再也不能入睡了。

老人刚刚走出屋，十几个鬼子、伪警察就推开了门，一窝蜂似地拥进屋。

“你这老不死的，半天不开门，在屋里捣什么鬼？”一个伪警察骂着，把枪栓掰得“喊哩咔嚓”直响，枪口对着老人。

“‘红胡子’一个，伤了伤了的，交出来，钱大大的给！”一个矮鬼子，操着生涩的中国话，奸笑着，金牙在油灯下闪着亮光。

“我们祖辈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别说没有‘红胡子’，就是有，谁敢藏？”老人一字一句地对付着。

“苦啦(注)！”矮鬼子“唰——”地抽出战刀，对着老人

注：苦啦，日语骂人的话，相当于汉语“他妈的。”

咆哮，“你的不交出来，死了死了的！”鬼子的眼里闪着凶光。

“太君，你要杀我这个老头子，那还不是手起刀落的事！可是让我交出‘红胡子’，这不是比公鸡下蛋还难吗？”老人不慌不张地同敌人论着理。

敌人翻遍了周方禄的住室，连箱箱柜柜都没放过，什么也没翻着。

“西屋住的什么人？”矮鬼子指着四儿媳的卧室问。

“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子病了，儿媳在侍候他；要不，哪能不出来迎接太君呢！”老人不动声色地编着。

“哈牙哭(注)！”矮鬼子喊了一声，带着同伙拥进了西屋。

就在老人对付敌人的时候，机智聪慧的四儿媳已经布置好了侍候病人的“现场”——一条湿毛巾盖在薛东范的天灵盖上；他仰卧着，碗口大的拔火罐叮在他的胸脯上；昏暗的油灯，放在他的枕边；散乱着头发的四儿媳，“疲惫不堪”地守候在他身旁……

“他是你的什么人？”矮鬼子一进屋，指着薛东范问四儿媳。

“我的当家的。他病了，正发高烧呢！”四儿媳刚才听到了老公公的话。

“起来起来！”一个伪警察，学着鬼子的声调叫着。

薛东范作出了欲起而力不从心的架势，四儿媳急忙把他捺下去，面向矮鬼子说：

注：哈牙哭，日语，“快”的意思。

“太君，我们当家的正发烧，坐起来都支撑不住，别让他起来了！”

鬼子、伪警察的目光落在了薛东范的脸上。他紧闭双眼，张着嘴，急促地呼吸着。看了半天，那个矮鬼子说：

“‘良民证’的有？”敌人的目光立即转移到了新媳妇的脸上。

“有，交到夹信子警察署换新证，已经三天了，还没拿回来。我这有户口本。”换新证的事，伪警察都知道。新媳妇下了地，找出户口本，还有配给火柴、食盐、灯油等生活用品的“通帐”，一起递给了矮鬼子。鬼子不识中国字，转手递给了一个伪警察。

“你的丈夫叫什么名？”警察开始照本问话。

“周庆山。”

“多大岁数啦？”

“二十六岁，比她大三岁。”为了逃避国兵，在儿子正当兵龄时，托人多报了几岁。怕儿媳不知情，老人抢先回了话。

“八嘎牙路(注)！”矮鬼子伸手打了老人一嘴巴，“你的丈夫，几岁的有？”鬼子盯着新媳妇问道。

“今年二十六了，比俺大三岁。”新媳妇把老公公的话又说一遍。

就在鬼子、伪警察闯进周家盘查搜寻时，其余敌兵在各

注：八嘎牙路，日语骂人话，相当于汉语“混蛋”。

家进行了搜查，结果空忙一场。

“眼见那个受伤的‘匪徒’跑进村，难道他会插翅飞走吗？”敌兵边搜查，边自言自语。

“哎哨，刚才我起来喂牲口时，好象看见一个人往西去了，莫非就是他？”老人家编着谎，却装出一副恍然想起往事的神态。

“啊，有人往西跑？多长时间了？”一个警察叮着问。

“能有两袋烟的工夫。”

“笨蛋的一群！哈牙哭！”矮鬼子转身就走，出了大门，打马往西奔去，后边跟了一大群“黄皮子”。

周方禄担心敌人瞎扑一阵还回来，就把敌人来搜查薛副官的事，告诉了众乡亲。

日伪军折腾了一宿，果然回来了，仍怀疑薛副官，扬言吃完早饭就把他带走。

饭还没吃完，全村的父老兄弟都上来了，众口同声地保薛副官。

“周方禄祖辈都是庄稼人，连‘红胡子’的边都不沾！”老汉们这样说。

“周方禄的四儿子最老实，出门遇到蚂蚁都绕道走，怎么会成‘红胡子’呢？”青年人这样讲。

“太君，行行好吧！老周家的四儿子已经病了好几天，连炕都起不来，那里是什么‘红胡子’‘黑胡子’呀！”老大娘们这样辩解。

“你们敢保他是良民吗？”矮鬼子瞪着贼眼问大家。

“敢，我们敢以性命担保！”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就把他交给你们！以后查出他是‘红胡子’的干活，统统这样的！”鬼子抽出战刀，当空一劈。然后，就扬长而去了。

敌人走后，周方禄继续把薛东范留下养伤。基本痊愈后，我派人把他接回山里。

十一、探宝清遇险

一九三七年初，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变化，我派董志带一名青年战士潜入宝清城，执行侦察任务。由此，演成一场化险为夷，军民齐心斗顽敌的壮剧。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董志和一名青年战士各自戴上皮帽子，绑好靰鞡带子，打紧裹腿，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就下山向宝清城进发了。

按规定时间，两名侦察员务必在第二天上午返回驻地。但时已过午，还不见他俩回来，同志们都有些担心，不时地向山下眺望。我看到同志们的焦急情绪，安慰说：

"大家不要担心，董志是个老侦察员，他沉着、机智，善于应变，曾多次巧妙、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次还是两个人，不至于发生意外。"我嘴里这么说，可是心还是放不下，准备带几个同志到宝清城外探听探听，遇事也好接应一下。

正在这时，只见大道上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飞也似地跑来。因风雪没停，两骑是敌是友，一时分辨不清，我就命令战士们隐蔽观察，作好战斗准备。

两骑急驰到山下，拨马向我驻地而来。待进了我伏击圈时，人们才看清楚是董志二人回来了！

同志们立刻围上去，有的捶打着董志的胸脯，嗔怨道：

"你小子从哪儿弄来两匹马？搞得我们趴了半天雪地！"

有的给两名侦察员扑打着身上的雪，说：

"这晚才回来，同志们正在叨咕你俩，耳根没发热？"

"是不是出事了？"我关切地问。

"的确出事了，差点撂到那儿！"董志说着，摘下帽子，放下枪，脱下已经湿透了的靰鞡，如释重负地向我汇报起侦察来的情况和遇险脱身的经过。

头天晚上，董志二人在夜幕和风雪掩护下，偷偷进了宝清城。他俩经过一宿的紧张活动，跑遍了各个联络点，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情况后，天已经大亮了。

经过一宿的奔波，董志二人又饿，又累了。清晨的风雪没头没脸地吹打着他们，衣服单薄的董志二人更感到饥寒难耐，他俩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正走着，忽然看见街旁一家门口上高挑着一个饭幌儿，大红色的幌罩上银着金箍，黄色的幌穗随风摇摆。眼前的饭馆，使董志忽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回到驻地，还要走大半天路，年轻的伙伴能受得住吗？他决定吃点饭再赶路。

他俩来到了饭馆门前。董志机警地向周围扫视一眼，见没人跟踪；又向屋里望望，只见几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吃饭，就给伙伴递了个眼神，俩人进了屋。

董志看了一眼菜单，喝了声："掌柜的，来两碗小米粥，两碗炖白菜，越快越好！"就领着伙伴来到一个角落里坐下了。

"跑堂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可能是由于职业需

要，待客特别热情。她嘴里大声地重述着客人要的饭菜，拎着大铜壶向董志的座位走来。嘴里还顺便应酬着进出的客人，给董志二人各自斟了一杯茶水。

董志二人端起茶杯，刚刚喝了两口，就听到门“吱呀”一声，一股冷风夹着雪花袭了进来。本来就十分清冷的小饭馆，越发地增加了寒意。客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只见进来了一高一矮的两个中年男人，两双贼眼扫视着屋里的人们。董志和伙伴急忙把帽耳落下，低头佯装喝茶；同时，偷眼打量刚进来的两个家伙。

高个的，长得肥头大耳，膀阔腰圆，活象个熊瞎子；矬的，四肢短小，瘦骨伶仃，下眼皮朝外翻着，酷似瘦猴。瘦猴与熊瞎子形影不离，就象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身后跟着个哈巴狗。

胖子姓倪，是宝清宪兵队的特务，整天在宝清城里横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穿一身便服，戴一顶黑礼帽，红鼻梁上架着一副茶镜，右手拎着一根“哭丧棒”(注)，脚穿一双棕色尖皮鞋。一进屋，他那双贼眼就一个劲地往董志这边溜。矬子的那双猴眼，也跟着胖子的眼神不断地转动着。

因为董志经常进城执行任务，所以深知这两个家伙的底细，决心尽快走开。正好，吃完饭的几个乡下人吵吵嚷嚷地往外走，又有几个人急着进来。董志用肘碰了一下伙伴站起来，随着进出的人们离开了饭店。

出了店门，他俩急速地朝东走去。走着走着，身后传来

注：旧社会，为亲人送葬时手中拿的一种木棍，约尺许。这里意指手杖。

了踏雪的声响。董志立刻警觉起来，想回头看个究竟，又怕引起敌人的更大怀疑；不弄清楚，又担心敌人追上来背后下手。他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了随身带的小镜子，向后一照，胖子和瘦猴往前追赶的情形，立刻清晰地映在镜面上了。看样子，敌人离他俩已经不过三、四丈远了。这时，董志对伙伴悄声说：

"敌人跟上了！快，前边一拐弯就是小胡同，甩掉这两个鬼东西！"说着，两个人加快了脚步。

两个特务一看董志二人加快了脚步，居然跑步跟了上来。胖子高声喝道：

"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董志想，真要动打的，一个对付一个，你也讨不去便宜；况且我俩头上也没贴贴儿，怀里还有'良民证'，站住怕什么？"于是，他俩放慢了脚步。当特务来到跟前时，董志二人慢慢转过身来。胖子挥舞着"哭丧棒"耍威风说：

"干什么的？"

"平民百姓。"董志冷冷地回了一句。

"什么地方人？"

"当地人。你们是干什么的，问这些？"董志故意反问了一句。

"我们干的事，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宪兵队的，怕不？"瘦猴奸声诈气地卖弄道。

"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怕什么？"年轻的侦察员顶了一句。

"有'良民证'吗？"胖子问。

两个侦察员没有回声，各自慢条斯理的从怀里掏出来“良民证”，递过去。两个特务接过，端详了老半天，也没发现破绽。瘦子一看胖子没了下台阶，眨了两下猴眼，凑到董志的身前说：

“你俩是‘马胡子’，休想拿‘良民证’唬人！”说着，就动手来搜董志的腰包。

董志想，我的衣领后有枪，怎么能让他搜？想到这，右手不由地向脖领后伸去。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察到这是失慎行为，就顺势扑打了一下落在帽耳上的雪花，妥善地将举手的动向掩盖了。他往后闪了闪说：

“‘良民证’是警察署发的，你凭什么说不顶用？难道你比警察署还大？走，咱们到警察署论理去！”说着，董志就来撕扯瘦特务。其实，董志哪有心思真去，只不过借此拖延时间，寻找脱身的机会。那个狡猾的胖特务心生一计，以命令地口吻对瘦子说：

“走，跟他去！他们愿意走一趟，咱们奉陪！”

于是，四个人一起向东街走去。走着走着，我侦察员故意放慢了脚步，意在让敌人走到前头去好下手。但狡猾的特务，你慢他也慢，就是不肯往前多迈一步。

“是‘马胡子’也没关系，只要悔过不干了，皇军不另眼看待！”胖特务开始做“教化”工作了。

“到了‘老虎凳’上再招供，也没有什么好处！”瘦子附和着胖子说。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到哪也不怕！”董志回了一句。敌人不作声了，跟在后边继续向东走去。

董志对宝清城里的街道里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军政警宪等机关的位置座落，更是了如指掌。他走着走着，故意回头问胖特务：

“到警察署还有多远？”

“就到了！”胖子朝着前边四、五十米处的一个大门努努嘴。

特务努嘴所指的大门，那不是宪兵队吗？董志一眼看透了敌人的用心，就下决心解决问题了。

这时候，老天也似乎有意保护我们的侦察员，北风卷着雪粒，几乎把天地搅得分不清上下了。路上断了行人，也没了车辆。电线杆子上的裸线，在风雪中怪叫着。董志觉得动手的机会到了，用肘轻轻碰了一下伙伴，猛然从脖领里抽出手枪，回身就是一下子。只听“砰”的一声，那个胖特务应声倒地了。血浆溅在地上，冒着热气，白雪渐渐变成了紫黑色。胖特务一动不动地挺在地上，龇牙咧嘴，完蛋了。矬子一看董志把胖子撂倒了，回身就跑，并扯破嗓子喊叫：

“不好了，‘马胡子’进城了，‘马胡子’杀人了！”

董志二人连发几枪，终因风雪遮挡视线，没打准。于是，我侦察员急速向东门跑去，打算夺门而出。

敌人听到枪声，又听到喊声，立刻倾巢出动了，沿街的墙上，屋顶上，十字大街的路口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伪兵、警察和宪兵。敌人的叫骂声，警犬的狂吠声，混合着爆豆般的枪声，整个宝清城简直开了锅。

董志带着伙伴来到东门时，城门已经上了锁。往回退吧，敌人已经呼喊着朝这边来了；硬拼吧，敌众我寡，自己

牺牲了倒是小事，情报送不到部队，事就大了。他俩急得满头大汗，顺着城墙根向南跑去。

敌人见此情景，估计我侦察员再也无法脱身，就呼喊着“抓活的”，朝他俩追来。但敌人知道我侦察员手中有枪，虽然嘴里呼喊着“抓活的”，可是谁也不敢去抢“头功”。所以，我侦察员同追赶他俩的敌人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

人在“急眼”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我侦察员一看敌人正向他俩追来，抬头望了望城墙，随即使出平生气力，纵身一跳，爬上了一丈多高的城墙，敌人一见他俩上了墙，急忙开枪射击。但当敌人的子弹在城墙上掀起一股股烟尘时，我侦察员已飞身下墙，跳到了护城河畔的稻田地里。



恰在这时，东城门外正停着一辆小花轱辘车，车旁守着一男一女，均约二十左右岁。他（她）俩一看，

从城墙上跳下来的是我三十二团的侦察员“董老疙瘩”（董志的绰号），就一齐跑上前，让他俩坐车走。但董志看了看瘦马，摇摇头。这时，那个青年女子指着附近的杨家大院对董志说：

“快去，老杨家正给儿子娶媳妇，备有迎亲的对子马，借两匹骑着走！”

于是，两名侦察员直奔杨家大院去了。

原来，这等候在城门外的一男一女，是我军地下工作者周庆林和他的侄女周淑玲。他们原住三道河子村，后来，被迫迁来宝清城东门外的东关村。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早就认识董志。

刚刚吃完早饭，就听到东城门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他们凭以往的经验断定，这是山里来的人遇险了。于是，叔叔呼喊了一声侄女，套上小车，就到东门外来接应。送走董志二人之后，叔侄急忙回到城外的小车旁吸引敌人。

这时，杨家大院的鼓乐队吹打得正热闹。大喇叭吹奏着《小登科》（注）；小伙计从铁腔子里拔出信子，“呜——呜——呜——”吹了三声；十三开的大铜锣“镗——镗——镗——”响过三巡；高升炮“咚——哒——”，在杨家大门外连连炸响；拴在门外的十二匹对子马，披红挂彩，不时蹬蹄刨地，扬头嘶叫；穿戴整齐的众亲友，簇拥着十字披红的新郎官，步出彩堂。杨大爷向执宾的嘱咐了几句，新郎官跃身上马，陪客的男宾们“护卫”着新郎，向村外走去——迎亲

注：一种充满喜庆、快活的曲牌子。

的队伍出发了。

当这支人欢马叫的队伍刚刚走到村口时，就听到东门里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因为不知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迎亲的队伍停下了，望着东城门，七嘴八舌地猜测着。于是，惊恐、不安的神色，代替了兴奋的喜悦的笑脸。

就在这个当儿，只见从东门外跑来两个人，直奔迎亲队伍。杨大爷急忙走到队前迎上去。董志二人气喘吁吁地向老人讲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人听后，回身对迎亲的队伍高声喝道：

"乡亲们，游击队遇险了，鬼子就要追上来！快牵马来，救游击队的同志要紧哪！"

新郎官一听父亲发了话，立即选了两匹最快的马牵过来，递给了侦察员。董志二人感动得满眼泪花，正要说一些发自肺腑的感谢话，乡亲们说话了：

"咱们都是中国人，心情都一样，快上马吧，鬼子追过来就走不了啦！"乡亲们的目光，不由地移向了东门外。

在众人的催促下，董志二人跃身上马，当众一抱拳，说了声"多谢了，后会有期！"一提缰绳，双镫一磕马肚，两匹马象箭出弦似的，倾刻间消失在风雪中了。

这件事轰动了宝清城，人们象说神话似的，根据个人的意愿，添枝加叶，越传越奇。有些人不知遇险的是谁，就给我加上了。有人说我一枪打死了姓倪的特务，在万敌丛中杀出一条血路闯出去的；有人说我长了飞毛腿，飞城而过的；也有善心的老太太，说是她向菩萨烧了香，保佑我化险为夷的，等等。这些传言，越发地使敌人感到惶惶不安。

关于董志二人遇险脱身的事，一九三八年秋天，周淑玲同志上山参加了我三十二团后，讲述了以下情况：

我侦察员越城后没过四、五分钟，东城门就打开了，鬼子和警察、宪兵等，一窝蜂似地涌了出来。一见周庆林叔侄守着小车站在城门外，又不见了我侦察员的踪影，就饿狼扑食似地扑了过来。

“你们，好人的不是，‘马胡子’的干活！”一个鬼子嗥叫着，挥舞着战刀，冲到周庆林叔侄跟前。

“太君，我们是东关村的老百姓，良民大大的。”周庆林故意装出有些惊慌的样子说，“我说的是实话，没有半点假。”说着，他看着锋利的战刀，故意往后退了半步。

“八嘎牙路！你的说谎！”鬼子一把揪住周庆林的衣襟，瞪着凶残的贼眼。

“太君要是不相信，我领你到东关村问问，要是有哪一个人说我不是本村的良民，拉出去给个枪子儿，我心甘情愿！”周庆林起誓发愿地说着，鬼子的目光盯着他的面部表情。

“说实在的，咱庄稼人土生土长，不光本村的大人孩子知道咱的根底，就连狗见了咱都不咬……”周庆林继续纠缠着敌人。

“这个的不同。你们，‘良民证’的有？”鬼子骨碌着眼珠子，打断了周庆林的话。

“有。”周庆林叔侄不约而同地回答，随即掏出了“良民证”递给了鬼子。

“太君，你不用细看，照片是前些日子发‘良民证’时照

的，同本人分毫不差！”周庆林利用一切机会缠住敌人。

“你们到这里，什么的干活”鬼子端详了老半天‘良民证’，突然问。

“家中来客人了，进城买点菜，正赶上城门关了。家里还等着吃呢，就放我俩进去吧，太君！”周庆林借机又罗嗦几句。

鬼子似乎解除了对周氏叔侄的怀疑，奸诈地龇了龇牙，把证扔给了周庆林。

“‘马胡子’两个，逃了逃了的，讲出来，奖赏大大的给！”说着，鬼子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绵羊票”，在周氏叔侄面前摇动着。

“太君出这么大价钱，可真不低呀！”周庆林故意装出一副贪婪的样子，馋涎欲滴地瞅着鬼子手中的钱说，“可惜我们福份太浅，没碰上‘马胡子’；要不，这回可发大财了！”

“‘马胡子’两个，跳城逃跑了，没看见？”一个伪宪兵头子插嘴问。

“没看见。”周庆林估计我侦察员早已在十里之外，就不想再纠缠敌人了，淡淡地回了三个字。

敌人七嘴八舌地追问了半天，骂了一气，就象一群疯狗似的，嗥叫着朝杨家大院去了。

我侦察员遇险脱身的事发生后，极大地震惊了宝清的敌人，他们每日里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从发生事情的当天起，宝清城戒严三天，进行了大搜捕。凡是手上没有多少茧子的，都成了“嫌疑犯”。全城三百多人被抓进了宪兵

队，周庆林和周淑玲也在其中。杨家大院的男男女女，以及前来贺喜的，帮忙的，无一幸免。就连新郎新娘，都是在狱中度过的“洞房花烛夜”。敌人动用了各种刑具，施展了毒辣手段，但没有一个人说出是谁接应，是谁帮助两名侦察员脱险的。敌人兴师动众，空忙一场；而人民再一次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春天，董志同志再次去宝清城执行侦察任务。由于叛徒告密，被围困在万金山庙中。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了！从此，我三十二团失去了一位英雄的侦察员！

十二、龙头山下遇敌兵

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一天，为了准备一次新的战斗，我带领邵天宝、赵宏钧和少年排的小李子，一行四人，下山筹集弹药。经过两天的紧张奔波，终于在伪兵三十团搞到了几百发子弹，用马驮着回了山。

从出发地到兰花顶子驻地，虽然仅有七、八十里路，但因白天行动不便，只好选在落日后上路，所以当我们来到龙头山脚下时，已经到了掌灯时分。还没成年的小李子一个劲嘀咕：

"团长，我的肚皮里可早就在打鼓了，不治一治，打破肚皮你可要包赔！"

小李子打起仗来虎招招的，有一股不怕死的劲。但日常里，他毕竟是个孩子，活泼好动，说话也带有几分顽皮的味道。我担心饿坏了他，就决定到山根老苏家吃点东西再走。

老苏是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在龙头山下已住二十多年了。他为人忠厚老实，是早期加入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因为他家靠近山林，我率队打游击常到他家食宿。他不仅尽力照应我们吃住，还多次同他的小儿子——不满十三岁的小三子一起，给我们作交通，掩护抗日战士。

在老苏家吃完了饭，已经很黑了，又下起了毛毛细雨。为了及早免除队上人们的惦念，我决定马上回山。老苏已经

在他家西屋给我们准备了住处，横竖不让走。碍于主人的热情，又考虑夜雨山路，容易跌伤人马，就在老苏家住下了。

为防敌人突然袭击，不使子弹落入敌手，我们在老苏的院子里挖了个坑，把子弹包裹好，埋藏起来了。

第二天拂晓，雨停了，天晴了。因为惦记着埋藏的子弹，我早早地醒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冬是夏，只要睡不着，就起来。我穿上衣服，来到院子里。看了看埋子弹的地方，遮盖的挺严实，没有漏雨的迹象。看看马，槽里已空，顺手填了两筛子草料，就信步走出了院子。

我站在山坡上，欣赏这山林春晓的风光。林子里的鸟儿，象是在迎接歌咏比赛似的，各自使劲地练着嗓子。你已经来到跟前了，它还沉浸在另一个境界里，颇似高傲的歌星站在舞台上，连理也不理你一眼。轻纱似的薄雾，在晨风中飘动着，挂在山腰上。远远望去，青山如婷婷玉立的少女，那薄雾，恰似从肩头滑落下来的银色披巾。刚刚吐红的朝阳，透过薄雾，喷射出万道霞光，使这翠绿的山林，更加娆妖动人。这山林美景，使我的感情升腾起来，不由得自言自语道："祖国的河山是多么壮美啊，多么可爱啊！"

但是，这良晨美景唤起的喜悦，迅即被仇恨代替了。国耻未雪，民族恨未消，美丽的祖国河山还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想到这，恨不能一下子把日寇斩尽杀绝！我立刻回到老苏家的院子里。这时，邵天宝和赵宏钧已经起来了。我们急忙把子弹挖出来，准备马上回山。

正在这时，早起下地干活的小三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李大叔，不能走啊，河北边来了日本鬼子骑兵队啦！”

宝石河流经龙头山下，河北岸是我回山的必经之路。

“骑兵队？！”当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时，不觉一怔，惊讶地问道，“能有多少人？”

“大概有二十多人——都快过桥了！”小三子瞪着两只大眼睛，仍气喘不定地说。

多年的对敌斗争实践告诉我，作为一个指挥官，至关紧要的是，遇事要冷静、沉着、果断。我把挖出来的子弹分给同志们背上，然后一起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同志们一致认为，敌众我寡，对我不利；但敌在明处，我在暗处，且有群众支持，又对我有利。如能出其不意地打击他们，就可能打赢。如果不胜，也可乘机突围。眼前的难题是，怎么能把敌人吸引过来，把他们摆在挨打的位置上。为此，大家苦心琢磨起来。

这时，小李子蹦蹦跳跳地进了院。可能是在我们挖子弹时没注意，他蹓到院外去了。见了他，我立刻生气地说：

“你到哪儿去了？也不报告一声，敌人都快上来了！”

我去观察地形、地物，捎带着抓个小鸟！”说着，他伸了伸舌头，作了个鬼脸。

“严肃些！也不看什么时候！”我有些生气地说。

小李子立刻收住顽皮的笑脸，双脚一拢，双臂下垂，冲着我来了个立正，响脆地喊了声“是！”

我看到他这副孩子相，气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但还

是严肃地说：

“你傻，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来想办法打敌人！”

他走过来了。我简略地说了一下敌情。他听后，使劲地眨了眨眼，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了。

“报告团长，我有个办法。”他一本正经地说着，立正站在我的面前。

“稍息！你比诸葛亮还能耐，一眨眼的工夫就想出了办法！好，你说说看，要不沾边，我打你的屁股！”我以为他又在说小孩子话了。

“乡亲们给咱们送来的鸡蛋不是还没吃吗？就用鸡蛋消灭敌人，你看神不神！”接着他讲了用鸡蛋引敌的设想。

这鸡蛋，是山区的乡亲们送到老苏家，托他转送给抗日游击队的。昨晚，我们来后，老苏把它煮熟了，准备由我们带回山里。

当小李子说了用鸡蛋引敌上钩的全部想法后，老苏的小儿子也自告奋勇，愿和小李子一起完成引敌上套的任务。我和同志们听完，高兴地把小李子抱起来，不住嘴地夸他：

“我们的小李子成军事家了，肚里还真有点韬略呢！”我说着，爱抚地往他屁股上拍了两下。

“这淘小子，真成诸葛亮了，还能给团长当‘军师’！”邵天宝边抚摸着小李子的光头顶边说。

当时，小李子只有十二、三岁。他的家乡在密山，本来是个失去父母的小牛倌，见了我们的队伍，就缠住不放。参军后，跟着同志们学了不少东西，特别是跟着部队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他的胆量也越来越大了。因此，同志们下山执行

任务时，都愿意带着他。在危急关头，这小鬼很会随机应变，或装扮老同志的儿子，或装作青年战士的弟弟，每次都能唬住敌人。所以，这次他主动要求承担引敌任务，我虽然知道这担子不轻，也很危险，但相信他能完成任务，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小李子接受了任务，撒欢儿跑进屋里。一眨眼工夫，他挎出一筐熟鸡蛋，拉起小三子，高高兴兴地到村头执行任务去了。

两个小伙伴走后，我们同老苏一起观察了周围地势。这里距上沟有三里多地，三面是平川，一条乡道正通过老苏的西下屋窗外。敌人无掩身之处，我们却可以利用老苏的房屋和山坡上的树木作掩体。

"就用我这三间空厢房吧！"老苏指着长期不用的西下屋说，"这屋子的窗户冲着大道，得劲打！"

我觉得老苏的意见很好。在屋里设埋伏，可以有效地杀伤敌人；如果打得不利，还可以从后门进入山林，继续坚持战斗，或撤往山里。于是，我们在西下屋构筑了简单的工事——把老苏的粳子袋垛起来作掩体，把堵窗户的土坯抠了几个窟窿作观察孔。我们三个人分了一下工：邵天宝和赵宏钧分别守两头的房间，我守中间的屋子。我们把枪压满了子弹，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宝石河北岸的鬼子兵，象倾巢而出的黄蜂，策马扬鞭，向这边扑来了。接近老苏家院外的稀泥塘时，鬼子骑兵放慢了脚步。

早在那里等候鬼子兵的小三子，迅速从稀泥塘的边缘处

走出来，裤腿挽到了膝盖上，泥浆挂满了小腿，身上、脸上沾满了泥点子。他看见鬼子过来了，急忙迎上去说：

“喂，太君！这边大道变成稀泥塘了，马腿陷进去拔不出来，还是从西边绕过去上大道吧！”

说完，小三子故意跺跺脚，扔扔腿，作出一副嫌脏嫌臭的样子。

“唔，小孩，前边稀泥的有？”鬼子小队长驱马来到小三子跟前说，“撒谎的不要！”

“不信你去试试！我一身脏泥也不是自己抹的！要不是爸爸让抓几个蛤蟆喂鸭子，我才不遭这个罪呢！”小三子说着，连瞅也不瞅鬼子一眼。

鬼子小队长朝着小三子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提了一下马缰绳，回头对小三子说了声：“小孩，大大的好人！”便带队上了小三子指引的路。

鬼子兵绕过老苏家北边的井沿，很快到了西下屋窗外的大道上。小李子正在背靠道边的柳毛塘子、面朝老苏家的西下屋剥鸡蛋，身边还守着一个装满了鸡蛋的小筐。他一看鬼子来了，满心欢喜，却故意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嘴里叼着一个刚刚剥好的鸡蛋，挎起蛋筐就跑。

“小孩，害怕的不要，逃跑的不好，皇军不抢东西！”

说着，鬼子小队长跳下马，朝小李子奔去。小李子忙将蛋筐抱在怀里。

“小孩，不要怕，钱大大的给！”说着，小队长从上衣兜里掏出几张老头票，但却没给小李子。

“太君，这鸡蛋不是卖的，是爸爸让我去慰劳修城防民

工的。”小李子说着，装出要哭的样子。

“八嘎牙路！”鬼子小队长把奸笑的脸一收，立刻露出了凶相，一把把蛋筐夺过去说，“你这小孩，敢说不卖！难道皇军为你们打‘马胡子’还不如几个修城防的臭民工？回去跟你爸爸说，慰劳我们了！”说着，伸手就抓。

后边的鬼子一看小队长动手了，就一窝蜂似地拥上来。小李子刚想趁机溜走，一个大个鬼子上来一把抓住他问：

“小孩，鸡蛋的还有？”他顺手摸了摸小李子的衣兜，失望了。

“太君们给分光了！”小李子说着。

一看大个子满脸不高兴，就朝小队长的衣兜努努嘴。大个子一眼看到了小队长的衣袋鼓鼓的，两撇扫帚眉立刻上下扫了两下，一个冷不防冲过去，一只胳膊搂住小队长，一只手就往兜里掏。于是两个人扭成一团，滚翻在地。别的鬼子，捞着的，坐在道旁狼吞虎咽；没捞着的，也凑到跟前，想来个“渔人得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李子象只山狸子，跐蹓钻进了路边上的柳毛堉子。他绕了个弯，回到了老苏家。

透过观察孔，我看小李子脱身了，就下令打。仇恨的子弹向敌群飞去，鬼子一个个倒在了大道旁。有的鬼子为了抢鸡蛋，把枪扔在了一边。当我发起射击时，许多鬼子竟没顾得上抄家伙，就一命呜乎了。没死的,有的藏在马屁股后边，有的趴在死尸堆里装死。这时，我带领邵天宝，赵宏钧和小李子从窗口跳出去，枪口对准了没死的鬼子。就这样，不到二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二十几个鬼子，除了打死的，俘

虏的，没跑几个。

我们迅速地打扫了战场，安排了老苏家转移，用缴获来的马驮上战利品，就打马回山了。

当我们离开老苏家时，已经是早晨八点多钟。朝阳照耀着披绿挂红的完达山，云雾已消失殆尽。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向宝石河北岸插去。望着那充满生机的群山，巍峨耸立，峻秀挺拔，多么象不可征服的宝清人民啊！

十三、攻克小城子

在宝清西南约三十华里的地方，有一个朝鲜族聚居的村庄——小城子。

小城子位于宝清通往勃利的公路旁。一条不过二、三华里长的乡间土路，穿过村东南的宝石河，在龙头山北麓与通往密山的公路衔接；村西六、七里处是大蘑菇顶子山；西南毗邻青龙山；南与兰花顶子相望。因此，它是宝清通往勃利的必经之路，是去密山常常经过的地方，是宝清通往抗联活动基地——大蘑菇顶子山、青龙山、兰花顶子山的咽喉要道。小城子村北，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孤山。这山虽然并无出奇之处，高度也仅有三十多米，但因地处宝石河子谷地，四周开阔，所以，军事地理位置，就显得很重要。

一九三七年春天，日寇迁来一批朝鲜人给它种水稻，并指令汉奸李长海组建了拥有四十多名团丁的自卫团。从此，筑围墙，挖壕沟，建炮楼，小城子变成了一个军事要地。自卫团的团部就设在小城子村里。一两丈高的围墙，把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城子围了起来。墙外有战壕，墙上有炮楼，村北小孤山上筑起了圆形碉堡，昼夜有荷枪实弹的团丁守卫着。碉堡上那些黑洞的枪眼，活象恶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下的家家户户，望着相邻的群山，监视着过往行人。人们一看见它，仇恨就油然而生。设在村口大道旁的哨卡，与山头碉堡

遥相呼应，成了过往行人的“鬼门关”。

自从小城子成立了自卫团后，不仅当地群众同抗日军的联系受到监视，就连老百姓上集赶店，走访亲友，也受到限制。这些被日寇灌输了民族仇恨思想的朝鲜族团丁，往往以盘查政治犯、经济犯和检查犯禁物资为名，对老百姓敲诈勒索。谁要想在这儿路过，就只好留下“买路钱”；否则，就是给山里人送东西的，就是私通“马胡子”，轻则没收所带财物，重则抓起来，吊打受刑。所以，宝清人民恨透了李长海这些人，骂他们是“二鬼子”。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三十二团在宝清大梨树沟子一带打游击，已经痛感小城子自卫团是绊脚石、眼中钉。抗日积极分子鲁国福等人见了我气愤地说：

“小城子这伙自卫团，都占山为王了，你们怎么还不收拾他们！”

我们何曾不想收拾他们！但小城子傍山临水，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所以没有轻易动它。为了摸清小城子的内部情况，我派排长李青山和一名姓金的朝鲜族战士打入进去。他俩化装成“卖苦力”的，在一天早晨，被小城子种水稻的朝鲜人雇了进去。

李清山等二人进了小城子不久，就搞清了全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扮作“货郎”的我侦察员。同时我给他俩捎去两支手枪，以备作内应。

根据侦察情况，我同副团长孙福、参谋长薛东范等研究了这场战斗的打法，之后，派人去请示师部。师部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派来马副官参与指挥。

一九三七年秋末的一天夜间，我和马副官一起，带领四、五十名战士，踏着漆黑的山路，向小城子进发了。快到鸡叫时，来到了小城子村北的山脚下。

我们将队伍停在小孤山的北面，作阵前观察。向山上望望，什么也看不见，唯有小山的边缘和圆形堡的轮廓映在天幕上。听听动静，除了村里偶尔有一两声驴叫外，就只有带死不活的更梆声(注)。经验告诉我们，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我们必须在黎明前的夜幕掩护下，发起进攻，天亮前结束战斗。

经过现场观察，与事先掌握的情况大致相符，我们决定按原来同马副官研定的方案行动。为防止县城和夹信子警察署闻声来援，特拨十几个人由孙副团长带领，去李卡河附近的山丘上埋伏下来，准备阻击援敌。我带领主力攻击山头堡；马副官带一部分兵力围攻小城子，以牵制敌人。待我攻占山头堡之后，即兵合一处，向小城子发起猛攻。

马副官和孙副团长各自带队走了。我率领主力悄悄从小孤山北坡向上摸，当我摸到半山腰时，突然从村里传来了"啪'啪，啪，"有节奏的击掌声。这是李青山和小金已经干掉了敌哨兵和门岗的暗号。于是，我带领战士急速向山头堡接近。

当前头部队已离山头堡仅两三丈远时，敌哨兵好象发现了什么，搬动着枪栓惊呼："什么人？口令！"

因为敌人胆虚，常常听到一点响动，就狂呼乱喊。我战

注：伪满时，敌人怕抗日军来收拾他们，每个村庄里派人彻夜打更。

士立即伏地，未作回答。当敌哨兵躲进碉堡再次呼喊，并用手电筒向山下乱照时，我机枪、步枪一起响了，封住了敌堡发射孔。乘此时机，我带领战士冲到碉堡前，喝道：

"交枪留命，优待俘虏！"

"替日寇卖命没有好下场！"

敌人听我有机枪，知道是正规抗日军；又听震天动地的喊声，自知已成了瓮中之鳖，就一个个把枪从发射孔扔出来，举着双手，战战兢兢地钻出了炮楼。

在我向山头堡发起进攻时，马副官也开始了佯攻。因为李青山和小金已从内部解决了岗哨，所以，他们一枪没放就进了围子，很快包围了伪团部。

拿下了山头堡，留下几名战士警戒，我就带领其余战士扑下山去，直插敌团部。这时，马副官已带战士冲到敌营房窗外，敌还在凭房据守。虽经马副官反复宣传"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敌人就是不降。我看看天色，西风吹散了漫天乌云，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色。时间拖长了，对我是不利的。于是，我和马副官悄声商定了一个逼敌出营的办法。

因为时值秋末，脱粒的稻草早已干枯。我命令战士们，向村里居民要了些稻草，每人一把，点着了火，顺着房檐烧燎。不一会儿，敌营房的屋檐就象长了红色的翅膀，迎风呼呼燃烧，顿时，整个屋顶变成了火山。火焰卷起一丈多高，映红了半拉天，惊醒了全村人。敌人受不住了，一劲呼喊"饶命啊，饶命啊！"把枪从窗口扔了出来，乖乖地作了俘虏。这些朝鲜族自卫团的"勇士"，有的赤着背，有的披着

用水沾过的被子，有的衣襟上还冒着烟，有的满脸墨黑，象是刚从炭窑里爬出来似的。

我们原打算攻下小城子后，把罪恶多端的伪团总李长海就地正法，以解民恨。但等到集合好俘虏一清点，唯独没了这个恶棍。原来，他在头天晚上外出没回营。后来，他仍不以此为戒，继续同抗日人民为敌，终于被我抗日军打死了。对俘虏，我们进行了一些抗日救国的教育，就把他们遣散了。

虽然太阳还没出山，但天已大亮。农舍升起炊烟，薄雾笼罩河谷，秋霜抹在一捆捆的稻个子上，稻田里犹如堆起银丘万千。我和马副官集合好队伍，一报数，一人没少，一人没伤。同志们扛着缴获的几十支步枪，还有一些子弹和粮食，就踏着晨霜回山了。

出了小城子回头望去，山头堡燃起了熊熊烈火，被烧毁的敌营房还在冒着黑烟。站在村头送别的老百姓，一往情深地向凯旋归山的子弟兵招手致意。

就在我军进攻小城子的枪声刚刚打响的时候，夹信子警察署听到了枪声，署长俞殿昌即刻向县警察署作了报告。县警察署命令俞殿昌率队火速增援；同时请求日本守备队出兵，妄图两下夹击，对我实行报复。

但夹信子警察署几次被我三十二团端了窝，俞殿昌几次被我部搞得团团转，是深知抗日军不好对付的。所以，县警察署令其去小城子增援，从俞殿昌到士兵，没有一个情愿去的。但又不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所以只好带上二十几个人，装装样子，应付差使。俞殿昌带领喽罗们从夹信子出发，到

了徐马架子，只不过走了六、七里路，就叫嚷着“又饿又累了”，逼着当地百姓起来做饭。饭做好，吃完，已是早四五点钟了，小城子的枪声已经停了有半顿饭的工夫。他们估计，抗日军惯于速战速决，枪声停了这半天，可能早已撤走，就继续前进了。

当俞殿昌的警察队来到距小城子不过五里远的李卡河北沿时，从东北方向开来了一队人。因为天尚未亮，看不清对方的军装和旗帜，俞殿昌误以为是抗日军打援的部队来了。本来就怕，又躲闪不及，俞殿昌就命令部下就地展开，来了个先发制人。警察队的一阵枪声，把对方撂倒了三个。于是，遭到突然袭击的队伍，象一队上了阵的火牛，“呀——苦”，叫着，就地卧倒，枪声象爆豆似地响了起来。

俞殿昌一听是日本人嗥叫，把魂都吓没了，立即站起身来喊话：

“太君，误会了，我们是夹信子警察署的，别打了！”

日寇爬起来了。鬼子小队长来到俞殿昌跟前，揪住他的前襟，左右开弓地打了几个嘴巴，臭骂了一顿，然后怒气冲冲地说：

“走，打‘马胡子’去，完了再算你的帐！”

于是，日寇扔下三具尸体，就命令警察队前头开路，向小城子进发了。

埋伏在李卡河附近小丘上的我孙副团长等人，因敌人未进入射程之内，就没开枪，高高兴兴地看了这场狗咬狗的表演。因为小城子的枪声已停了一个多小时，断定我主力部队已撤离小城子，孙副团长就带着伏兵，向大梨树沟子撤去

了。

当日寇和伪警察来到小城子时，我三十二团的战士们早已会师，在大梨树沟子召开了祝捷大会

日寇担惊受怕地劳累了大半宿，连我部踪影都没寻着，白白死了三个人。一怒之下，日本人把俞殿昌带到宝清日本守备队关了起来，把他的警察队也缴了械。我们听到后，都拍着巴掌乐，为取得这一箭双雕的战果而高兴。

十四、狼洞沟突围

俞殿昌干了蠢事，挨了一顿嘴巴，被关了三天，他的汉奸队伍也被缴了械，按常理，他该是忘八钻炕洞——憋气加窝火了。但当日本人把署长的帽子又给他戴在头上，归还了他的喽罗们的枪支时，他顿有再生之感，当即向主子表示：

"俞某不才，误伤太君，罪莫大焉！今太君不以为恨，反给以戴罪立功之机，俞某知恩必报，不死当效犬马之劳！"

从此，俞殿昌这个铁杆汉奸，操纵着手中的反动武装，向我抗日军猛扑过来。

一九三七年春天，为了适应抗日高潮的新形势，师部指示我团化整为零，广泛出击。为此，我将三十二团分成几个连，分别划定了大致活动范围，就在宝清西南山区的百石河子压了密营，将团部设在那里。后来，因我团出了叛徒，带着敌人偷袭我驻地，毁坏了我们种的庄稼，挖走了我们藏的粮食，破坏了我密营。从此，我带着团部的三十几个人来到了狼洞沟，暂时驻在山林把头刘海楼建的"趟子房"(注)里。

狼洞沟是一条有好几里长的山谷。两侧和尽头，山峦重叠，连绵不断，长满了原始森林。谷底，溪水流淌，终年不绝。刘海楼的"趟子房"就建在山谷尽头的山坡上。我们在

注：趟子房系猎民在山里的临时住处。

这里住了一个冬夏。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寇为了进一步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消除后顾之忧，对东北抗日军民展开了“总体战”。它一方面实行了“归屯”政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一方面对抗日军加紧军事“围剿”。在宝清，除了原有的日本守备队、伪兵三十团、武装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宪兵队、自卫团等反动武装外，还从伪兴安四省调来了“兴安军”。这些反动武装狼狈为奸，先是在山边上阻击我进出山的抗日队伍，后来就“进剿”我军活动腹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三十二团的临时驻地，也遭到了敌人的包围。

旧历年临近了。敌人为了能过个太平年，加紧了对我军的“讨伐”。俞殿昌因为急欲立功赎罪，几乎整天在西南山区寻觅我部踪迹。针对这种情况，我对负责团部警戒任务的排长李海伦说：

“最近敌人活动挺猖狂，山里山外都要放上岗哨，千万不可大意！”

根据我的意见，李排长重新安排了警戒，不仅沟口加了双岗，房后的高山顶上，也派了岗哨。

这年冬天，一进腊月，雪就下个不停。过了“腊八”，天气冷得滴水成冰。在这种情况下，李海伦同志考虑同志们的棉衣太薄，山上风雪又大，怕冻坏了哨兵，就擅自把后山上的岗哨撤了回来。这一下子可惹了大祸！

一天早晨，我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敌人进山“讨伐”之机伏击敌人，突然发现距我驻地不过二百米的沟沿上有敌人。我还没看清是日寇还是伪军，只喊了声：“同志

们，有敌情！”敌人的两挺机枪就叫起来了，封住了我们的“趟子房”。敌人靠机枪壮胆，很快冲到了“趟子房”跟前，把我们包围起来。

敌人的枪在叫着，我们在冷静地观察着。阵前的敌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既有俞殿昌的警察队，也有森林警察队，总共不下二百人。

我一看这阵势对我很不利，就命令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寻找机会突围。起初，我们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后来，我们采取了以逸代劳的策略，既不组织突围，也不还击，只是静静地躲在屋里，偷偷观察着敌人的火力。

敌人打了一阵枪，就开始喊话：

“快投降吧，跑不了啦！”

“投降有好处，给官当！”

“投降了，吃香的，喝辣的！”

不管敌人怎么喊叫，我们就是不作声，也不还击，心想：当他们以为屋里人全被消灭冲上来时，我们猛然开火，打它个措手不及。但敌人多次同我们打交道，被打怕了，只是躲在掩体里瞎咋呼，乱放枪，没有人敢抬头正视我方。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又生了个主意。

我安排几个人监视敌人，就召集团部的干部们开了个紧急会，研究如何突围。大家认为，敌人都是胆小鬼，如果我们能把敌人的两挺机枪除掉，就等于敲碎了它的胆，为突围创造了条件。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很对，就说：

“当初，我部以少胜多，全歼杨保贵的自卫大队，靠的是不怕死；今天突围，更要靠革命胆略。眼下，突围成败的

关键，是能否除掉眼前的这两挺机枪，而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经大家一分析，同志们突围的信心更足了，即刻研究了突围的具体措施，以及突围后的集合地点等。

我主动承担了打机枪的任务。我把两只德国造的长苗匣子压满了子弹，谨慎地向门口爬去。这时，敌机枪子弹呼啸着，打在门前，掀起阵阵烟尘；钉在小房的墙上，泥土一片片落下来，屋里充满了尘埃；窗户，已被敌人的机枪打掉了；蜡木做的门，也被打得千疮百孔。我回头看看，一名小战士把吸引敌人火力的伪装物已经做好了。

敌人足足打了半个多小时的枪，见我小房里仍无动静，就以为我全部被歼了，呼喊着爬起来，向小房挨近。这时，敌机枪为掩护同伙，仍在叫着，但弹着点已有变化。这时，我一声令下，同志们一齐开火，我的两把匣子同时叫起来，敌射手顿时趴在了枪体上。敌机枪一哑，冲上来的敌人又遭我意外袭击，顿时慌了神。就在这一刹那间，负责吸引敌人火力的那个小战士，把用木棒和棉大衣绑成的伪装物，从窗口扔了出去。敌人以为我从窗户跳出来了，就把火力集中在那里。我抓住战机，一声令下，同志们喊着，杀声震天动地，从门口冲出了小屋。出屋后，我又向敌群抡了两梭子。

敌人本来就慌神，见我突了出来，又挨了一阵子弹，不知是被击中了，还是吓坏了，立刻就卧倒了。远处的敌人见此情景，也早已心惊肉跳，乱了枪法。就在敌人的一阵慌乱中，我三十几名同志冲出包围，在山林掩护下，向沟外撤去。

在撤往沟外的途中，一颗敌弹飞来，击中了李海伦同志

的腹部。肠子冒了出来，他用左手揉了进去，捂住伤口，趔趄了几步，倒下了。我一看他负了重伤，急忙带人回来背救。因为流血过多，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到了跟前，命令两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背他走。往起一捆，他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说：

“团长，我……不……不行了。”他望了望身边的大枪，又动了动握在右手里的手枪，声音微弱地继续说，“大的，背……背走；小的，留……留下。”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即刻将他的手枪压满了子弹，仍放在他的右手里。他合上眼睛，似乎安静地睡过去了。

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喊叫着，射击着，冲过来了。我急忙组织火力阻击。枪声唤醒了昏迷中的李海伦同志，他再一次断断续续地说：

“团长，快……快撤，全团……要紧，我……不……不行了。”说着，他用眼望了望“狗头”。啊，他还要参加战斗！我急忙跑过去，接过枪，扳起“狗头”，又放在他的右手里。

就在我跑到李排长身边时，敌人兜过来了。我一边指挥还击，一边弄一些柴草把李海伦遮盖上。当战士们按我的命令一一撤走时，我对李海伦说：

“小李，你要注意隐蔽，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不要打枪。等到打退了敌人，我们来接你！”

李海伦点了点头。通过柴草缝隙看到，李海伦的目光，仍紧紧地盯着山下的敌人。我用雪掩埋了地上的血迹，就去找队伍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我们在沟口设岗处集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在突围中，除了李海伦负了重伤，留在了战场上外，还有一名文书牺牲了。同志们见我在风雪中光着脑袋，都惊奇地问我的帽子哪儿去了？这时我才觉得有些冷。原来在突围中，帽子被打飞了。我赶紧弄了一条白毛巾包在头上，过了一冬。

傍晚时，敌人退走了。我急忙带队迂回到李海伦隐蔽的地方。他已牺牲了！掩盖他的柴草，已被风吹走，手枪也没了。但在他身边，却留下了四五具敌人的尸体。英雄的战士，至死也没饶过敌人！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李海伦同志的遗体抬到一个山坡上，掩埋了。然后向茫茫的夜空鸣了三枪，表达我们对死者的敬意、哀思和对敌人的仇恨。

十五、关门山上过大年

从狼洞沟突围出来，我们没了住处，就在宝清西部、南部山区里转悠。农历腊月二十六、七的时候，我带着部分队伍来到了宝清南部的关门嘴子山上

因为日寇把山边上的居民都赶下山，关进了土围子，使我抗日部队处境更艰难了。一冬的积雪，把山上可吃的东西全覆盖了。没有粮食，我们就只好靠秋天积存的一点干菜和扒一些可吃的树皮维持生活。年关迫近，越发地令人感到生活担子的沉重。

就在这种情况下，抗联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注）同志带着二十几名战士，来到了我团的临时驻地——关门嘴子山。

季青同志原籍黑龙江省依兰县，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后，出于爱国热情，在我党坚决抗击日寇入侵的正确路线感召下，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的第一线。他性格内向，言语较少，但待人至诚，讲话引经据典，富于哲理。因为我团与五军二师驻地距离比较近，又远离我三军四师驻地，所以，有些拿不准的政策，就常向季青同志请教；有些军事行动，也常常互相配合。因此，我团的同志们对季青同志都比较熟悉，也愿意接近他，亲切地称

注：季青同志现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他“季主任”。尽管后来他的职务升迁了，但人们仍这样称呼他。在眼见着就要过大年的时候，他带着队伍来到了我团驻地，大家非常高兴。谈论起来都说，这回咱们可要过个大团圆年了！

但是，我作为团长，在与全体同志分享战友团聚的喜悦之余，却情不自禁地想：我团的战士和二师的同志们苦熬了一冬，赶上一块过大年，难道还要继续吃干菜、啃树皮吗？必须要想办法改善一下！

可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个“膳”可要怎么改呢？要说粮食，只有半斗多小米了。熬粥喝，也不够全体同志吃半饱的。况且这点米，已经存放几个月了，同志们视若家珍，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动用的。要说肉，也只有一个牛头了，埋在南山雪窝里，还不知被野兽发现了没有。从打五军的同志们到来之后，我就更为过大年费心思了。但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这天清晨，山风裹着雪花，吹打着人们的脸庞，喘口气，都使人感到彻心凉。

因为天冷，又有心事，天刚放亮，我就醒了。看看睡在地窨子里的战士们，他们睡得正香，靠近鼻孔的帽耳子上、前襟上，结了厚厚的一堆霜。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甘愿把苦当作甜！越是看到同志们一声不响地这样苦熬着，我就越发地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滋味油然而生。我怀着焦急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出了地窨子，信步向山林深处走去，想让冰冷的风雪吹打一下大脑，平静一下翻腾不已的思绪。

"老李，你在散步啊！"

身后传来了季主任的声音。我回过身，他已来到跟前了。

"哪有闲心散步啊！没睡好觉，脑袋发胀，让风雪吹一吹，清醒清醒！"

"为过大年的事在费心思吧？"季青同志以政工干部特有的敏感，看透了我的心事。我笑了。

"是要想点办法哟！"他亲切地说，"过大年，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同志们苦熬了一冬，应该改善改善。"

"几天来，我就为这事伤脑筋，几次派人下山打给养，也没成功。在南山的积雪里埋着半斗多小米和一个牛头，还不知丢没丢？如果没丢，挖出来给大家过个年吧！"

我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

在艰难的岁月里，革命队伍里常有那么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投敌变节。投敌后，为了表白对日寇和汉奸的效忠，往往领着人来偷袭我密营，将我们的家底一扫而光。为防不测，我们总是把吃用的东西掩藏起来。

季青听我说还有点"积蓄"，就高兴地说：

"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挖回来，把牛头架在火上烤熟，锅里多添点水，下上几升米，让大家吃一顿年饭吧！"

看着主任充满喜悦的脸，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俩唠着如何过大年，回到了地窨子。

改善生活的事，犹如一股春风，吹遍了驻地。战士们喜形于色，互相传播着。但当大家知道要动用那点小米时，不约而同地把我围了起来，诚恳地表示了他们的意见：

"团长，依我们看，咱们还是吃点干菜吧，那点小米留给伤员，还能维持一阵子！"

当时，季青正在我跟前。他听了，觉得战士们想得远，说得对，但也觉得同志们越是这样要求自己，越要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于是他说：

"也好，那就少放点米，多添点汤，煮得烂烂的，每人一小碗；吃没了，再吃干菜！"

我觉得季主任考虑得全面，就按他的意见办了。于是，烧水的烧水，架柴的架柴，挖粮的挖粮，驻地的山林里充满了节日的欢快气氛。

当同志们把粮食和牛头取回来时，篝火已熊熊燃起，满锅的清水上下翻滚着。两三升小米下到锅里，清水很快变成了米黄色。牛头被架在三根木棍上，火焰燎烤着，不一会儿就发出了吱吱啦啦的响声。锅里的小米翻滚了一会儿，就开了花，发出了诱人生涎的清香。饭香混着牛头的膻味，在山林里随风飘荡。

同志们围坐在篝火旁，有的在烘烤湿了的靰鞡，有的在擦拭着枪支，有的在谈论着全国抗战的形势，大家的脸上浮现出了节日的喜悦。十四岁的女战士杜庆云，象个不知寒冷、不知疲倦的小鸟，蹦蹦跳跳的，嘴里不住地哼着《伪兵自叹》的小调：

皓月当空明如昼啊，
亲日的士兵自叹站在岗楼，
手扶着枪杆泪交流，

哎哎哎哟，

思想起来啊犯了忧愁，

……

她嘴里唱着，不时地装一装伪兵月夜站岗、思前想后、满怀忧愁的可怜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长辈人亲昵地夸赞说："小杜这妮子，长大了能出息个好演员！"

杜庆云的小调刚刚落音，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同志们，小杜唱的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随即爆发出一阵掌声。清雪落到手心里，立刻被拍化了。一张张粗犷热情的脸，堆满了笑容，一齐瞅着小庆云。

小杜这姑娘很机灵，她一眼看到季主任也在拍着手，跟大家一起喊着"要"，就提高嗓门喊：

"季主任的学问可大了，不光会唱歌，还会编歌，请他给大家唱一个好不好？"

这一招很灵！大家随着小杜的清脆喊声，把目光集中到了季主任的脸上。季青同志看到同志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情绪这样高昂，很高兴，立即用东北小调唱起了他自己编的《抗联教导队歌》：

……

我东北父老兄弟三千万，

日本强盗来蹂躏，

谁能心甘？

男女老幼齐奋起，

誓与敌人战！

白山黑水已变色，

革命奏凯旋！

……

歌声一落，掌声响得更烈，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要他再唱一支。

恰在这时，一个哨兵疾步跑来了。看他急切的样子，十有八九是发现了情况。大家的目光随着他的脚步，移到了我的跟前。只见他气喘不迭地说：

“报告团长，山下有响动，象是有人摸上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山林里的欢快气氛为之一扫。

我和季青同志分析，正是大年三十儿，既不会有人进山砍柴、狩猎，也不会有人来送给养，恐怕是敌人乘我过年之际来搞突袭了。于是，我压低了声音下达了命令：

“准备战斗！来的如果是大帮敌人，就‘欢迎’它一顿炮火，然后转向南山；如果是小股敌人，就一口把它吃掉，武装武装我们自己！”

同时，为了把情况弄确切，我派三连连长带一名战士迂

回到山下，作进一步侦察。

一切部署完毕，我和季青同志分别带领战士爬上岗，进行战斗准备。战士们一说打仗，就精神起来了，有的把地上的死树横过来作掩体，有的把大块的积雪堆放在自己的掩体上，有的趴在树墩后边观察着山下的动静，有的钻进了灌木丛，趴卧在积雪上，握紧了启开盖的手榴弹。这时，饥饿、严寒、过大年等等，统统都抛到脑后了，同志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让敌人活着上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敌人的影子。大家不由得往山下张望。这时，只见三连长带领战士回来了，满山林里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声：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下没有敌人，是老大爷给我们送给养来了！"

这喊声象春雷，驱走了严寒。人们的心头立刻流过一股暖流，浑身顿时热乎乎的。同志们迎着喊声抬起头来，一双双惊喜的眼睛朝山下望着，只见三连长和一名战士各自背着一个口袋，后边跟着两位农村老大爷，艰难的向上走来。我立刻带领战士迎上去。当我来到他们跟前时，不由地呼喊起来：

"哎呀呀，原来是赵大爷、刘大爷啊，看把你俩冻的！"

两位老人都已年过半百，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衣襟上，帽耳上，眉毛上，都结了白花花的一层霜雪，胡须上，挂着冰溜子。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迎上来，有的为两位老人扑打着身上的雪，有的搀扶着老人，有的接过连长和战士背的

口袋，有的急忙跑回篝火堆旁拨火架柴。

赵大爷和刘大爷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几年来，他们经常给抗日部队送信、送粮、送衣物，但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他们还穿过敌人封锁线，冒着风雪上山来……。同志们望着两位老人送来的小米、豆包、冻豆腐和开膛鸡，不知用什么话能把感激的心情表达出来。一个战士急忙盛来两碗稀粥，递给两位老人，说："大爷，快喝了吧，暖和暖和身子！"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和季青陪着两位老人坐在篝火旁，季青一边用木棍拨着火，一边望着两位老人的脸说：

"你们来得正好啊，我们的年饭做好了，就和大家一起吃一顿军民团结饭吧！"

这时，牛头肉烤熟了。战士们拣最肥嫩的牛下颏肉撕了两碗，端到了两位老人的面前。每个战士各分了一碗稀粥，一小块牛头肉，就香甜地吃起来。

两位老人看到战士们的这顿年饭，又看到同志们这生气勃勃的样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好半天没说出话。我见两位老人很激动，知道他们是为我们的艰苦生活而难心，就宽慰说：

"这困难是暂时的，将来光复了，我们杀猪宰羊、蒸饽饽，再热热闹闹地过胜利年！"我见他俩谁也不动筷，就把肉碗往他俩跟前推了推说："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这肉还是留给同志们吃吧！"刘大爷由于激动，声音有些沙哑，"你们多吃一口，多杀几个鬼子，比我们这老骨头吃了强多了！"

"你们为民除害，也在为民受苦，嗐！"赵大爷长叹了

一口气，看样子还想说什么，但喉咙哽噎了。

“大爷，没有不晴的天，黑暗过去就是光明，苦尽甜就来。”季青同志以坚毅而缓慢的语调说，“咱们军队和老百姓这样心贴心、肉连肉，还愁打不垮日本鬼子？你们看着，最后完蛋的决不是我们这些困守山林的抗日军，而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

两位老人和战士们听了季主任的话，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赵大爷激动地说：

“日本鬼子搞什么‘归大屯’，想把老百姓同你们隔开。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样一来，咱庄稼人的心和你们贴得更紧了，一有个刮风下雨、风吹草动的，就惦念着山里的人们哪！”

战士们听着老人的倾诉，看着他们送来的给养，感到无比激动。

在冬季的山林里，日头一落，星光很快就露脸了。在我们的驻地，五大堆篝火熊熊地燃烧着，火光映红了山林。战士们围着篝火欢腾起来：有的在表演“摸敌哨、抓舌头”，有的几个人作“摸瞎”游戏，不时地引起一阵阵笑声。虽然雪停了，但不大不小的山风还在断断续续地吹。因为天气冷，大家高兴，就围着篝火扭起东北大秧歌来，既欢乐，又取暖。善歌好舞的杜庆云，一边扭，一边唱着她最喜欢唱的《伪兵自叹》歌：

新年一过另想章程，
长期那个请假呀，

回到家中，
或是哗变或当抗日军，
哎哎哎哎哟，
从今后不当亡国兵啊！不当亡国兵！

季主任见此情景兴奋地说：

"同志们，现在是大年三十除夕，按我们的民族习惯，这天夜里是要守岁的。让我们以抗日军人特有的欢乐来辞旧迎新吧！"说着他带头活跃起来。同志们跟着扭呀，唱呀，忘了疲劳，忘了饥寒，人人沉浸在对胜利的向往中。这时，不知是谁唱起了《四季游击歌》，声音由弱到强，渐渐汇成了一组震撼山河的强音：

冬季游击，
雪地又冰天，
风刺骨，
雪打面，
手足冻开绽，
爱国男儿不怕死，
哪怕艰难！

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烤暖了狂欢者的身体。这雄壮的歌声，划破除夕夜的星空，随着山风卷起的阵阵松涛声，飞向远方，迎来了全国抗战的新高潮，迎来了更加艰难的抗战新岁月。

十六、"烈士山"激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我团驻地附近的五军头道卡子发生了一场激战。激战双方是：抗联五军八团一连的十六名指战员，同四百多名敌骑兵遭遇。激战一天，毙敌百余，伤敌三十多，毙敌军马九十多匹；我坚守阵地的指战员中，有十二名壮烈牺牲，四名突围。为表彰抗日勇士们的战绩，纪念牺牲的同志，经抗联二路军党委决定：将我英雄战士坚守的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当时，我三军四师三十二团的驻地，离发生激战的地点不过十几里，枪炮声听得真真切切。当我判定是抗联五军头道卡子遭敌攻击时，在派战士孙胜林去五军密营报告军情的同时，派出两个连去增援。因为积雪太深，行军艰难，当我增援部队到达发生激战的地点时，天已黑下来，打了一阵，我小孤山阵地就失守了。

我部战士回来跟我讲了参加战斗的经过，后来见到五军的同志们，我又询问了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打那，十二烈士的英雄形象，激战时的壮烈情景，就刻在了我的脑际，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日寇为了推进侵华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经一九三七年冬实行归屯并户，推行"保甲连坐法"和调兵遣将等措施后，于一九三八年春对我抗联活动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

进攻。

在此形势下，东北抗联各军加强了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归屯计划，拔据点，除奸特，扒铁道，炸列车，毁桥梁，破坏“警备道”(注),伏击“讨伐”队等，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十二烈士山”的光辉战绩，就是千百万抗日斗争事例中的一个片断。

东北抗联二路军总部后方和五军三师密营，设在宝清、勃利、密山三县交界处的蓝棒山。在距密营三十多里外的尖山子北坡漫岗转弯处，设了头道卡子，由五军三师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同志，带领六十多名战士把守着。

八团一连指战员，多是猎民出身的炮手，不仅惯于山林射猎，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被称为“神枪手队”。连长李海峰，虽左眼失明，但能在二百米内弹不虚发，甚至在七八百米内，也常常命中，被誉为“射手之王”。这个连队，自一九三七年七月随同宁安森林警察大队起义以来，战斗力日益增强，曾打过不少胜仗，被他们歼灭的日伪官兵，不下三百五十名。他们驻守的头道卡子，不仅负有保卫二路军总部和五军三师密营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牵制来犯之敌，为大部队迂回歼敌创造战机的重任。

就在敌人向我活动基地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五军三师接到了二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要他们集结八、九两团，准备向勃利、密山地区转移。为此，三师师长李文彬于三月十

注：日寇在山林里修建的通道，是供对付抗日军用的。

六日命令八团：务于十九日前，将宝清西沟与百石河子之间的警戒部队撤回，速向蓝棒山北麓的李炮营集结。地处宝清西沟与百石河子之间的五军三师头道卡子，也在必撤之列。

但八团给一连的命令是：十八日拂晓前撤出警戒，待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到来后，一道向李炮营集中。李连长考虑，从头道卡子到李炮营有五十多里艰难山路，又碰上漫天风雪，担心十九日前赶不到集结地点，何况去富锦出差的张凤春，能否在十八日准时到达头道卡子，还说不准。为此，他建议：由他和班指导员带领十三名战士，携一挺轻机枪留下来，等候张副官；由副连长带大部分同志向李炮营进发。

副连长虽然对留下的同志有些担心，但经李连长解释，终于通了，带起队伍出发了。

这样，留在头道卡子的就只有这十五名同志了。

李海峰带十五名同志等了约两小时，张凤春同志终于来了。李连长问起一路上见到的情况，他说："富锦、宝清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在四处搅扰搜查。我们应该马上出发，尽快向李炮营集结！"

李连长采纳了他的建议，上午八时许，就率队离开了头道卡子，沿着山谷，向李炮营方向行进。

这年冬春，气温低，常常下雪。虽然已是三月中旬了，但山谷里的积雪还很深。李连长带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进在风雪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仅走出十来里路。李海峰觉得这样下去，很难按时到达目的地。他急走几步，要赶到前头去带队急行。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距此约一千米的山边上，有一队

约三百多人的骑兵，与我队同向行进；在这队骑兵后约两千多米处，另有一队骑兵，约一百多人马，寻着我小队的足迹追了过来。两敌急驰，意欲对我小队构成包围。李连长观察了一下，断定追踪来的是日本骑兵；与我同向奔驰的是伪兴安军。

伪兴安军，是日寇为了对付驰骋在黑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抗日军，特意在伪兴安四省培植起来的蒙古骑兵。他们配有马枪、马刀、手枪、套马索、滑雪板等，马上马下的枪技刀艺都有一些功夫。自一九三七年冬进入三江平原以来，烧杀掳掠，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激起了三江人民的无比仇恨，曾几次遭到抗日联军的沉重打击。

李海峰同志眼见这阵势，感到情况严重。于是当机立断，命令同志们："跑步占领左前方的小孤山，准备战斗，快！"他说着，挥动着手里的驳壳枪，带领同志们向小孤山奔去。

这座小孤山，矗立在大顶子山南十余华里的平川地上。站在后面的高山上望去，山势低缓，象个小丘；从正面看，山面矗立，树木参天。山高虽仅百余米，但在山前约三百公尺的缓坡上，积雪填平了坑坑洼洼，行动起来十分困难。山上，巉岩林立，怪石叠卧，古松蔽日，榛莽丛生，构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李海峰带着十五名战士登上山顶，在约五十米的山脊上，面对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选择有利地形地物，迅速筑起了一个个雪堡，同比我多几十倍的敌人，摆开了决战的阵势。

上午十一时许，在马步枪和机枪掩护下，伪兴安军和日本鬼子，分别从西北和东南方向朝小孤山冲来。这些野蛮骄横的敌人以为我小队仅十几个人．他们几百人的马队冲上来，捉、杀我十几个人，还不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敌人发疯似地挥舞着马刀，马嘶人叫，蜂拥而上。

我阵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从多次与敌骑作战中体会到，对付这些家伙的最好办法，就是连发射击。因此，除了机枪射手李芳邻同志已经作好迎敌的准备外，同志们自动组成了“排子枪”。李连长象一头雄狮，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跃到那，检查着工事和火力组织情况，嘱咐同志们说：“一定要沉住气，注意节省子弹！”

敌人越来越近了，一百米，五十米……李海峰同志猛然一跃，驳壳枪哒哒哒响了起来。枪声就是命令！顿时，我阵地的机枪、排子枪、手榴弹，象堤水开闸一样，一齐呼啸着向敌群射去。敌人一排排坠下马，向山下滚去。而后面的敌骑还在往上来，马踏在伤敌身上，声声惨叫。我阵地战士跃起猛射，敌人在山坡上留下了一片尸体，退了下去。从此，敌人再也不敢欺我人少，施展“羊群战术”了。

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了，我阵地无一伤亡。小队的同志们怀着胜利的喜悦，赶忙修整工事，准备迎接敌人更凶猛地反扑。

有了第一次教训，敌人改变了进攻方式：蒙古兵远远地架起了骑兵炮，一个劲地向我阵地飞泄炮弹；日寇排起机枪，向我小队猛射。小山上，随着一颗颗敌弹炸响，积雪腾空，树木断折，子弹打在岩石上冒出一股股白烟。

我十六名战士被敌火力压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李连长同战士王发等人躲在厚厚的雪垒里，静听着山下的动静。王发是个急性子人，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用枪杆把雪垒捅了个窟窿，偷偷向山下观望。当他看到敌人已经徒步来到半山腰时，他说了声“敌人上来了！”欠身甩出一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恰在这时，一颗敌弹落到王发的身旁，他牺牲了。李连长正在用积雪掩埋战友，一个伪兴安军连副冲到他的身后，被坚守在东南阵地上的魏希林发现了，大声喊道：“连长，身后有敌人！”李连长忙一回头，伪连副已经栽倒在地，死在了魏希林的枪弹下。这时，几个穿踏板的敌人冲到了我前沿阵地，最近时，两军仅有一石之隔。敌人甩过来的手榴弹，未及爆炸，就被我战士拾起来甩了回去，在敌群中开了花。当大部分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李芳邻端起轻机枪一阵猛扫，把敌人推了回去。于是，山坡的积雪中，又添了一些敌人的尸体。

敌人遭我两次沉重打击之后，更加胆怯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又以机枪、骑兵炮的“二重唱”为前奏，开始了第三次进攻。

在西北阵地上，面对狂叫的敌机枪，李连长沉着地组织着新的战斗。敌机枪在约三百米处狂叫，敌群却不敢出动。经验告诉战士们，敌人总是在凶猛地发泄一阵火力之后开始“羊群上山”。李海峰同志不等敌人出动，就开始杀敌。他从东南阵地上调来了枪法超群的魏希林和夏魁武，同自己一起进行有把握地远距离射击，先后击毙了五名敌机枪射手，逼得敌机枪不得不后撤。就在敌人扛起机枪后撤的当儿，李

芳邻的机枪响了，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敌机枪锐气受挫后，架在东南山的骑兵炮又疯狂起来，炮弹接二连三地落在我军阵地上。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从东南和西北两面向我阵地发起了冲锋。约百人的蒙古骑兵换上了滑雪板，快速向我西北阵地冲来，日本守备队约五十骑，向我东南阵地猛驰。两敌妄图用快速夹攻的战术拿下我阵地。在敌人猖狂进攻面前，我阵地的勇士们沉着冷静，有效地发挥着排子枪的杀伤力，配合着李芳邻同志的轻机枪，织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力网。滑雪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被打得仰面朝天，滚下山坡；后边的敌人，急忙卸掉踏板，卧在雪窝里。这时，我阵地李才和王仁志相继牺牲了，李连长、班指导员和排长朱雨亭先后挂了花。李连长把仇恨凝集在枪弹上，配合着李芳邻的轻机枪，把畏缩在雪窝里的敌人一一钉死；余者，连滚带爬逃下山去。接着，日本骑兵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时，魏希林和夏魁武从西北阵地回到东南阵地，在班指导员的指挥下，全体战士配合默契，把敌人拦在了半山腰。在打退日寇的冲锋时，我小队战士陈凤山中弹倒下了。

敌人的三次进攻均遭惨重伤亡后，敌首恼羞成怒，对其喽罗大声骂道：

"小小的一个山头，就那么十几个人，抓不到活的，就给我统统打死！"在敌酋一阵狂叫谩骂之后，敌又向我发起了第四次进攻。敌骑兵炮再次向我阵地倾泄炮弹，敌轻机枪对着我阵地凶猛射击。在炮火掩护下，日寇和蒙古军倾巢而出，向我阵地卷来。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经三次激战，我小队已牺牲了四名同志。剩下的十二名，也多数身负重伤。但他们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地组织着火力。敌人从四面往上冲，他们就把仅有的十二人分成四个小组，各把一方，互相配合。

把守西面的李福胜，正在进行运程单射，忽然一颗六〇炮炮弹在身后爆炸了，把他掀起一丈多高。当他落地时，已不省人事。他醒过来后，浑身麻木，两腿不能动了。他自以为是挂了花，但细一看，身上并无伤痕。他用双手拍打双腿，使出全身的力气活动，终于挣扎着爬起来。这时，他一看敌人正往上摸，就急忙抄起枪来对敌射击。

我阵地的其他同志，先是用连珠枪进行远程单射，撂倒了十几个敌人。接着，李连长、班指导员和朱排长的三把驳壳枪一阵连射，打住了已冲到半山坡上的敌人。魏希林和夏魁武两个神枪手，专打敌人身后的机枪射手。唯独李芳邻没动，因为他的机枪子弹不多了，必须用在最关键的时刻。

敌人被我严密的火力网阻止在半山腰。稍停了一会儿，又开始上了。当敌人冲到我阵地跟前时，李连长一声喊"打，"李芳邻的机枪唱了起来，敌人被阻在我阵地前的雪窝子里，有的装死，有的不动了。在这次战斗中，把守东面的魏希林胸部受了重伤，血流不止。可他顾不上护理伤口，摸出一联子弹正往枪堂里压，忽然天旋地转，倒下了。早已负了重伤的朱排长，一看魏希林牺牲了，急忙滚到他的身边，捡起连珠枪就射。一颗敌弹飞来，朱排长也牺牲了。班指导员见东面只剩了杨德才，不顾胸部和头部的伤痛，忙从

南面赶过来。

战斗到太阳落山时，我阵地已有六名战士牺牲了，李连长的腿已几处负伤，不能动了。有的同志打光了子弹，就把枪拆开，扔到深雪窝里。

在此情况下，敌人又开始进攻。在东面的阵地上，仅有班指导员和张全富两个人了。敌人疯狂射击，班指导员再次负伤，昏迷过去。敌人迅速冲进了我阵地。张全富的枪没有上刺刀，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他顺手抓起两颗手榴弹，猛然拉断了弦，朝着敌群冲去。敌人吓得茫然不知所措。两声巨响，我英雄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了班指导员。他一看，两个鬼子正在东张西望地寻人，就勾动了手枪的扳机，两个鬼子应声倒地了。随后，他闭上了眼，停止了呼吸。

在阵地的南面夏魁武和另一名战士正同进入我前沿阵地的敌人拚搏。他俩打死了四名敌人之后，夏魁武中弹牺牲了。敌人趁机冲了上来。我另一名战士急忙拉响了手榴弹，把敌人杀了回去。

在我西北两面的阵地上，李连长让杨德才和张凤春把屈指可数的子弹收集起来，分别压在几支枪内。然后，张、杨二同志抬着他，敌人从这边来，就把他抬到这打；敌人从那边上，就把他抬到那边射击，一枪一个，充分发挥了“射手之王”的威力。在这场战斗中，为李连长压子弹的杨德才也牺牲了。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小队阵地上只剩五名战士了，而且有四名负了伤。与我小队整整打了一天、遭受重大伤亡的日

军和蒙古军，暂时蚁聚在山下不动了。这时，李连长想起了张凤春身上带的信件，决定由他带三名伤员突围，自己作掩护。

李连长象一只受了伤的猛虎，静静地卧在山头上，观望着山下的敌人，为同志们寻找可以突围的机会。

一会儿，敌人偷偷地从东南面向我阵地摸来了。当几个日寇出现在我阵地前沿时，李连长猛地甩出一颗手榴弹，炸倒了四个敌人，其余的，狼狈退了下去。就在这个当儿，张副官遵照李连长的命令，带领其他三名伤员，从西北两个方面滑下山坡，在山麓扒了个雪洞，隐蔽起来。这时，我三十二团援兵赶到了。但因天黑看不清目标，只好鸣枪镇敌，谨慎前进。

敌人终于冲进了我阵地。李连长又甩出一个手榴弹，一声炸响，几个敌人丧了命。敌人卧在我阵地前沿，窥视我阵



地情况。当他们一眼看到受了伤不能动的李连长时，突然一枪，李连长叫了一声不动了。四、五个敌人以为他已被“击毙”，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当他们来到李连长跟前时，李连长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我们的英雄连长用自己的生命又消灭了四、五个敌人。

敌人整整攻了一天，死伤一百余骑，才算占了山头！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除了积雪下我英雄战士的尸体外，连一支完整的枪支都没捞着！

就在头道卡子遭敌攻击，我一连小队与敌激战的当天下午，抗联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五军参谋长王效明同志，据情判明是五军头道卡子遭敌攻击时，急与三师师长李文彬商定：立即派八团全部步兵、总部直属骑兵警卫队、三师骑兵连，急速增援。援兵行至途中，遇到了突围出来的张凤春同志。他向王效明、李文彬同志汇报了“烈士山”战斗情况。王效明与李文彬听后研究判定，敌人必然很快撤回宝清。于是，他俩带队来到了敌人回宝清的必经之路——大顶子山北约五里路的深谷转弯处，布下了伏兵。

三月十九日上午，日本守备队和蒙古骑兵，垂头丧气地进入了大顶子山深谷，惶惶然向宝清城行进。当他们进到我五军伏击地时，两边山上的机枪、排子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了一片，当即毙敌六十余名，伤敌二十余名，获军马二十多匹，另有战刀、枪支、钢盔、滑雪板、套马索等军用物资若干。

战斗结束后，张凤春领着部队来到了其他三名伤员的隐蔽处，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医院。

随后，王效明、李文彬同志率队来到了勇士们坚守的小孤山阵地，检查了英雄的战绩，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在烈士合葬墓前，王效明、李文彬等同志肃然敬立，山上、山下的全体指战员，纷纷脱帽默哀，向十二烈士致敬！王效明同志宣布了军党委关于命名小孤山为“十二烈士山”的决定。

事后，抗联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同志写了一篇《宝清烈士山十二烈士苦战记》，印发各军，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的斗志。周保中同志为十二烈士写律诗一首：

蓝棒山顶云雾垂，
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
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
倭奴伪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
胆壮气豪动神鬼。
不惜捐躯为革命，
但愿失土早归回。
他年民族全解放，
指点沙场吊忠魂。

十七、戴焕章铁心抗日

一九三八年农历五月九日下午，一辆警戒森严的囚车，从宝清县宪兵队的大院里驶出来，急速地向西驰去。车上反绑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青年，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押往刑场。他面对寒光闪耀的杀人刀，怒视着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坦然自若，时而引亢高歌，时而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为之惊惶不安，路人为之感佩涕零。他，就是我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副官戴焕章同志。

戴焕章，原名戴文贵，曾化名戴云龙、戴云鹏、戴云飞，一九一五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稗地沟村一个佃农家庭里。自幼聪慧好学，性情刚直。十岁以后，曾读过几年私塾。

戴焕章十六岁那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富有革命传统的岫岩、凤城人民，在民族英雄邓铁梅的号召影响下，奋起抗日，组成了抗日救国军，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戴焕章家住山区，经常接触抗日游击队，邓铁梅、苗可秀等人的抗日救国事迹，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少年的爱国之心。遂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春天，年仅十七岁的戴焕章，突破家庭的阻力，毅然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因他念过几年私塾，文笔颇为流畅，很快就在救国军的一个营部里当了秘书。

戴焕章参军后，日寇把他的父母、兄弟、亲友等十几个人，一起抓进监牢，施加各种酷刑，妄图逼迫他们交出戴焕章。但这一招失灵了。敌人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戴文胜（戴焕章的长兄）放出来，勒令他以骨肉之情和亲人的安危，打动、引诱、威胁戴焕章上钩。但戴文胜深知胞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没找戴焕章，却乘机逃跑了。日寇把戴焕章的亲人关押了一、二年，可一无所获。

这期间戴焕章闻知日寇残酷折磨他的亲人，更加坚定了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跟部队一起，驰骋疆场，一次又一次的同敌人展开了激战。

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间，抗日救国军三十多人，来到了岫岩县北部的黄花甸子村，突然遭到了日寇袭击。日军的兵力多于救国军几倍。经激战，救国军失利四散了，仅剩下戴焕章和他的盟兄刁福长等五人，分别守在两间民房里。戴焕章和刁福长各使一支“二十响”，分别把守一个窗角。日寇上来一个，打倒一个，先后消灭了二十多。最后，戴焕章与刁福长看准敌人，一阵猛扫，撂倒了好几个鬼子。乘敌人惶惶然不敢上前的机会，冲出了屋。随后其他房间的三个人也冲了出来，同戴焕章等人一起，直奔村北的山岗。

山岗上，怪石嶙峋，犬齿交错，灌木丛生。山下一条大道，是从岫岩到通远堡的必经之路。从多次实战得知，日寇自恃人数多、武器好，必然要穷凶极恶地追来。于是，他们五个人，便迅速登上山岗，各自选择有利地形地物，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果然不出所料。没有两袋烟的工夫，大道上就掀起了一

股烟尘，四十五名日寇骑兵，急驰而来。戴焕章等见此情景，心中简直乐开了花，急忙把手枪、大枪压满了子弹，翘起"狗头"，推上大栓，十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敌人。当敌人来到山下时，戴焕章一声喊打，山头上的大枪、手枪一齐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带着抗日战士的仇和恨，飞向敌群。敌军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拨转马头往回跑，与后头的敌骑相挤撞，跌下马来，伤于马蹄下，发出声声惨叫；有的身中数弹，一命呜呼；有的躲在被打死的马尸之后，妄图顽抗。死了主人的战马，无方向地乱跑着，嘶叫着。被打死的鬼子中，有个叫三毛的，是个大头子。当他的战马被打死，其喽罗争相逃命时，他一头钻进了石砬子缝里。但他身体肥胖，石砬子缝太窄，挤不进去，只好把半拉身子露在外边。戴焕章见了，轻蔑地笑着喊道：

"看哪，日本鬼子变成了亡命的大鸵鸟——顾头不顾腚了！"说笑着，弟兄们一顿枪弹，把这个罪恶昭彰的鬼子头，穿成了"蜂窝儿"。

这场战斗持续了二十几分钟，共打死鬼子四十名，活捉一名，仅有四名逃了命。乡亲们闻此大捷，特别是听说打死了三毛，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三四年春天，戴焕章所在的部队受到了挫折，一时处于领导无力的状态。他觉得，处于这种状况的部队，要战胜强大的日寇和汉奸队伍，是很困难的。这时，他听说"东山林子"里有抗日队伍，组织领导坚强，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就暗中串连他的战友们"北上"。

一天中午，戴焕章刚刚在家吃完饭，日本鬼子进村了。

他急忙隐蔽起来。但日寇的烧杀抢掠，激起了他的满腔怒火。要打，部队已经失散；自己干，又身单力孤。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故乡。

临出村时，他回头望望生他养他的地方，只见村子四处冒烟，鬼子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哭声、惨叫声不绝于耳。一种复仇的烈火，顿时从胸中燃起，他怒骂敌人：

"你们这些狗强盗，等着老子回来收拾你们！"

就这样，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恨，来到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寻找能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队伍。

到宝清后，他寄居在姐夫张振春家。为避开敌人的缉捕，他改名戴焕章。不久，经姐夫的哥哥介绍，到宝清四人班自卫团作了文书。有了这个身份，他又开始了抗日活动。他经常借到各村催办粮饷，摊派车辆，抽调民夫之机，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打听抗日军活动的消息。戴焕章的所作所为，很快就被在宝清坚持抗日的我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发现了，并几次派人和他接触。

一九三六年春季的一天晚上，我带队来到徐马架子村。第二天早晨，我在一户老百姓家刚刚吃完饭，就见门口进来一个青年人，他穿一身干草黄的自卫团军服，戴着一副银边眼镜，快步向屋里走来。我急忙问房东，这是谁？房东说：

"团长，你不知道哇？这个青年叫戴焕章。可是个好人哪！他在四人班自卫团当文书，没少替老百姓说好话。"

戴焕章的名字，还有他的为人，我早就熟悉，只是没见过面。房东热情地介绍我与戴焕章见了面后，我俩很快就谈起了抗日的事。他爽快地说：

“李团长，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快叫我参军吧，穿这身狗皮，简直难受死了！熟悉我的还可以；不了解我的，见了这身皮，就躲我老远！”

“游击队的生活艰苦啊，你想过吗？被日寇和汉奸抓住了，还要蹲监坐牢，甚至杀头，你不怕吗？”我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秀秀气气的，象个书生，就有意探问他。

“团长不知道，我原来也是抗日的，苦，吃惯了。要不是避敌锋芒——我的家乡正在通缉我呢，我才不干这个自卫团呢！”接着，他讲起了自己如何参加了邓铁梅的抗日救国军，又怎样来到宝清等等。他越说越愤慨，最后竟大骂起来：

“狗娘养的小日本，它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我妇女，这个仇我非报不可！我愿在团长指挥下，效命抗日疆场，死而无怨！”

我的心，被这青年人的爱国激情打动了。我听着他慷慨激昂的陈诉，联想起群众对他的赞许，我深感他是一个有热血、有报负的好青年，正是我团急需的人材。于是，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你要求参加游击队，我欢迎！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不仅是我三十二团的战士，而且是我的副官！”

戴焕章很激动。他说：

“我才疏学浅，团长不嫌弃，已属知己；今委重任，恐误大事，不敢当！”他坚辞不受。

我跟他说，他仍留在四人班自卫团里，具体任务是：掌握敌情动态，协助部队筹饷和运送物资，争取敌垒分化瓦

解，与部队保持不定期的联系。

戴焕章听了，高兴得笑起来。从此，他成了我团的地下工作者，成了我的副官，奋发有为地开始了抗日活动。

首先，他开展了对伪团总王贞的争取教育工作。王贞是个很世故的人，有私心，更想当大官，但又有点怕前怕后，对敌对我，都不大敢破釜沉舟地干。这也是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性格。就象马戏团里的野兽，它也想吃人，但怕电棍、电鞭，就不敢张口。试想，我三十二团在还不强大的时候，就一口吃掉了杨保贵的自卫大队，几次端了俞殿昌的老窝，四人班自卫团能不怕吗？

戴焕章就抓住这个人的两重性开展了工作。他经常跟王贞讲抗日斗争的发展情况，讲游击队对汉奸的政策，讲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在戴焕章的教育影响下，王贞深感坐在伪团总的宝座上，犹如坐在火山口上。由此，进一步形成了他的处世哲学：坏事不做绝，以留身后路。王贞经常看到我去戴焕章家，也知道戴焕章常常给我团弄东西，搞情报，但他从不过问。在他看来，装不知道比公开知道好，不过问比过问更平安。但戴焕章为了工作却总是有意地把他拴上，拖着他走。有时进城买东西，或往山里送东西，戴焕章总是主动跟团总说一声。这是何等的信任哪！但王贞对这种"信任"却很不高兴，只是嘴上不敢说。每逢这种场合，他就假意热情地回示道：

"去吧，去吧，要小心，别出事，快些回来！"

打通了伪团总这个"门"，戴焕章的工作方便多了。有时我去戴家取情报，王贞见了，不仅不回避，还主动凑上前

扯几句没边没沿的话。甚至我在戴家喝酒，戴焕章也把他请来，同桌共饮。喝到高兴处，我往往半真半假地说：

“我这个抗联团长能活动得开，还得仰仗你这个自卫团总多行方便呢！”

每逢这时，王贞总是有些得意洋洋地说：

“都是中国人嘛，哪能一点民族良心都没有！再说，要是不给你点方便，我这个自卫团，还能对付到今天？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

其次，戴焕章在徐马架子村建起了秘密抗日联络点，先后发展了几个积极分子。其中有个炮手出身的李俊元，协助戴焕章作了不少工作。据说，光复前夕，该人在一次与日寇作战中，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后，中弹牺牲了。

再次，戴焕章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动态，还到敌垒中广交“朋友”，伪屯长、伪甲长、伪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伪团总、伪警察，什么人都“交”，甚至连那些野蛮成性的“兴安军”也“交”。这些人各有各的作用。通过交往，夹信子警察署一个姓顾的伪警察，成了他的“内线”，工作上给帮了不少忙。伪兴安军到宝清后，驻扎在徐马架子附近。他以自卫团文书的身份，常同他们在一起“混”，甚至把他们请到家中喝酒。有一次，几个蒙古兵在他家喝酒时，无意中透露了“围剿”我团和五军密营的行动计划。酒后，戴焕章将所得情报马上报告给我，我迅即向王效明等同志作了汇报。于是在大梨树沟里设下埋伏，给敌兵以重创，获得了毙敌一、二百人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为推进

侵华战争，加强了对东北局势的控制。根据上级指示，为揭露日寇的侵华野心，配合全面抗战，我部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决定针锋相对，加强宣传鼓动工作。这就把解决印刷工具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为此，我要戴焕章设法买两部油印机，送上山来。

日伪当局规定，买印刷工具，不仅要由当地警察署批准，警察署署长签名盖章，而且还必须经卖地的宪兵队审批。伪自卫团的公章掌握在戴焕章手中，开个信，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动用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名章，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他煞费了一番苦心：去宝清城刻一枚吧，又怕刻字的人走漏风声；由警察署的“内线”活动活动吧，夹信子离四人班这么近，自卫团用不上这东西，他们一清二楚，怕打不住狐狸闹身臊。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自己动手刻。

戴焕章不会刻字，就连他自己的名章，都是在刻字铺刻的。但形势往往逼着人们学会自己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创造出事前不敢想，事后为之惊叹不已的奇迹来。戴焕章是个说做就做的人。他到刻字铺偷了偷艺，买了把刻字刀，回到家里，就在肥皂上练起功来。经过几天的苦练，终于按着“良民证”上的印章样式，刻成了警察署公章和署长名章。

印章刻成的第二天，他以自卫团自需的名义，开了购买油印机、油墨、钢板、铁笔、蜡纸等物品的证明，加盖了夹信子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俞殿昌的名章，就和团总王贞说了声“到外边办点事”，坐上从村里要来的大车，直奔富锦去了。因为当时宝清城里还没有卖油印机的。

到了富锦，戴焕章打听到印刷用品归书店经营，就径直进了书店的门。

书店的小伙计，正在应对顾客，老板俯身在案上打算盘。戴焕章把公函递上去后，小伙计接过来看了一眼，迅即递给了老板，意在请他批准。

书店老板五十多岁，已经谢顶，银边老花镜的后边，滚动着一双老鼠眼，不时地从镜框上边溜出目光，偷眼打量着站在柜台外的买主。

戴焕章，中等偏高的身材，穿一套得体的自卫团军服，白净的面庞，稍稍隆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养目镜，一双聪慧的眼睛，机敏地转动着，目光在书架上缓缓移动，很象个学者在专注于书，表面看，根本没把老板的贼眉鼠眼放在心上，可是，他那炯炯双目的余神，却一时也没放过眼前这个老秃顶的一举一动。他清楚知道，这个家伙是日寇安在这里的一条看家狗，必须好生对付。

"一个自卫团，买这种东西干什么呀？"老板看了老半天公函，没有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终于说出了与老板身份不相宜的话。这话的语调，简直平和到了低声下气的程度，那一张堆满笑意的胖脸，似乎成了弥勒佛的头像。但这一切，都遮掩不住他那包藏的祸心。

"印发传单、标语，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戴焕章一派正气，仍浏览着书目，连瞅也没瞅老板一眼，漫不经心地回了几句。

俗话说"一正压百邪"。戴焕章的傲气，不仅没给老板的脸上添一丝愤怒，反而使他更下贱起来了：

“好啊，好啊，愚氓需要教化，大道需要倡导，国策需要宣扬，说的对，说的好。请喝一杯凉茶解解暑吧！”老板立刻收住笑脸，吩咐小伙计倒来一杯凉茶。老板的脸上又恢复了笑意：

“老总啊，”他摘下了老花镜，指着公函说，“这东西可以买，但还得劳驾您跑一趟，到宪兵队立个案。”

“到哪个宪兵队？”戴焕章立刻把目光收拢来，集中在老板的那副老奸巨滑的脸上。

老板的脸一怔，但瞬息间就换上了皮笑肉不笑的假殷勤，连声说：

“富锦宪兵队，富锦宪兵队！离这很近，出了门往北走，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到了。”老板点头哈腰地递回了公函，妄图用廉价的殷勤卑躬，来消除戴焕章对他的恶感。

戴焕章接过信，连头也不回，斯斯文文地出了门，对车夫嘱咐几句，就一个人向宪兵队走去了。

透过门窗玻璃，老板目视着戴焕章的派头，心中犯琢磨，不免有些后虑。

戴焕章凭着革命的胆略和善于应变的能力，顺利地闯过了宪兵队这一关。他拿着宪兵队盖的官方大印件，神气似乎又长了几分。回到书店后，他把印件往柜台上一拍，大声喝道：

“掌柜的，给搬机器！”

老板正埋头打算盘，猛听这一拍、一喊，吓得一哆嗦，忙站起身，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上边盖印了？”老板没话强凑嗑。

“不盖印，敢回来吗？”戴焕章顶了一句。

“老总，不是我不行方便，而是宪兵队有规定啊！你想，眼下形势这么紧，万一出了事，我这个开书店的怎担得起呀！哈哈哈！”老板挤眉弄眼地解释着，毫无表情地干笑着，力图缓和一下气氛。

“照章办事吧，一手钱，一手货，给机器！”戴焕章说着，拿出来“老头票”放在桌上。

买回油印机的当天晚上，戴焕章就亲自带人送进山里。从此，我们的传单、标语就接连不断地飞下山来。

戴焕章把传单、标语带在公事包里，借进城或去各村办公务之机，四处散发。于是，在宝清城，夹信子、徐马架子、靠山屯、四人班、望山坡、大小梨树沟子等地，接连出现了警告伪警伪宪，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和抗日歌曲，引起敌伪一片惊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一天下午，戴焕章到夹信子警察署办事。一出警察署的大门，正赶上门岗去厕所。他一看正是机会，立刻从公事包里掏出两张标语，顺手贴在了两边的门框上。门岗回来时，不知是没发现，还是怕追究责任，反正第二天早晨才声张起来。警察们伸长脖子看了看，一个个走开了，谁也没敢往下揭。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游击队能把标语贴到警察署的大门上，说不定警察署里就有游击队的人，惹那个是非干什么！俞殿昌毕竟是一署之长，当他看到标语时，一把扯下来，撕个粉碎，用脚踩了三踩，骂个不停：

“这些‘马胡子’，真他妈反天了！等老子抓住你们，不抽你们的筋，剥你们的皮，我都不姓俞！”

为此，他在村里抓了一些“嫌疑犯”，又是审问，又是吊打，一连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查出半点头绪。从此，每当晚上，警察队请假的就多起来了。谁愿意在那等死呢！趁此时机，我三十二团几次端了俞殿昌的老窝。

戴焕章自从成为我部的地下工作者后，还给其他军作过不少工作，如给抗联五军买白花旗布、五色纸、食盐、药品、缝纫机等。有时，这些物品在宝清买不到，他就去佳木斯买。买到了，就连夜往山里运送。一个人力所不及时，他就邀集好友李俊元、那广义等一同往山里送。

一九三八年春天，戴焕章通过“朋友”，曾亲自策动宝清城的门卫哗变。可惜的是，全部工作已经完成，只待时机一到举义了，他被捕了。

究其被捕的原因，还需倒叙几句。

戴焕章作为我的副官，潜伏在四人班自卫团里。为送情报，送物资，他经常到队上去。因为我没文化，讲不清多少抗日救国的道路，就常让戴焕章给同志们上上“形势课”。所以，全团人都知道他的身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那个时候，由于反满抗日的烽烟四起，伪满洲国的票子并不吃香，民间的变换，除了以物易物以外，多以大烟土作“硬头货”。所以，我们为了预防疾病和解决战士的日常零花钱，在庆祝战斗胜利的时候，有时就给每个战士发上一两半两的大烟土。这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少数战士把领到的大烟土吸食了，渐渐成了瘾。这些人一犯瘾，不仅战斗力大大减弱，而且常常违犯群众纪律，影响了部队的威信。对此，我很着急。

有一次，戴副官来了。我把全团人召集起来，让他讲讲戒烟的问题。对抽大烟的人，他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次发现你吸食大烟，要批评教育，责令其当众检讨；第二次发现你吸食大烟，要缴械，罚“蹲禁闭”；第三次发现你吸食大烟，就给你一条绳，自己选个树杈吊死。他的话一片诚意，但讲得刻薄了些。已经成瘾的三连战士邱万成和魏吉山听了很不舒服，记恨在心。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天，我带队下山筹集给养。夜间，驻在了徐马架子村。虽是四月天，但山区的夜晚还是很冷的。这天晚上，邱万成和魏吉山犯了瘾，就携械逃到了县城，投降了敌人。从此，他俩当上了日伪特务。

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刚刚投敌的邱、魏两个叛徒正在宝清街里得意洋洋的走着，迎面来了戴焕章。这两个大烟鬼，因不知戴焕章身上有没有枪，怕撞到一起吃亏，就急匆匆躲进了一条小胡同，暗暗观察戴焕章的去向。

戴焕章身穿一件蓝长衫，头戴一顶青礼帽，手里拎着捆在一起的五瓶红伤药，坦坦然然地出了南门，向徐马架子村走去了，并不知身后还有两个丧门星在盯着他。

邱、魏两个家伙断定戴焕章回家了，就急不可耐地跑到县警务科报告了。日本指导官石川高兴得心中开了花，立即制定了抓捕戴焕章的行动计划。

第二天下午，邱万成、魏吉山陪着石川来到了宝清南大桥——戴焕章进城、回家的必经之路，布下了埋伏，邱、魏坐在桥下的河边上佯装钓鱼，石川站在桥上摆出一副观鱼看水的架势。

下午三、四点钟，戴焕章走来了。当他踏上宝石河桥时，一眼看见了站在桥面上的那个日本人，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小鼻子头上架着一副墨镜，右手拄着一支乌黑油亮的手杖，正俯身在护桥栏杆上，不时地向河中投一两块小石子。戴焕章放慢了脚步，似乎在想：我的脑门上没贴着帖，怀里没有文件，怕他干什么？瞬间，他的步伐又加快了，向桥对过走过去。

石川并不认识戴焕章。但他看到身边这个风度萧洒的青年，根据邱、魏介绍的特征，断定了他可能就是戴焕章。但这个年轻而狡诈的日本人知道，人民的心是与抗日队伍紧密相连的。一旦搞错了，风声就会立即传扬出去，戴焕章就会绕道回山了。石川心中有底，反正还有邱、魏呢，是真是假，他俩还不认识吗？他把藏在大衫里的三号手枪掏了出来，双手交叉地背在身后，跟在戴焕章后边，慢悠悠地走着。

这时，邱、魏二人一看戴焕章过来了，后边还有石川，立刻精神起来，故意提高了嗓门喊道：

“老戴你来，我俩有点事跟你谈谈！”他俩急忙收了鱼杆，满脸笑容向戴焕章走来。

戴焕章一怔：“他俩怎么会在这儿？”他立刻想起了桥上那个乔装打扮的日本指导官，意识到敌人设下了圈套。他急回身，石川已来到身后，枪口对准了他。这时邱、魏两个叛徒，也狼奔狐跃地蹿过来，搂的搂，抱的抱，把戴焕章逮捕了。

在押往县城的途中，这三个家伙施展了劝降、诱降的种种伎俩。叛徒说：

“老戴，不是我俩不够朋友，今日‘兵谏’，也是为你的前程着想啊！你看，我俩不是比在山上时强多了吗？就你的文韬武略，归顺了太君，咋也比我们强！”

“你是中国人的这个，能耐大大的，皇军不会亏待你！”石川急插上一嘴，竖着拇指，眼睛盯着戴焕章那张愤怒的脸。

跟这些民族败类和强盗还有什么话说呢？向战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戴焕章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一讲几个小时，因为听他演讲的是战士！对这几个无耻之徒要说什么呢？骂一顿吗？他心中蕴积着仇恨，眼里闪着灼人的光，一声不吭地走着。

到了县政府，伪县长谢俊山见戴焕章仪表堂堂，又有文化，口才又好，心想，如能把他争取过来，可是一员干才！于是，他诱供说：

“年轻轻的，怎么入了这一道！听说你入伙并非出自心愿，而是他们把你绑去的？”

这话事关生死，一听就明白。戴焕章如果是那种利禄熏心的人，满可以顺着伪县长的口气说下去，为自己留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道路。但他知道，这位县长大人的虚情假意，不是为“搭救”一个抗日战士而发的。顺着他的鼻息讨活路，这是抗日军人的耻辱！于是，戴焕章开口了：

“你说这话不觉得无耻吗？我可以回答你：如果我也同你一样，没有中国人的血性，不顾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只为自己升官发财，不客气点说，当汉奸的资格也许比你老！”

县长大人火了，在刑讯之后，把他送到了日本宪兵队。

一个日本鬼子笑眯眯地在审问他，不知底的，还以为他们是在谈心。

“你的，中国人的这个！”鬼子伸着拇指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省悟了，特务大队长的当！”

戴焕章以鄙视的目光斜睨了鬼子一眼。这一眼似乎在说：“魔鬼终究是魔鬼，歌唱得再好，也只是为被吃的人念丧经！”他倒平静了，以淡淡的口气说道：“那算什么玩艺！”

鬼子火了，上大挂，抽皮鞭，灌辣椒水，灌煤油，电刑、火刑一齐来！敌人用尽了招数，得到了什么呢？戴焕章除了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再无所供。

敌人仍抱幻想：从肉体上榨不出东西来，在精神上下下功夫，也许能有所得。于是，一出“难中相会”的戏，就编导出来了。

戴焕章被捕时，他的爱人姚淑珍刚刚分娩。经济上的贫困，亲人的不幸遭遇，很快把这个软弱的农村妇女折磨倒了。姚淑珍同她的父母一起，守着刚刚出生、饿得呱呱啼哭的婴儿，呻吟着，哭泣着，叹息着，惦念着，盼望着，度过了倍添忧愁的五月节。

节后第二天的下午，几个日本鬼子押着戴焕章来到了徐马架子。姚淑珍早已被生活重担和忧愁折磨得弱不禁风，一见亲人，被五花大绑绑着，心中顿然翻了个儿，两眼呆呆地望着亲人，没有哭，没有泪，俨然成了木头人。日寇以起枪为名，把家翻了个底朝上，没抄出任何犯禁的东西，就对姚淑珍及其父母鞭打脚踢。刚刚出生的婴儿，不知这个世界发生了

什么事，“嘎哇——哇嘎”地一劲哭。戴焕章看到自己的亲人受连累，很难过，咬紧牙关，怒视着强盗们，一声不吭地站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敌人再一次失败了。临别时，戴焕章用目光安慰了亲人之后，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刚刚来到这个家庭的婴儿身上。他慈祥地看着她，似乎在嘱咐这个小生命：要记住这家仇、国恨！

仅仅就是一霎那！旋即他猛然回过身来，大步走出了房间。当双腿迈出柴门时，他回身对自己的爱人说了一句话：

“回去吧，不要怕，多保重！”

这就是日寇兴师动众，施展精神酷刑所得到的唯一一句“供词”。

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至此已经黔驴技穷，遂决定拿出最后的一手。

农历五月九日下午，日本宪兵队的囚车行至宝清西门外的元宝山下停住了。被捆绑着的戴焕章跳下车来，激越的抗日歌声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满抗日的呼号声。鬼子慌忙抡起了杀人刀。我年轻的副官倒下了，他将他满腔的鲜血献给了蒙难中的民族，洒在了战斗着的土地上！

在元宝山下住着的一位老人，目睹了戴焕章临终时的悲壮情景，他深怀敬意地说：

“老戴是铁汉子，够英雄！”

戴副官死后，宝清人民冒着“同案犯”的风险，偷偷将他的尸体埋葬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年轻的抗日英雄，英灵长在，他的英名和业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十八、枪毙劝降人

经过几年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根基越来越深了。

在我们编入抗联三军四师之前，我就在宝清一带坚持抗日斗争，并曾不止一次地收拾过日伪反动派。编入抗联后，我所带的队伍，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了二、三百人。因此，有的群众说："'天德队'神出鬼没，来无踪，去无影"；也有的说，日伪反动派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心惊胆战"甚至还有人说，"讨伐"队在进山之前，都要在神佛面前烧香祈祷："老神老佛，保祐我军，来去平安，别碰'天德'"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日伪反动派集中精力在我身上打起主意来。

早在一九三七年冬，日伪反动派就加强了对抗日武装力量的进攻。同时，抓紧了对抗日武装的分化瓦解，首先是对抗联各级指挥人员的抓捕和诱降。他们把我的名字和照片印在通缉令上，到处散发、张贴，并登报悬赏捉拿：当官的抓住我，立即晋级；当兵的抓住我，立即升官；老百姓抓住我，赏现款五万元；如窝藏不举，与我同"罪"。

日伪反动派的喧嚣，不仅无损于抗日队伍的威望，无碍于抗日武装的活动，而且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抗联坚决抗日，

是日寇和汉奸的死对头，是一支人民军队。从而，人民群众更加自觉主动地保护我们，支持我们。所以，尽管敌人到处“讨伐”，但我们却始终在各地机动灵活地打击着敌人。

敌人抓不到我，也消灭不了我所带的队伍，就施展出了新的伎俩——派人劝降，造谣惑众。

一九三八年的中秋节刚过，我们的队伍开到了宝清、密山交界的挠力河子南岸，进行休整。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南岸的一个露营地休息，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出现在河北岸，被我哨兵发现了。怕他是奸细，我哨兵就用木排把他渡过来。经盘问才知道，这个人是我的“把兄弟”周国昌，说是专程来看望我的。为了慎重起见，哨兵把他拦在山下，派人向我报告了情况。

我和周国昌已经几年没见面了。听人说，自从抗日军处境艰难以来，他同日伪反动派之间往来频繁。他怎么知道我部驻在这儿？他来干什么？这时我想起了一九三七年春天，周保中同志路过我部驻地时说的一段话：“当部队大发展时，要注意奸细混入；当部队处境艰难时，要注意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防备敌人的手伸进来，拉出去。”想到这儿，我对周国昌的到来，立刻警惕起来。

但他毕竟支援过我们，而且是我的“磕头弟兄”，专程来看望，怎好不见？我让战士把他领来了。

周国昌一见我，就象孩子见了亲人似的，诉起苦来：

“咱弟兄见一面可真难啊！我找了你这些天，好不容易才在这儿找到了，可是你的部下又生不让见！你的官也真当大了！”对我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

我解释说："自从日寇实行'归屯'之后，我们就主要在山林里活动了。敌人为了寻觅我们的踪迹，常常派遣各种身份的特务进山刺探情报，搞破坏活动，我们不这样做不行啊！"我说着，观察着他的表情，并问起了几年来他家的情况。

这一问，点破了他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

"家里的情况提不起来了！"他伤感地说，"自从你进山之后，我家就遭活罪了！日本人把我带到宪兵队，说我全家通'匪'，人要斩，家要抄！逼得无奈才来找你，求你救救我一家人吧！"说着，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了起来！

"我们连村都进不了，怎么去救你一家？"我谨慎地试探着他的真意。

"日本人说，只要你不干了，他们就饶我全家。看在弟兄情份上，你帮我这一步吧！再说，人生一世，干什么不是一辈子？何必一条道走到黑！"

话虽不多，语意透彻！他哪里是来看望我？分明是劝降来了！我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你过去支援抗日，那是你的光荣；今天你来替日寇当说客，这不是背叛行为吗？！"

"你别生气，谁让我们是兄弟呢！要不，我哪敢当面把心里话掏给你！"周国昌一见我变了脸，忙赔笑说，"我要说错了，你打，我不还手；你骂，我不生气，权作我没说呗！"他嘴里说着软心话，眼珠子骨碌着，观察我的表情。

听着他这些话，我在暗暗合计："他是带着日寇的任务来当说客呢，还是迫于日寇威胁，一时做出了糊涂事？"因

为手中还没有准确的情报，所以只好开导一番，把他放了，临行时，我特意嘱咐他："要是在家实在呆不了，就带着家属到山上来，和大伙一道打日本鬼子！"

周国昌听后，脸上浮现出激动的表情，连声说："你说得对，说得对，要是呆不下去了，我就来找你们！"我派人用木排把他送过河，他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招手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周国昌走后，我立即将队伍转移到密山境内的一个大山沟里，以防不测。

过了几天，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说："团长，前些日子来看你的那个人又来了，还牵着一匹马，驮着一个老太太！"

乍一听，我很高兴，以为周国昌带着家眷来参加抗日队伍了。但见面一谈，一切都明白了，还是来劝降的。与上次不同的，是劝降队伍扩大了一倍——周国昌把他母亲也搬来了！

见面之后，话题很快转到了实质性问题上。还是周国昌先开了口："老李，我们是对天明过誓的，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也要尽到当哥哥的义务，把话说明白，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当初你抗日，我支持，因为时逢乱世，大局未定；现在，日本人已进了关，满洲国的天下成了铁桶一般，就你们这几个人能抗得了？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识时务者为俊杰'！多少当年的抗日好汉，现在还不都成了满洲国的精兵良将？"周国昌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处世哲学，嘴里冒着白沫子。

我不动声色地听着，目的是看看他到底是糊涂，还是受

命于日寇。他可能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动了心，就进一步摊牌说：

“日本人答应，只要你归顺了，就让你当武装队(注)队长，还要帮你安个家！”周国昌说得喜笑颜开。

“这可是一条正路！明顺哪，你都三十出头的人了，也该有个安身之处啦！归顺了日本人，官当大了，我们也能沾点光！”老太太被周国昌喜悦自信的神采所感染，急忙给儿子溜缝儿。

我闷声不响地听着周国昌母子一唱一和，身上的血似乎加快了流动，心中象有一团火！暗想：“好狠毒的日本鬼子，你‘围剿’不成就来劝降；劝降不成，就来诱骗！瞎了眼的狗东西，我姓李的要贪图这些，还用等到今天！”于是我对他母子说：

“你们去报告日本鬼子吧，我李明顺是中国人的种，要让我认贼作父，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老太太看我态度很硬，不作声了。我想，她已六十开外的人了，竟亲自出马来劝降，一定是周国昌的主意，有必要让她明白明白事理。于是，我给她讲了日本鬼子怎样侵略中国，怎样屠杀中国同胞，怎样掠夺中国物资，怎样把侵略战争推向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又怎样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等等。

我说着，温和的口吻一变，脸色一沉，目光转向了周国昌：

注：宪兵队控制下的武装特务。

“眼下，全国人民都在为民族生存进行殊死战斗，而你，却在进行着瓦解抗日队伍的活动，这不是汉奸吗？对汉奸应该治什么罪，你不是不知道吧？！”

抗日期间，特别是东北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抓住汉奸是严惩不贷的。

周国昌见我发了火，急忙强装笑脸说：

“老李，买卖不成仁义在，别动肝火呀！”

“什么？买卖！为了升官发财，你要拿我的脑袋去和日寇作交易吗？”

我一听“买卖”二字，即刻想起了日寇悬赏抓我的事，无名火腾地冲到了天灵盖，右手习惯地落到了匣子枪上。

周国昌一见这情景，慌忙辩解：

“你我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是对天盟过誓的，我哪能那样缺德呢！只是我的处境不好，也是为你的前程着想！”

“看你们，弟兄见面不容易；见了又发火！不谈这些不行吗？”老太太急忙出面撮合。

我觉得和这种人再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就警告他说：

“今天，我要不是看在老人的面上，就立即处治了你！既然先留你一条命，你就该好好想想：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干这吃里扒外的、出卖灵魂、出卖同胞、出卖祖国的勾当，给日本强盗当走狗，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你要把我卖给日寇，还谈什么‘对天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还谈什么‘不能那样缺德’？你记着，要是再来劝降，可别说我不念旧情！”

在我严辞训斥下，周国昌牵着马，驮着他妈，灰溜溜地

怏怏不快地下山了。

周国昌两次来劝降，很快刮起了一股蛊惑人心的妖风。在农村，人们私下议论，说我的把兄弟已经来部队几次，我三十二团投降的事快谈妥了；在县城，有的说我已经投降日寇了，是一个人坐飞机投降的，日本指导官还亲自去接我。为了增加谣言的欺骗力，伪军政警等部门，有时还组织一些人，在街里吹吹打打，呼口号，撒传单，声称是去城门欢迎我部队来投降的。

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搅得人们真假难分，人心不稳。在抗日队伍内部，也有反响。有的听信了谣言，开始动摇了；一些不坚定分子还偷偷离开了队伍，当了汉奸；一些坚决抗日的人，不相信狗嘴里会吐出象牙，但周国昌两次来队，我都没把他怎么的，又加我怕影响军心，没有及时将此事公诸于众，这就更增加了一些人的疑虑。军心浮动，士气低落，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

一天，我带着队伍活动在大梨树沟子的山里，遇到一个名叫范文垣的烧炭人。他和我最要好，不仅给我买过枪支、子弹，还给我伤员医治过枪伤。

“李团长，听说你要投降日本了？”范文垣见了我劈头就问，眼里含着惊疑。

“没有的事！那是敌人造谣！”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同时反问一句：“你听谁说的？”

“哎呀，还听谁说的？你那个姓周的‘把兄弟’到处讲说！”

范文垣的话，使我很受震动。晚上睡不着，我思考着周

围情况的变化。战士们的士气为什么不高？人民群众为什么对我有些疏远？经深入调查了解，才知道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和周国昌两次来劝降有关。使我认识到，周国昌两次来劝降未受制裁，我又未将真相公之于众，助长了他的反动气焰，增加了他的谣言的欺骗性。在涣散抗日军心，瓦解人民斗志方面，周国昌起了日寇起不到的作用，而我对他手软，是帮了他的忙。想到这些，我下决心除掉他，以挽回影响。

但是，周国昌来劝降的政治背景是什么？是谁给他的任务？以什么作代价？等等，都还不清楚。为此，我派人深入到徐马架子和宝清城里进行侦察，从而查清了周国昌已被宝清宪兵队收买作“密侦”，其主要任务是对我招降。搞清了这些，我的决心就下定了。

这年农历九月初的一天，周国昌再次来到我的队上。我立刻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为了进一步摸清他这次来的目的，我将火气压住，再次接待了他。

言谈中，周国昌仍不厌其烦地重弹其劝降的老调。他看我仍不就范，就威胁说：

“你归不归顺，已经由不得你个人了！你的部下已在酝酿投降！你不降，恐怕没路可走了！”原来，他在我部战士中已偷偷地作了策反工作。

我看着眼前这位说客的可耻嘴脸，日寇屠杀我同胞的惨状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心想，你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于是我大声喊道：“来人哪，送客！”

一个姓孙的战士进来了，我跟他说：

“你把他送过河去，过了山梁——”下话没说，我用食指作了个勾板机的动作，递了个眼神，他就明白了。

战士送走周国昌，我马上召集全体同志开会，当众宣布了周国昌破坏抗日的罪行。正在这时，河北边传来一声枪响。不一会儿，那个姓孙的战士回来了，向我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我对同志们说了我和周国昌的关系，以及他三次来劝降及我枪毙他的经过。接着我指出，现在有些人说我投降日寇了。这都是周国昌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大家切莫相信，谨防上当受骗。

枪毙劝降人这件事，很快就在宝清县传开了，我团的战士更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咱们团长在原则问题上‘六亲不认’，‘干大哥’也一样收拾！”有的说：“团长抗日铁心了，跟他干，没错！”社会上人们议论说：“老天德是个硬骨头，宁折不弯！”“只要抗联坚持下去，咱们老百姓就有主心骨！”整个舆论和情绪很快转过来了。人民支持我们，我团的指战员也决心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

敌人用软招子没能治服我们，就把赌注下在军事“围剿”上了。从而，我军经受了更艰险的考验。

十九、撤向国境线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部守在宝清西南部的兰花顶子山林里，艰难处境已达极点。

刚刚入冬，大雪就一场接一场地下个不停。到年底，平地积雪已经过尺。山林里的灌木丛，只露着细枝末梢，象长在雪原里的草棵迎风摇动。大森林里的树枝，被积雪压得七零八落。山风一吹，树冠上的积雪落下来，烟雪飞扬，搅得山林昏天地暗，使人睁不开眼。林间的小鸟啁啾地叫着，在风雪中吃力地扇动着翅膀，有的扇着扇着，跌落下来，掉进了雪窝里。夜间，山林里不时地发出“咔——咔”的响声，树干被冻裂了。野鸡哀叫着飞下山来，幻想到村庄屋檐下度过寒关。但往往没等进村，有的即已冻得不能动了。真是冰冻如铁。在这严酷的冬天里，我团三十七名战士坚守在兰花顶子山上，经受着饥饿和严寒的煎熬。

也就在这个时节，日寇、“兴安军”、森林警察队等反动武装，三天两头进山“讨伐”，妄图趁严冬将我部一举消灭。

由于敌人封锁，人民群众进不了山，我军也出不了山，给养和武器装备成了问题。已到严冬季节，有的同志身上还没有棉衣。多数同志虽然有了棉衣，但却很单薄，而且在行军作战中，已被荆棘挂扯得千疮百孔。脚上的一双鞋，从春

穿到冬，破了补，补了破，鞋底鞋帮都分不清了。有时敌人攻来，身着单衣的同志们，就把参军时从家里带来的麻花被子裹在身上，迎击敌人。许多同志的脚冻肿了，脸冻破了，手冻裂了，整天淌水。淌出的血水，冷风一吹，结成了冰，钻心般疼。有的同志鞋破了，找不到东西补，就弄一块兽皮包在脚上。有时，连兽皮也没有，就扒一些干桦树皮绑在脚上当鞋穿。团政委于保合同志，穿着一双裸露脚趾的"水袜子"，两脚冻得肿成了"面包"。

至于吃的，那就更困难了。为了对付敌人的封锁，这年秋天，我们采集了一些野菜，拣了一些野果；入冬后，还买了几头牛宰了，把肉连同干菜、野果一起，分别埋藏在宝清西南部的山上。但是，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艰苦的考验，先后叛变了。投敌后，他们领着敌人来偷袭。所以，到了年底，积存的东西大都被敌人挖走了。大雪铺天盖地，地面上的野果全被覆盖了。在山林里，偶尔碰到一两只狍子、野鸡什么的，因担心枪声暴露目标，往往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跑掉，飞走。在那个年月里，一连几天吃不到东西，这是常事。我们驻在深山老林里，可以吃的榆树，却长在山边上。有时派小分队下山打给养没成，就在山边上扒一些榆树皮背回来。被敌人发现了，我们就边打边撤。有时敌人发现树皮被扒了，就知道是我们干的，跟踪而来，于是又挑起一场恶战。

有人说，好马是在千里路上骑出来的，好钢是在千余度高温下炼出来的。抗联战友间的革命情谊是在共患难中凝成的。我常记得，在那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同志们漫山遍野寻

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偶尔遇到几株山里红树，有的枝头上还残留着几颗干果，就把它打下来，带回驻地，你三颗，他两颗，美餐一顿。有时在山边苞米地里遇到了花鼠子窝，同志们就千方百计地把它抠开，抓住花鼠子，带给伤员煮汤喝；将鼠粮炒了，分给大家。同志们分得几粒鼠粮，视若家珍，不到饿得不得已时，舍不得往嘴里扔一粒。但是，当看到哪个同志饿得晕过去时，大家就纷纷献粮，倾囊相助。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加紧对我们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我军的反动宣传和策反工作。除了不断派遣象周国昌这样的人，对我部进行招降、劝降、诱降外，还常常通过各种渠道，把反动画报和传单、标语，贴在我们经常进出山的路口上。这些反动宣传品中，有的是以伪县政府名义印发的“招降布告”；有的是叛变投敌分子写给“故旧”的信，意在进行“现身说法”；有的是以抗联家属的名义写的“规劝”信；有的是一些旨在软化抗日战士斗志的淫荡画报、照片等等。在敌人的总体进攻面前，不少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离开了队伍，有的投敌了。到年底，原来二、三百人的我三十二团，仅剩三十七名同志了。

由于经常有人叛逃，我部的驻地几乎天天在变动。没有了密营，没有了活动基地，部队走到哪儿，住到哪儿，脚踩积雪，头顶寒天，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酷寒中过着露营生活。尽管多数同志衣服很单薄，有的没有棉鞋棉帽，甚至有的连棉衣也没有，但同志们的情绪却是乐观的，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终于在难以想象的饥寒中坚持下来。每当同志们围着火堆，嚼着干菜，喝着树皮汤时，总有人唱起当时流行的一

支歌曲：

天大的房子，
地大的炕，
火是生命，
森林是家乡，
野菜野兽是食粮。
……

“多好的战士啊！”每当我看到同志们这样乐观地生活着，充满信心地战斗着时，就情不自禁地暗暗赞叹。这三十七名同志，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而生存下来的。他们虽然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但不叫苦，不动摇，抱定了“宁为抗日死，不作汉奸生”的钢铁决心。而我，作为受他们信赖的团长，有责任为党为民族保存这一部分革命力量。这时，我想起了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收编我部时说的话：“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撤到江东，那里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支持我们。”于是，我和政委于保合同志商量决定，把队伍撤向能进退的中苏边境地带。

从我部驻地到虎林国境线，需要走二十多天，同志们苦熬大半冬了，身体都很虚弱。现在要长途跋涉，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怎么行。为了准备给养，我一方面派了几个战士下山筹集，一方面在山林里同拉木材、做木活的人联系，求他们帮忙。经过几天奔波，我们在山里只筹集了八匹马和一头牛。同志们寄希望于下山的人，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回来。

农历腊月上旬的一天中午，下山的人回来了。但他们带来的不是给养，而是一百五十多人的武装警察，把我部驻地包围起来。于是，我们急忙投入了战斗。

敌人虽然包围了我们，但由于过去被我们打怕了，并不敢往上冲，只是躲在掩蔽物后边放枪。有一个家伙，用枪杆把皮帽子挑起来，以此窥探我们当时的虚实，被我一位炮手出身的战士发现了，“叭”的一枪就把帽子打飞了。那个敌兵吓得“妈呀”一声，忙把枪管收了回去。

战斗一直坚持到傍晚。敌人没退，但也没敢进，只是远远地围在山下，时而放一两枪。在此情况下，我和政委于保合同志研究决定：当晚突围向东撤。于是，我们宰了牛，让战士们饱餐一顿；剩下的，分给战士们带着。半夜时分，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急速地朝虎林边界线方向撤去。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夜行晓宿，专拣山高林密处走。在宝清境内，哪里有敌特据点，哪里有敌兵，哪里有山，哪里有河，哪里有村庄等等，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尽管行进在枝杈相连的原始森林里，我们也知道该往哪儿走，不该往哪儿走。但是一离开宝清，山下山上的情况就不熟悉了，因为在山林里行军，找不到向导，只好一边探路，一边前进。再加上风雪阻拦，往往一天走不了十几里路。

突围还没有一天，敌人就追上来了。从此，我们就一边战斗，一边向东撤。

夜间行军，没有月光，也不敢明火照路，深一脚，浅一脚，跌倒摔伤成了家常便饭。因为天气太冷，手脚本来就已冻伤，经柴草灌木一挂扯，就流脓淌水，冻伤越来越重。

山风卷雪，填平了沟沟洼洼，有时看上去，整个雪丘平平整整。但一踏上去，就往往连人带马陷了进去，不能自拔。这时，大家找来树枝、棍棒，奋力往外拉，人马才得救。有时在山岗上走着走着，突然一阵狂风，连人带马推到山下，滚进了沟涧的积雪里。

在荒无人烟的山林里夜行，后边敌人追着，前边黑森森，夜茫茫，吉凶未卜。一天夜间，我们来到一座大山下。向山上望望，没有光亮，没有声息。我想这深山老林里不一定有敌兵，就决定带队从山脚下穿过去。谁知，我们刚刚走了不到二十丈远，就听见山上军犬狂叫起来，接着就传来了日寇嗥叫声。我命令同志们立即卧倒。大约过了半小时，山上没了动静，敌兵也没下山搜查，我们才又谨慎小心地向前走去。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天一亮，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天气虽然冷，但因山路难走，行动起来冷得就差了。有时行军急速，长途跋涉，同志们的内衣往往被汗水浸透。但是一旦停下来，顷刻间，就冷得令人难耐。被汗水浸透了的内衣，似乎成了冰衣，一沾身，炸骨似的凉。这时，大家拣来一些干柴，点起篝火，围在一起烤着。不一会，大家的胸前就冒出了缕缕热气。有时，为了不使敌人发现火光，天再冷也不升火，大家背靠背地坐在一起，让衣服单薄或没有棉衣的人坐在最里层。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团的参谋长薛东范情绪有些异常，经常和他老婆单独行动。有人发现，素日不知节俭的薛东范，此时分得一点点狍子肉干都舍不得吃。后来，在快到边

境线时，他们俩偷偷离开了队伍，还拐走了两匹马。光复后获悉，薛东范回到密山，向日寇投降了。

经过二十多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边境地带。天黑了，我们进入一个长满林木的小山丘驻扎下来。第二天早晨，发现山下大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跑，日寇和伪兵往来不绝。原来，我们驻在了日本兵营跟前了！我马上嘱咐同志们隐蔽好，以防敌人突袭。同时，把一路上没舍得吃的几匹马，牵到树木茂密处拴起来。这时，人们的思想高度集中，马也似乎理解了主人的处境，既不嘶叫，也不互相啃咬，都静静地站在雪窝里。

终于熬到天黑了！我们立即下山，来到了乌苏里江畔的一户渔民家里。当渔民知道我们是抗联，已经多少天没吃一顿饭时，就炖了一大锅肥鱼，我们饱饱地美餐了一顿。之后，由渔民带路，我们越过了乌苏里江，进到了中国边境的另一侧。接着，身后响起了枪声。因我们已入异国国境，敌人再发疯也无济于事了。事后听说，是俞殿昌率队追到江边。经一路战斗，死的死，逃的逃，俞殿昌那一百五十多人的“讨伐”队，只剩五十来人了。

我们是半夜时分越过乌苏里江的。既然过了江，就要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深更半夜，到哪儿去找他们？向苏联老百姓打听吧，语言又不通。

我正在犯难，一眼看到了村边的一个柴禾垛，就生了主意。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围在草垛旁，把红旗插在地上，把枪架在红旗下，划了一根火柴，就把柴禾垛点着了。火光顿时染红了半边天。

这办法果然有效！大火烧了十几分钟，一些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就来了。他们收缴了我们的枪支，用爬犁把我们拉到衣曼街里，关押起来。

这种在外国被囚禁的生活仍然是难熬的。我们实指望来此能得到支持，哪里想到苏军却给了我们这种“礼遇”！经过一个多月的审查，搞清了我们入境的背景和各自的身份，就一一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后，苏联边防军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同邵天宝一起回东北把周保中找来，商谈抗联撤向中苏边境的问题。

我和邵天宝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份来到虎林县的倒木沟，见到了抗联五军政委季青和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王效明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去苏联的经过和回国的任务。他们听了很高兴。王效明同志说：“你们找不到周保中同志，这任务由我们去完成吧！”于是，季青、王效明、金铁宇等十多人，跟着我和邵天宝来到了衣曼，见到了苏联边防军负责人。之后，东北抗联陆续撤到中苏边境休整，为最后战胜日寇蓄积了力量。

二十、小部队的艰难岁月

进入边境地区的抗日部队，大部分集中在南北两个营里进行整训，同时，还组织了十几个小部队，深入敌后，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我由组织委派，担任了一个小部队的负责人。

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必要时给敌人以打击。

小部队的人数，是根据任务而定的，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小队仅三五个人。

小部队的成员，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和受过专门训练的抗联战士。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忠诚于民族解放事业，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小部队的装备，也随任务的变动而变化。有时配备手枪、冲锋枪、手榴弹，有时只配备短枪和匕首，有时还带着电台、伪职人员的证件，服装等。

每个小部队，都有其经常活动的地区，我所率领的小部队，主要活动在穆棱、宁安、海林一带。

小部队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日寇在边界线上架起了一道道铁丝网，网上挂着铁罐头盒子，巡逻兵象游魂一样，时隐时现，铁丝网一有响动，日寇的军犬立刻狂吠着跑过来，巡逻的鬼子兵也端着枪跟过来。在靠近边境的山区里，日寇

还设立了许多特务据点，作为捕捉抗日军的第二道防线。因此，每当来到敌人封锁线时，我们都要长时间地进行观察，专选择地势险要、日寇防范薄弱的地方偷越过来。

我们同上级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有时带着电台，一过封锁线，就向上级发报；有时没有电台，就带一只讯鸽。当我们安全地过了封锁线时，就写上几个字，绑在鸽子腿上，放它回去向上级汇报。

越过封锁线后，敌人往往寻踪而来。为了消除足迹，或制造假象，我们在靠近国境线的那段路上行走时，或者倒退着走，或者在鞋上钉两个倒掌。有时为了对付敌军犬的寻踪，我们每个人的兜里，都装一些辣椒面、胡椒面或旱烟末，在越过封锁线，或接近敌据点时，每走一步，就转身在脚印上撒上一些辣末。当军犬嗅我们的足迹时，辣末就被吸进了鼻腔，于是，警犬只顾一个劲地打喷嚏，再也不往前嗅了。有时刚过了封锁线就遇到了小溪，我们立刻下水，缘流而上。敌人追踪到溪边一看，没了足迹，以为我们过河了，就到对岸去寻踪。但找来找去，往往连一个脚印也找不到。因为我们已向小溪的上游走了好几里，最后选择了溪边满是山石的地方上了岸，太阳一晒，什么印迹也没留。上岸后，我们急速地向敌后插去。

为了防备敌人发现，我们往往是夜间行路，白天休息。冬天里，饥寒难耐；夏天里，土地的潮湿，蚊虻的叮咬，毒蛇猛兽的袭击，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险。有时在潮湿的大豆地里趴一天，晚上开始行动时，竟然腿脚失灵了。由于夜行军，又没有向导，还往往会闯到敌人“怀里”。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行进路线常常选择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里。有时，在原始森林里，一连几天几夜地奔走，出发时带的一点炒面、饼干之类的食品，早已罄尽。其余的日子，不管在林海里转悠多少昼夜，只能靠山菜、野果填肚子。有时行进在长满松树的“青堂林”里，遍地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象海绵似的，连草都不长，更不要说长什么山菜、野果了。找不到吃的，饿得四肢无力，两眼冒金星，有时坐下来歇歇就起不来了。有时行进在长满狗枣子、山葡萄的“闹堂林”里，藤蔓相连，枝杈错综，往往一天走不了几里路。要是在秋天，饿了，还可以摘点狗枣子和山葡萄充饥；但要在春草刚刚发芽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有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野葡萄藤下，撸一把葡萄叶子塞在嘴里嚼起来。到了夏天，蚂蚱、蝈蝈、蛇以及各种野菜，就成了我们充饥的东西。有时，误食有毒植物，脑袋肿得柳罐大，睁眼都困难。

在林海里行军是离不开指南针的。有时指南针坏了，或在战斗中丢失了，辨别方向就成了难题。经过几次迷失方向的锻炼，我们渐渐有了经验。树木是喜欢阳光的，它的枝杈往往向南伸展；苔藓是喜阴的，因此，树干上长满苔藓的一面，就是北；鸟类为了避免风雨吹进窝里，总是面南筑巢；山里人信奉山神，在山林里，常常遇到用石头砌成的“山神庙”，庙门总是向南开的。凭着这些自然物象的指引，我们不仅在白天能辨清方向，甚至在刮风下雨的夜间，也能按既定方向前进。

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五年秋，我带着一支小部队战

斗在敌后，出没在林海雪原，搞清了许多重大军事情报，如宁安、穆棱等县的日伪军部署和特务网点分布情况等，绘制了宁安军用机场的位置、结构简图等，为我军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准确地摧毁日伪的重大军事目标，提供了依据。光复前夕，我还率小部队直接参加了对解放东北具有重大意义的牡丹江战役。

在六年多的小部队战斗生活中，我们取得过许多胜利，享受过胜利后的喜悦和幸福；也受过许多挫折，有过悲哀和痛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记忆，但其中最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近十年来的抗日斗争实践，我深深认识到，国民党坑国害民，共产党救国救民。为了救国，共产党派了许多优秀干部来东北，组建了抗日武装，他们对敌狠，对友和，关心人民，爱兵如子；他们有胆有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对此，我深怀敬意。在战斗中，我接触了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对照之下，觉得抗联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如王效明、季青、金策、郝贵林等，都象是共产党员。但当我问他们时，却都说："自己在照共产党的要求做，还做得很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斗争残酷，共产党的组织不光在地方上是秘密的，在部队也不公开。长期以来，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党的组织，不知向谁去提申请。没办法，我就照郝贵林、金策、季青这些人学，按共产党的要求做。就这样，在抗日斗争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十来年。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作为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的巡视员，带领一支小部队到宁安活动。当时，在宁安有一

支百余人的自发抗日队伍，其首领报号“九彪”。“九彪”队对抗联五军很友好，特别敬服周保中同志。因我率队来此活动，二路军总部就任命我为驻“九彪”队代表，负责做“九彪”的争取工作。按周保中同志的指示，我常常向五军政委季青同志汇报情况，听取他的指示。在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宁安道南特委书记，是道南地区党、政、军的“总指挥”。知道了这个情况，我简直高兴得要蹦起来，当即向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说：“共产党的组织没有公开，但是争取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却是公开的，希望你处处按照党的要求努力。”最后，他鼓励我对“九彪”抓紧工作。关于要求入党的事，让我多找经常同我一起活动的金铁宇和陈德山同志谈谈。由此，我知道了他俩也是共产党员。

在接触金铁宇和陈德山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俩是我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仅向他俩提出了入党申请，而且经常地跟他俩汇报思想情况。他俩对于共产主义的道理虽然知道得没有季青同志多，但是待人热情、诚恳，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们说，我党不光爱国爱民，还有自己的更大目标——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些道理上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原来他们是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道理上弄明白了，也就看清了自身的差距。我恨敌人，热爱祖国，同情贫苦的老百姓，我更要树立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我决心奋起直追，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加速锻炼自己，为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

党员而努力奋斗！

一年多过去了。一九四〇年七月八日，我小队正在宁安县老爷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休整，金铁宇和陈 德 山 同 志来了。他俩把我叫到一个树高林密的地方，金铁宇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李明顺同志，我代表党组织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党的一个新成员了。希望你再接再厉，作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着，陈德山同志从衣兜里掏出一面小红旗，是红纸做的，约三十二开纸那么大，上面画着镰刀、铁锤。金铁宇同志接过来，插在一棵大松树的老皮上，我开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誓为解放全民族，
解放全人类，
奋斗终生，
永不背叛！
……

当时，我直觉得浑身的热血在奔腾，心情从来没有那么激动！气氛是那样庄严、神圣！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二十一、我的两个"把兄弟"

为支援我部坚持抗日斗争，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抛妻舍子，有的蹲监坐牢，有的流了血，有的献出了生命。在这些支援过我们的老百姓中，我的"把兄弟"赵德明和"梁黑子"，尤其令人难忘。

谈起我和他俩的结识，他俩投入抗日斗争，以至最后壮烈牺牲，要追溯到一九三九年。

这年春天，上级让我带一支小部队去宁安老爷岭山区，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并代表周保中同志去争取"九彪"队抗日。

到了宁安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把小部队划成几个组，分别行动。这就需要有一个便于隐蔽、便于行动、便于生活的部队集散地。为此，我带着同志们一连几天，在老爷岭山林里四处寻找。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山林里东张西望地走着，忽然发现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有一间"趟子房"。同志们赶忙来到了小房跟前，进了屋。

房主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脚上的一双靰鞡头，已经补过几次了，头上戴着皮帽子，长长的帽耳往上卷着，在皮帽的遮檐下，方脸盘显得越发的瘦小了，宽大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浓眉大眼，粗糙的双手，正在熟练地修补鹿套子。

他见我们几个背枪的进了屋，一时有些惶惑，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他把炕上的东西挪开，用茅草笤帚扫了扫，连声说："坐吧，炕上坐吧！"说着，他跳下炕。

"老乡，你是当地人吗？"我坐在炕沿上，观察着屋里的陈设，顺便问了一句。土炕上没有席子；与炕相连的锅台上，放着一个用空芯木做的"盆"；一只带豁口的木瓢，漂在木"盆"的水面上。

"我是花脸沟人。"主人回了一句。

"在这干什么？"

"生活没着，下鹿套子。"

他淡淡地回答着，眼睛不住地打量我们，似乎在判断我们是哪家的兵。

从接触看，这个人象是一个老实农民。但那时，确有以打猎、种大烟、烧炭为名，给日寇搞特务活动的。我想，你就是特务，又能对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人怎么样？于是我说：

"我们是抗联小分队的，从国境线上来，几天没吃东西了，请你给弄点吃的吧！"

他一听我这么一说，粗犷的脸上立刻堆起笑容，两手一拍说：

"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又是化装的森林警察队来了呢！那些狗东西一来，我就倒霉了，他们扬手就打，张口就骂，伸手就抢！"说着，他大步流星地走出屋，把贮藏的鹿肉取来一大块，切了切，放进锅里煮起来。他一边架着火，一边同我拉家常唠起了他的身世。

他叫赵德明，出生在海林县秦家屯的一户雇农家里。兄弟二人，从小就给有钱人家放牛放羊；长大以后，就给地主作长工。后因生活所迫，他来到了宁安县东京城附近的下马莲河谋生。至二十几岁时，投奔亲属栾玉山，白吃白干了好几年。后来，栾家破产了，就靠套鹿为生。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讨上老婆。

听他讲述，看他言谈举止，我觉得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就把选择建"密营"地点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后，思索了一会儿说：

"'三兵所'的山沟里有个向阳山坡，山下有泉水，周围是山林，不光森林警察不敢孤军深入，就连一般的猎人，也很少到那地方。"我们听了，很感兴趣。

鹿肉熟了，我们饱餐了一顿。饭后，赵德明领着我们来到了'三兵所'。这的确是个好地方：山峦叠嶂，林木参天；一条山谷伸向远方，溪水在谷底顺势而下；谷口上，耸立着两座重叠对峙的山峰，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在赵德明帮助下，我们在这里建了"密营"。

"密营"建起后，我们同赵德明的往来更频繁了。不久，经赵介绍，我结识了"梁黑子"，还有在山里以做"水舀子"为业的"何水舀子"等。为了取得互相信任，便于工作，我和他们三人结成了"把兄弟"。

赵德明、"何水舀子"都有进出山的执照。他们利用套鹿、砍水舀子作掩护，给我们买吃的用的，做了大量工作。赵德明利用给伪兵、伪警送鹿肉、鹿茸等机会，深入其内部，给我们摸清了伪兵、伪警的装备、驻地、工事，以及双

山头特务据点等情况，还给我们画了宁安飞机场的位置图。宁安县有个村镇叫卧龙屯，日寇在那里大搞军事设施，建了机场，修地下工程。传说，日寇打算迁都到此。赵德明和“梁黑子”共同努力，绘制了简图。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苏军飞机所以能准确地炸毁了宁安的军事目标和卧龙屯机场，是有赵德明和“梁黑子”一份功劳的。

我们见赵德明一心为抗日救国出力，很受感动。我们给他四百元钱，帮他安了家，娶了媳妇。从此，赵德明就更把抗日小部队当亲人了。

一九三九年秋季的一天，他在山里见到了我，老远就喊：

“三哥，”在我们“把兄弟”中，我居老三，他总是这样称呼我，“正有一件要事和你说呢！”

“什么事？”我急切地问。

“有一天，我去大石头河子的山里下鹿套子，发现一个日本人的‘木营地’。后来，我以卖鹿肉为由进到里边去，探明了情况：那里有四、五个日本人，还有几个伪兵。你们要是去抄它一下，保证能胜利！。”

随后，我派人作了进一步的侦察，那个“木营地”不仅是个贮运木材的地方，还是一个特务据点。

一天晚上，赵德明作向导，我率领十来名战士，来到了大石头河子“木营地”。乘着月光观察，只见一道高高的大坝将河水拦腰截住，坝上按着大闸门。坝里边，升高了的水面上，漂浮着原木。两岸，存放着堆积如山的木材。

看到这些被掠夺的物资，我心中的怒火陡然而起。我一

声令下，带着同志们就向“木营地”的大门冲去。门岗已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们下了他的枪，冲进了营房。几个日本鬼子还在打着鼾声，就上了西天。几个伪兵爬起来，当了俘虏。我们捣毁了河坝，放走了木材，烧毁了营房，遣散了“苦力”，背走了“木营地”的全部粮食。从此，这个“木营地”就彻底完蛋了。

在凯旋路上，赵德明又说又笑，同我们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与赵德明一起干活的特务，发现他与我小部队有联系，就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因此，他被关进了宁安监狱。

在狱中，赵德明受尽了酷刑，但他拒不承认通“匪”，更没有供出我军驻地和我情报人员的情况。敌人没法，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扔进了洋狗圈。赵德明同志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遗有妻子。

“梁黑子”名叫梁景奎，宁安县花脸沟人，是伪自卫团团总梁永海的侄子。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脸又比较黑，所以人们很少叫他名字，都称他“梁黑子”。

自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和“梁黑子”结为盟兄弟之后，他就成了我的情报员。为防备敌人察觉，我们规定了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暗号。他从叔父梁团总那儿给我搞到了许多重要情报，还给我办了假身份证等。

一九三九年秋，“梁黑子”为我搞情报的活动被敌人察知，把他抓进了监狱，严刑拷打。打后，敌人引诱他说：“如果今后你和‘马胡子’一刀两断，给我们搞情报，就放

了你。”“梁黑子”想，敌人骗我，我就不可以骗敌人？于是他满口答应下来。获得了“释放”。

“梁黑子”出狱后，仍给我搞情报。至一九四四年春末，因有人告密，他再次被捕。同时，敌人还抓去了他的老父亲梁永山和弟弟梁景和。把他们带到小河子村，罐辣椒水，罐汽油，抽皮鞭子，折磨得死去活来，只问一个口供：“李明顺藏在什么地方？”“梁黑子”看到亲人遭受酷刑，很难过；又担心我因不知情况而出问题，就对敌人说：

“李明顺已经来了，明儿早我俩在鹰背砬子接头，你们可以跟我去抓他。”

第二天早晨，敌人荷枪实弹押着“梁黑子”朝鹰背砬子走来。敌人觉得“梁黑子”终于“回心转意”了，高兴地说：

“‘黑子’，你要是能抓住李明顺，就立了大功，能得一大笔赏钱呢！你要有官瘾，还能得个不小的官做呐！”

这些话，“梁黑子”连个个数也没听出来，因为他正在紧张琢磨对付敌人的办法呢。他在想，一会儿到鹰背砬子，我敲三下老椴树，李明顺就会出来，敌人端着枪站在我跟前，他怎么能脱身？再说，有敌情的暗号又怎能给出去？“急中生智”，这话确有道理。“梁黑子”正在急得满头冒汗的时候，忽然一个可行的主意涌上了心头。他轻松愉快地对看押人员说：

“你们这样跟着我，是抓不住李明顺的，他一看这阵势，还不早就躲开了？你们离我远着点，隐蔽一些，等我用暗号把他叫出来，再一齐拥上去，还愁抓不住活的？”

敌人听着有道理，就按“梁黑子”的意图拉开了距离，隐蔽起来。

“梁黑子”一看敌人上了套，就拣起一块大石头，走到老椴树跟前，“咣，咣，咣”地敲了三下。我躲在附近的石砬子缝里，听到敲树声，知道是“梁黑子”来了，就朝响声走去。当我离“梁黑子”还有一二百米时，只见他使劲地抡动着右臂，当空划圈。这是有敌情的暗号！我立即跑开了。“梁黑子”的举动，使我走来又躲开。这一切，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于是枪声响成了一片，子弹在我耳边吐噜吐噜地飞过，敌人叫喊着追过来。但我钻进了山林，拐了几个弯，就把敌人甩掉了。

敌人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把“梁黑子”押回村，连同他的父亲弟弟一起，送到了宁安宪兵队，关进了黑洞洞的魔窟——防空洞。敌人再次给他们施加酷刑，但一无所得。在光复的前夕，即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防空洞的大门打开了，汉奸头子林宝山带着几个打手走进来。林宝山狞笑着说：“抗战胜利了，你们回家吧！”就在梁家父子走出时，林宝山一声令下，三把刺刀同时刺进了梁家父子的胸膛，他们悲壮地倒在了血泊里。

“梁黑子”的叔父梁永海听到亲人被害的消息后，急瞎了双眼。待他重见光明后，串连了几个屯子的老百姓，武装起来，打死了林宝山，消灭了他的匪队，为死难者报了仇，为宁安人民除了一害。

二十二、三次遇险

一九四〇年农历八月初，上级派我带一支小部队到宁安了解敌特网点分布情况。

仲秋节的下午，我和同志们来到一个叫嘎斯沟的山林里。站在高处远眺，那错落相间的黄叶、红叶、绿叶，交相映辉，把万顷山林点缀得锦缎一般。夕阳下，微风掠过，阔叶林的肥大叶面翩翩起舞，如同无数只彩蝶在锦缎上拍打着翅膀。一层淡淡的烟雾笼罩群山，越发地使人感到江山如画，美丽多娇！

我正在聚精会神地观赏着这秋日的山林风光，忽然在右侧山谷里升起一缕青烟，还有几只乌鸦在那儿盘旋。我立刻警惕起来，呼唤伙伴们来看。同志们观望了一阵，断定沟里有人住，就拔出手枪，朝冒烟的地方走去。

到了跟前，我们趴在树丛里观察了一阵子。烟雾是从一间小房里升起的，有个猎人打扮的人在小房里出出入入。我告诉伙伴们就地警戒，一个人来到窗下，观察屋里的情况。屋里也只有那个“猎人”。他一眼看见我，就笑吟吟地走出来，迎我进屋坐。

“请问老总是哪一部分的？”他可能看我带着枪，断定是当兵的。我没回答，反问一句：

“你贵姓？当地人吗？”

"免贵姓崔，就在山下住。"

"在山里干什么活？"

"我是庄稼人，春夏种田，冬闲就打几张皮子(注)。现在庄稼没熟，没事干，就在这儿下几个鹿套子。"他说着，就一屁股坐到了木头墩上，抽起烟来。看样子，挺象个猎人：粗犷的脸庞，粗糙的手指，干燥的嘴唇，还有一身猎人的衣帽。但看他那灵活多变的眼神，却又不能不使人顿时生出几分疑心。为了摸清他对现实的态度，我又问了他一句：

"老崔，这几年生活怎么样啊？"

"别提了，简直把人折腾死了！抓劳工，挑国兵，要'出荷'，今天修机场，明天修警备道，闹得老百姓喘不上气来！"他说着，连打几个咳声。

"你说这些话，不怕抓思想犯吗？"他贸然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话，使我惊疑，就进一步试探他的政治态度。

"我看得出来，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就不象是给满洲国干事的。"他眯细着眼睛，瞅着我身上被挂扯破了的衣服，慢声慢语地说。

"你还真有点眼神儿，我的确不是亲日的，而是抗日的，是抗联小分队的。我们还有好几个人呢，已经几天没吃饭了，求你给弄点吃的吧！"我说着，偷眼观察他的表情。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说：

"太不巧了！我的粮食吃没了，正打算今晚回家去取

注：完达山、老爷岭一带人民把打猎称"打皮子"。

呢！你们等一等，我就去取，再弄点酒菜，让弟兄们在这儿过个节！”

我嘴里道着谢，心里却在合计：是下山取粮，还是去报信？为了不使他生疑，我嘱咐他给买点点心和罐头，并当即给他点儿钱。

姓崔的走后，我急忙找到其他同志讲了情况。大家也觉得此人可疑，就急速地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山上，趴在高树上观察动静。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姓崔的回来了。远远望去，只见他肩上扛着一个布口袋，右手拎着一个小筐篮，看样子象是把我们托办的事情都办了。他急速地走着，不时地回头望望，象是在照应后边的人。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警惕，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更远的山路上。

不一会儿，在姓崔的身后出现了一辆汽车，车上站满了鬼子和伪军。来到山下，车停了，鬼子和伪兵跳下车，漫散开，朝姓崔的小房兜来。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姓崔的原来是个特务，他的小房，是一个特务联络点。在敌兵还没到小房之前，我有心派人去干掉他，但又怕暴露目标，就只好暂时饶了他一条狗命。我小声地告诉同志们隐蔽好，注意观察敌人情况。

只见姓崔的回到小房一看，屋里没了人，就象热锅上的螃蟹，手脚沾不得地了，东跑一头，西窜一下，不住嗓地喊：

“抗联弟兄们，我给你们买来东西了！”

“抗联弟兄们，你们在哪里？”

……

鬼子和伪兵听见喊声，知道我们不在了，就急速地向小房围拢来。到小房跟前，只听见鬼子和伪兵一片叫骂：

“你的，钱的白花，饭桶的干活！”

“小队长，他把这个点给暴露了；不然，‘马胡子’怎么能逃开？”一个汉奸凑到鬼子面前递话。

“你真他妈的窝囊废，到了嘴边上的肥肉，又让它溜走了！”说话的这个汉奸，显然是姓崔的上司。

“你的，良心的坏了，拿皇军的钱，给‘马胡子’的干活！”鬼子小队长双手抓着姓崔的衣襟，几乎快把他提起来了。

把姓崔的特务臭骂一顿之后，几十名敌兵象饿狗寻食似的，在小房附近的山林里搜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搜着。而我小分队的同志们，却从容不迫地掏出小本子，把观察到的敌兵人数、装备、姓崔的相貌特征以及嘎斯沟附近的地势等情况，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为以后进一步查清这里的敌情打下了基础。

在我查清宁安特务网点分布情况时，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已发动了侵略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将大军开到中苏边境，妄图阻止驻在边境地区的抗日部队回东北内地，也对苏联施加压力，配合其盟国，伺机发起进攻。

在此形势下，为了准确掌握日寇在中苏边境上的陈兵情况，一九四一年七、八月份，上级令我带几名同志，到东宁、穆棱一带侦察敌情。

我带着同志们越过敌人封锁线，很快到了东宁境内。为

了尽快搞清全部日伪兵力情况，我和伙伴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就分头行动了。

一天夜间，我从老黑山去黄泥河子，目的是找几个熟人帮忙，摸清那里敌军的屯驻情况。

这是一个布满阴云的夜晚，天黑得象锅底，连脚下路面高低都看不清。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来到了一座桥上。桥有多高，水有多深，一概不知，只听见桥下的水哗哗啦啦地流淌着。我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桥身是用木头架的，桥面平平整整，宽宽绰绰。我心中有了底，就放心大胆地向对面走去。

当我刚刚过了桥身的中段，突然一脚踩空，身子忽悠一下子栽到桥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发觉身子卧在一些断桥木上。原来桥被水冲断了，而我却没看清。

醒来后，右腿已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被摔伤的腿疼了起来，浑身直冒汗。我想，这可糟了，走不了路，不是在等死吗？作为一个抗日战士，死有什么可怕的？问题是任务还没完成。想到这，也顾不得疼痛了，就用双手狠劲地揉搓着受伤的腿。虽然每揉搓一下都疼得钻心，但次数多了，右腿渐渐能动了。我扶着桥桩站起来，活动了一会，就一瘸一拐地上了路。

为了蒙蔽敌人，我们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往往多次改换装束。这次，我背着一个小包裹，里边装着几件化装用的衣服，装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子。

我在公路上艰难地走着，道旁出现了一片香瓜地。

瓜棚里，小油灯在闪动着微弱的光亮，一些小飞虫围绕着它盘旋。几个穿着异常的人在同“瓜把式”吵嚷。从吵嚷声里可以知道，他们是既要吃瓜，又不肯出钱，在向“瓜把式”敲竹杠。

不知是他们听见我走路的响动了，还是窥见我一个人在艰难地行走，就在油灯前往一起凑了凑脑袋，然后一起上路，朝我走来。因为天黑，我没看见他们手里拿着什么家伙。心想：你们要在我身上打主意，那可是瞎了眼！

当这几个人走到我的跟前时，一个劲地往我身边靠。我觉得情况不妙，刚往外趔了一步，一个家伙顺手给了我一木棒。他是往我脑袋上打的，因为我一躲，天又黑，棒子落到了我的背包上。我伸手掏出手枪就是一下子，那个抡棒子的家伙应声倒地了，木棒子甩在了大道外。其他几个歹徒，一听枪响，立刻狼狈逃窜。

因为枪杀了歹徒，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来到瓜窝棚打听这几个人的情况。“瓜把式”说：“这几个人是自卫团的，都是地痞无赖。你赶快走，他们会向警察署报告的！”

我急忙下了公路，钻到山林深处躲避起来。过了不过一个钟头，开来了一队鬼子兵。他们来到那个死尸跟前，叽哩哇啦叫了一阵，乱放了一气枪，就涌向了瓜窝棚。只听鬼子问：

“你的，见到‘马胡子’没有？”

“天太黑，没看见。枪响之后，倒听到有个人象是往回走去了。”“瓜把式”用手指了指我来的方向。

于是，一队鬼子兵向老黑山方向奔去。我走出山林，继

续向黄泥河子前进。

我搞清了黄泥河子的敌情后，及时回到老黑山，找到了其他几个同志。汇总了一下情况，我就和赵奎武同志到绥芬河畔的山区，侦察敌军驻扎情况。

已是初冬季节，绥芬河上飘着冰凌，我们也穿上了棉衣。一天早晨，我和赵奎武同志来到了绥芬河畔。望着波涛滚滚的绥芬河，我不由得踌躇起来。河上没有桥，也没船，怎么过得去？我俩身着冬装，又背着枪支弹药，泅渡是很危险的。年轻好动的赵奎武，在河边望了一会儿，说了声“我去找找船”，就沿着河岸向上游走去了。不一会儿，他划来一块木排，把我叫上去，一起过了河，来到了西岸的山林里。

听当地老百姓说，西边山林里经常有日本军出入，但究竟驻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不清楚。为了摸清确切情况，我和赵奎武决定亲自到深山老林里走一趟。

我俩经过大半天的奔走，来到了东宁黑瞎子沟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因为奔走劳累，又饥又渴，我俩就选了个有水的沟汊，点着火，准备拣点蘑菇、木耳、干果之类的东西煮煮吃。

火刚刚点着，就听到沟脑的后大山上有人咳嗽。我俩立刻扑灭了火，趴在树丛里观察动静。趴了半天，只听见山上有人说话，看不见有多少人。后来，我们俩偷偷迂回到有人说话的山头附近，爬上一棵高树观察。嗬，这里原来是个日本大兵营！一排排帐篷，在树木掩映下，隐约可见。轻重机枪、小炮，都在山头上架着。日本兵在帐篷里出出进进。看架势，足有一个团！我们观察完了，把这个兵营的规模、位

置以及工事构筑情况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就下山了。

当我俩走到谷底时，突然遇到了一只军犬。它一见我俩穿戴异常，就狂吠着扑过来，扯住我的衣服不放。赵奎武一看，掏出手枪就是一下子。军犬死了，但日本人象蜂子炸了营似的，应着枪声赶过来。我俩奋力奔跑，决心抢在日本人到岸之前渡过河去。

我俩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山路。当我们来到绥芬河畔的黄泥河子时，敌人已被远远地甩到后头了。

绥芬河里仍无渡河工具。时间紧迫，容不得再想别的办法了，我俩穿着棉衣跳进河里，奋力向东岸游去。棉衣一着水，足有二三十斤重，再加上我水性不好，身子在水里就象绑上了石头，直往下沉，很快就被急流卷走了。赵奎武一看我被卷走了，就急游过来，一把拉住我，带过了河。

我俩上岸后，迅速钻进了山林。等到日寇赶到西岸时，我俩早已在林木中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实力情况了。

鬼子站在河岸上狂叫着，无目标地向对岸发泄火力。几只肥大的洋狗，象为死去的伙伴吊丧似的，朝着东去的河水嚎个不停。其主子也在东寻西找，这喊两声，那放两枪，不时地举起望远镜瞭望。但一无所获，不得不偃旗息鼓回老窝去了。

这时，我俩的身体象是镇在冰窖里，冻得直打"牙梆鼓"。敌人一撤，我们立刻转移到一个远离敌营的隐蔽处，升着火，烘烤湿透了的衣服。身体虽然冷，但是查清了一个敌营的概况，却使我俩喜之不尽。赵奎武烤着火，兴奋地说：

“战士的快乐，只有战士才能享受到，团长，你说是吗？”

“你小子简直成诗人了，哪里还象战士？快烤衣服吧！”我说着，爱抚地踢了他一个腚光。

“你不也成‘诗’（湿）人了吗？”

我俩互相看着，裤腿里往下淌着水，不由得笑了起来。

二十三、智歼群敌

一九四二年末的一天，我从穆棱县的一个集镇上侦察敌情回来。路上，两个猎民在我的前头小声地唠着。

“老兄，那一天我到警备道的山林子里察看鹿套子，碰到一个意外的情况，可真叫人开心！”

“什么情况？”

“那个‘工作班’（注）的人，都贴树站着，有的龇牙咧嘴，有的伸舌瞪眼，都一动不动了！”

“怎么的了？”

“全被勒死了！”

“真给人民除了一害！哎，知道谁干的吗？”

“知道，抗联小分队！”

“你看见啦？”

“那个特务班长的脑门上写着：‘特务 下 场，汉 奸 当戒’，署名是‘抗联小分队’。这还不明白？抗联回来了！”

“好！我这酒没白打，今晚咱哥俩就喝一壶，也别等过年了！”

于是，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听着两个猎民的畅快交谈和爽朗笑声，我的思绪回到了

注：即穆棱武装特务工作班。

两个月以前。此时，侦察穆棱所遭受的一路艰辛，似乎变成了一杯暖人心田的美酒，使我感到无比欢畅，无比甜美。

那是我和赵奎武为了安全地越过敌人封锁线，已进入老爷岭第五天了。

老爷岭是一座连绵几百里的大山脉。它山峦起伏，布满了原始森林。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枯枝败叶。干死的树木，横躺竖卧，满身绿色苔毛，积雪能有一两尺深。中午时分，太阳透过密密层层的枝叶，向林间射出一道道光束。但这光束，好象含羞的少女，刚一露脸，就蒙上面纱，分不清眉目了。日头一偏西，山林里就似乎落了太阳。山风撼动着树木，远远近近响起了一片松涛声。这时，雪块从枝叶上落下来，打在头上，跌落到脖领里，被体温化成了水。冷风一吹，湿衣领成了冰领，一挨肉，刺骨的凉。冷了，不敢生火，怕引来敌人；饿了，嚼口炒面；渴了，抓一把雪摁进嘴里；困了，找一个熊瞎子洞睡一会儿。就这样，我们俩在原始森林里走了四天四宿，终于在第五天头上，来到了老爷岭的边缘。

这天下午，太阳偏西时，我和赵奎武沿着一条山岗走着、观望着，希望能碰到一个打猎的，解决一下饥饿。赵奎武毕竟比我年轻几岁，他蹭蹭地爬上一棵大松树，想寻几个残存的松籽，也看看周围的情况。他忽然高兴地喊：

“团长，快来看，山下有人家！”因我当过团长，他一直这样称呼我。

我急忙爬上去，顺他指的方向瞭望。在三、四里外的荒山脚，的确有炊烟升起。我对赵奎武说：

“那里如果有猎人，定会帮助我们；如果有敌人，也需

把情况摸清楚，走，咱们去看看！”

说完，我俩下来，就朝炊烟升起的地方走去。

原来，炊烟是从一间小房里冒出来的。小房建在一片山林的阳坡上，面向警备道。房后，放着一只死野猪。从猪身上的几处枪伤看，那是用“快枪”射杀的。由此判定屋里可能有敌人。我和赵奎武立刻停住了脚步，趴在树丛里观察着情况，研究着对策。

“我想，”赵奎武观察了一阵说，“这小屋，最多也就能住十几个人。如果有敌人，我们有匕首，又有手枪和手榴弹，打它个出其不意，不愁不能取胜！”

“不行，我们只有两个人，任务还没有完成，一旦伤亡怎么办？”我眼盯着小房，提醒赵奎武不要莽撞。

“难道白白放过他们？”赵奎武以请示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我沉思了一会儿，就悄声对赵奎武说了一个对付敌人的办法。他听后，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说：

“就得这样，敌人撞到咱们枪口上了，哪能便宜了他们！”

我俩悄悄向小房摸去。当来到窗下时，只听屋里在划拳，还夹杂着叫骂声：

“他妈的，老子在这儿等了一两年了，也没碰上一个，说不定他们绝根了！”

“你他妈臭手，还能抓着好牌！”

“别急嘛，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我顺着窗缝往里一看，只见屋里十几个人，有的歪躺在

炕上，象是醉过去了；有的在撕啃着猪骨头喝酒；有的躺在炕上嗞嗞地抽大烟；有的在用纸牌赌博。有两个人守着一大碗酒，红着眼睛在喊："俩好啊，三 星 照、四 季 财、八匹马、全来了！喝酒！喝酒！"崭新的十几支"三八大盖儿"，有的戳在地上，有的挂在墙上。这一切表明，小房是一个武装特务据点。

看清了全部情况后，我给赵奎武递了个眼神。他一脚踢开木板门，我俩鱼贯而入。两支"二十响"对着醉生梦死的敌人。

"不许动！"我右手握着"二十响"，左手掐着启开盖的手榴弹，对敌人喝道，"我们是森林警察大队的，在追捕土匪。刚才有两个逃匪跑到这里来了，要搜一搜！"随即，我对着窗外喊：

"一排掩护，二排把机枪抬过来，把住门！"

"啊，不要误会！"看样子，说话的人象个头目。他笑容可掬地说，"都是自己人，我们是穆棱工作班的，找土匪还找不到呢！"

"都是好人？"我装出惊疑的样子，"眼瞅着跑进两个土匪来，难道他们会钻天入地？"

"我说……我说……说呀"，一个喝得舌头发了硬的家伙开了腔，"咱……咱们，都……都是一家……家人嘛，要搜……搜，就……就搜……搜呗，反正真……真的假……假不了。"

"对，"我即刻接茬说，"这位弟兄说得对，真的假不了。就请诸位先委屈一下，我们搜一搜！"

“看搜不出来怎么办，我要向宪兵队报告的！”最先说话的那个“头目”小声地嘟哝着。

“报告不报告，随你们的便！”我一边目示赵奎武下手，一边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过我要警告众位知道，进山剿匪，这是我森警的神圣使命，是太君给的任务，谁敢阻拦？！”为了镇住这帮家伙，我故意提高嗓门对外喊道：

“机枪射手注意，谁要往外跑，就扫死他！”

赵奎武看到我的目示后，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把墙上挂着的、地上戳着的枪支归拢到我的脚下，就出了屋。他为什么走开？我正不解其意，他手里拿着一条很长的绳子回来了。我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机，对敌人说：

“眼下是坏人藏在好人堆里，只有好人跟着受点委屈，才能把坏人抓出来。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吗？那就请大家帮助我们抓坏人吧！我们先把诸位绑上，一起到县警察署取保释放，坏人不就出来了吗？”

“我们受点委屈倒算不了什么，就怕你们这样做收不了场！”那个头目以威胁的口吻说。

“我要求诸位的，只是暂时受点委屈；至于责任，诸位不必多虑，完全由我一人承担！”我逼视着那个小头目说。

敌人被缴了械，就已经是王八掉进灶炕里——连憋气带窝火，眼下又要被绑，哪能甘心？但我俩的黑乎乎枪口在对着他们！他们没敢挣扎，怀着“取保释放”的梦想，束手就擒了。

“汉奸走狗先生们，现在可以公开对你们宣布我们是谁

了！”赵奎武绑完了最后一个，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说道。

这时，敌人如梦初醒，一个个愕然地瞅着我俩。

“刚才你们不是还在哀叹抓不到我们吗？”我用枪管点着那个“头目”的脑袋说，“现在我们找上门了！告诉你们，我们不是什么森警，而是东北抗联小分队！”

敌人一个个耷拉了脑袋，象是刚刚放完血的鸡鸭。

我让赵奎武拿枪看押着，就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问。从这些特务口中，我抠出了穆棱县敌特网点的分布概况，以及日伪驻军的分布情况。

我和赵奎武合计，为杜绝后患，惩戒同类，将这群特务全部处死了。

为了不给当地猎民带来后患，我从衣兜里掏出本子，扯下一页纸交给赵奎武，让他写道："特务下场，汉奸当戒！"落款是"抗联小分队"。写完后，用浆糊贴在了那个头目的天灵盖上。

收拾完了敌人之后，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和赵奎武把收缴的枪支埋藏好，背起两大块熟猪肉和半袋子米，离开了小屋，向穆棱县城进发。

当我们爬上山岗时，回头望去，荒山脚下的那间小房呆立在落日的余辉里，几只乌鸦盘旋在上空，不时地发出“嘎嘎”的叫声，象在为特务嚎丧似的。我和赵奎武大口地吃着肉，喝着酒，回味起刚刚结束的这场特殊的战斗，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笑得真开心呀！

二十四、黎明前的战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上午，我接到上级命令：为光复祖国，配合苏联对日宣战，令我带一支小分队，到牡丹江一带参加战斗。

这道命令，激荡着我的胸怀，使我沉浸在无比喜悦与幸福之中。

从“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东北的骨肉同胞已经整整战斗了十四个年头。在这十四年中，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啊！不管斗争如何残酷，环境怎样艰险，始终乐观地战斗着，生活着，坚信中国人民终有一天会赶走侵略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这个当初只知不作亡国奴的自发抗联战士，一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能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参加光复祖国的最后一战，怎么不思潮汹涌！我感到光荣，感到幸运，浑身充满了力量！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武装群众，阻击逃跑之敌。

为完成上述任务，上级配给我们一部电台，每人发给一支手枪、一支转盘冲锋枪和四百多发子弹，还有中、日、苏三国军服各一套。为了确保准时赶到敌后，上级决定用飞机将我们分别伞降到各指定地点。

八月九日晚九时，我带着电报员姜德、战士赵奎武、孙

吉友（又名孙常友）来到了机场。这里，已有四架坐满了中国抗日战士的飞机，在待令起飞。我们登上一架飞机，内有四十多人，除了几名伞降指挥人员外，都是各小部队的指战员。

九点刚过，起飞的命令下达了，在茫茫的夜空里，四架飞机同时飞向灾难深重的祖国。

为不使敌人察觉，四架飞机均闭灯夜航。尽管如此，边境线上的敌高射炮群还是发现了，密集的炮火不断射向天空。但一个个火球飞到机身下边就消失了。原来敌炮的射程没有达到我们飞行的高度。我俯视舱外的夜景，飞机犹如在由千万簇火焰织成的花絮上飞行。不知是哪位战士见景生情，饶有风趣地说：

“同志们快看哪，日寇放焰火了，在欢迎我们回来参加他们的葬礼啦！”

于是，舱内一阵哄堂大笑。

大约飞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向舱外望去，底下一片灯火。指挥人员告诉我们，已经来到牡丹江上空了。飞机掠过牡丹江市，继续向西飞行，同时机身急剧下降。到了海林县拉古南甸的上空时，指挥员下达了跳伞的命令，我带领三名同志跳出了机舱。

一出机舱，除了耳边的“风”呼呼作响外，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全身的血，似乎一下子全冲到了头顶上，身体好象没了重量。我将双臂伸直，手心向下，在空中平卧着往下降。按照上级要求，出舱三四秒钟，我就按动了开关。于是，头顶上响了一声“炸雷”——伞张开了。这时，我双手



把紧伞绳，上身挺直，双腿半屈蹲着，慢慢下降。

东北农村的夏夜，晚十点多钟，就已经夜深人静了。我手把着伞绳向下望，下边一片漆黑，唯有一条白带子似的东西横在大地上。望望天空，飞机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天空象刚用清水洗过似的，星斗点点，水灵灵的。我的左上方，有一朵“白花”在飘动，肯定是姜德。因为他只带一只手枪、一部电台和三套军装，比起我们三个人来，要轻得多。我的左边，还有一张伞在飘动。另一个人哪里去了？我上下左右张望，终没寻着。

大约过了四、五分钟，我们三个人相继落在了一片稻田地里。我急忙把伞卸下来，折巴折巴，踩进了稻田的稀泥里，静听着周围的动静。稻田静悄悄，唯有蛙声不断。我连着拍了三下巴掌，姜德、赵奎武很快就找来了，唯独没了孙吉友。我们寻找了一会，没有；打了信号，仍没来。按着小部队的纪律，在预定的时间内不到约定地点，部队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我带着他俩来到了沙虎南沟林屯长的向日葵地里，向上级报告了伞降情况。上级回电说：孙吉友跳伞后，因伞出故障未张开，牺牲了。并要我们找到孙吉友的尸体，收回一切证件，以防敌人发现疑迹。

孙吉友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们找遍了稻田地，找遍了沙虎南沟的西山，一直没找到。

第二天清晨，沙虎南沟的农民林国仁到东山根上的菜地里摘西葫芦，突然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的“日本人”摔死在地里，身边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支转盘冲锋枪。他急忙回屯向屯长林国龙报告了情况。林国龙来到东山根上一看，回想起昨夜晚飞机响得那么厉害，又看到转盘冲锋枪，就断定死者是从苏联来的，他急忙把枪支弹药收藏起来。

“一个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了！”全村人带着惊喜不定的神情传播着。天亮后，出事地点很快聚满了人。

我们三个人还在西山上寻找孙吉友的尸体，忽然看见东山根上聚了一堆人，路上人来人往，断定那里出了事情。我们仨把冲锋枪插在山林里，换了中国服装，就奔向人群去了。近前一看，果然是孙吉友牺牲在这里了！

看到孙吉友的尸体，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悲痛。他艰苦奋斗了十四年，几次身逢绝境，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昨晚出发时他还向我倾诉心愿：“团长，这回咱们可要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了！”谁想到他“出师未捷身先亡”，刚刚到了战斗的地方，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俯下身抚摸着他的身躯，泪水落在了他那血迹斑斑的脸上。

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迅速地料理了善后，就向群众公开了我们的身份。我说：“苏联已经对日本宣战，我抗联大部队很快就会打过来，日寇的末日就在眼前了！”我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有枪的出枪，有刀的出刀，有人的出人，组成天罗地网，绝不让鬼子跑掉一个！

老百姓一听抗联打回来了，日寇眼见就要完蛋，高兴得满眼泪花，把我们三个人团团围住，问长问短，问这问那，争着拉我们到家吃饭。一位银须白发的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

“神兵天降，小日本和满洲国的气数到了！”

我们仨深深感到，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里，是何等幸福，何等温暖啊！

就在埋葬孙吉友的人群里，有一个商人装束的青年人，这瞅瞅，那看看，贼头贼脑，鬼鬼祟祟。他，就是沙虎南沟孙伯乐的侄子，以在县城里开照像馆为掩护的日本特务。他探得底细后，即刻回县城报告了日本人。

当天下午三点多钟，这个特务分子领着十来个日本骑兵来到了沙虎南沟。鬼子扒开孙吉友的坟，拍了照，取走了衣服，说了句“假的，统统假的！”就打马回城逃命了。

为了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决定当晚在林屯长的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林屯长布置好了岗哨，站到村头一声高喊，乡亲们就纷纷来到了他的大院。星光下，乡亲们欢聚一起，争相谈论着今天发生的事情。孩子们互相追逐着，打闹着，院子里充满了活力和喜气。

我正在讲话，在村口放哨的庄庆生派人来报告说：

“不好了，鬼子来了！”

“来多少？”我急切地问。

“二十多。”

“都有什么家伙？”

“除了‘三八大盖’，还有两挺歪把子机枪。”

“好！大家马上回家，我们占领炮台，把敌人消灭在村头！”

我的话音刚落，满院子的人“哗”一下子就散了。

这时，林屯长上前把我拦住了，他讲述了以往的“教训”，说什么也不让打。

“九一八”事变后，一支抗日救国军来到了沙虎南沟。临行时，命令屯里出几个人，把几个效忠日寇的朝鲜特务活埋了。过了不久，日寇来了，不仅把全村民房烧了个净光，而且抓走了埋人的那几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考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一旦不能把日寇全部消灭，老百姓也许还要吃苦，我就同意了林屯长的意见。但向他提出：“必须严守机密，不许把我们的行踪告诉敌人！”林屯长许下了“以全家人性命担保”的诺言，我们就上了西山，暗中观察敌人动向。如果他们敢对老百姓行凶，我们马上就

开火。

日寇进村后，直奔林屯长的大院。他们绑上林屯长严刑拷打，逼问他把死者的枪藏到哪里去了，死者的“同伙”跑到哪里去了，等等。林屯长不慌不忙地说：

“他们身穿皇军衣服，又说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分辨不清真假。枪，让他们拿走了。他们到哪儿去，我们怎敢打听？”翻译官翻译了几句，日寇小队长直卡巴眼。

村里的朝鲜族、汉族老百姓，听说日寇在给林屯长上刑，都来作保说：枪，确实让那三个“皇军”带走了。日寇整整在屯里折腾了一宿，太阳一冒红，就撤走了。

我们三个人潜伏在靠近道旁的青纱帐里，望着匆匆而去的日本鬼子，复仇的烈火在胸中燃烧。血气方刚的姜德同志小声地说：

“团长，打吧！”

我何曾不想打！这些狗强盗杀害了我多少骨肉同胞！我恨不得一口把它吃了！但考虑敌众我寡，他们还有机枪，我就压住心头怒火对姜德说：

“敌人没发现我们之前，不许开枪！要听命令！”

姜德刚刚十七八岁，正是火气旺的时候。我怕他“拢不住闸”，就特意加了后边这句。

他想不通，脸气得发胀，但没动，只是右手紧紧握着枪，两眼怒视着鬼子的身影，一声不吭地趴在地上。

这帮日寇刚刚走到半路上，被盘旋在空中的苏军飞机发现了，一顿机关炮，几乎全报销了。剩下的几个，如同丧家之犬，惶惶然钻进了青纱帐，向海林方向逃去。

打这以后，我们就在沙虎南沟、拉古南甸子、前沙虎、后沙虎等九个屯子，公开发动群众，同日寇展开了最后的斗争。

苏联对日寇宣战的消息一公布，日寇争相逃命，一批批地经过沙虎南沟等村涌向海林车站。因为当地人民手中还没有武器，也没组织起来，就眼巴巴地看着日寇逃走了。

这些当年威武不可一世的日本强盗，竟然变成了一群“饿狼”，见了猪狗牛羊，一刀捅死，拖着就走；见了鸡鸭，追赶得唧唧呱呱；甚至见了老百姓家的苞米面大饼子，也要抢个净光。

八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姜德、赵奎武三人正在沙虎南沟发动群众，忽然附近村里的一个老百姓跑来报告说：有二十多个鬼子朝他们村开来了，要求我们去打。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如能一口把敌人吃掉，既可以长人民的志气，又可以显示一下小分队的威力，给人民壮胆。但当时我们仅有三支转盘枪、四支手枪，力量还很单薄。为此，我们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歼敌的好办法。

快到中午时，鬼子兵来了。一个四十左右岁的庄稼人，手拎一只煮熟了的开膛鸡，笑吟吟地迎上去说：

“太君，一路辛苦大大的，村公所里这个的有，咪西咪西的！”说着，他把鸡举到鬼子小队长跟前。小队长一把接过去，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笑了，伸出拇指说：

“你的，中国人的这个，好人大大的！”说着，撕下一块鸡肉填在嘴里，带着队伍向村公所疾步走去。

伪满时的东北农村，不要说来了鬼子，就是来个警察，

也得单独立灶侍候。这些鬼子也许吃惯了，就兴高采烈地跟着送鸡的人走了。

别看这帮家伙又饿又累又惊慌，可是进村后，还得端起“皇军”的架势，端着“三八大盖”，刺刀上挑着“膏药旗”，纵排两路，迈着正步，“咔，咔，咔！”有节奏地走着，战斗帽两旁的扇风耳一掀一掀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引路的人在前头走着，不时地回头对鬼子恭维几句，借机观察他们的神色。

村公所的房子，是一幢一明两暗(注)的砖瓦房，两个屋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了杯盘酒肴。房前的大豆地，半人高的豆秧封了垄，在骄阳下，越发显得“蒸蒸日上”。房后的苞米棵子，已长得高过了房顶。

引路人到了村公所门前时，故意高声喊道：

“太君到了，快出来迎接啊！”

我和姜德、赵奎武趴在房前的大豆地里，听得真真切切。偷偷抬头望望，只见几个炊事员打扮的妇女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门旁。鬼子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满屋的肉香和酒气，一下子就把鬼子迷住了。他们进了屋，有的脱了军衣，有的把枪挂在墙上，有的戳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就吃了起来。

这时候，几名“侍候”鬼子的妇女已经退到院里。那个引路人也出了屋，对着大豆地高声喊道：

注：指外屋是共用厨房，两头是卧室的房子。

“太君喝得差不多了，上饭哪！”

我们仨应声而起。我和赵奎武端着冲锋枪冲进屋里，姜德把守窗户。我一声喊“缴枪不杀”，鬼子一怔，顺手摸枪。这时，我和赵奎武的两支转盘枪一起叫了起来。鬼子一片惨叫，硝烟从窗户往外涌。有个鬼子没死，跳窗逃跑。姜德立即打了一梭子，没击中，被潜伏在村公所周围的老百姓追上去，一铁锹把他劈死了。军民一起奋战，不到十分钟，二十多个鬼子就全报销了。

枪声一停，乡亲们立即帮助打扫战场。我们把尸体拖到房后苞米地里藏起来，除掉了屋里的弹痕和血迹，把枪支发给了老百姓，就又准备“宴请”第二批“客人”了。

“设宴歼敌”旗开得胜，极大地鼓舞了沙虎南沟一带的群众。有快枪的，扛出了快枪；有“洋炮”的，背起了“洋炮”；没有火器的，安上了梭镖。一支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很快建立起来了。在此形势下，海林县的一支伪国兵也调转枪口，投向了人民武装力量的一边。从此，日寇成了过街的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了。

一天上午，有十几个鬼子朝拉南村王德兴的瓜地走来了。王德兴心想：“这些家伙惯于白吃，这回可不能再便宜他们了！”就主动迎上前去和鬼子搭话。

“屯里，‘老毛子’的有？”鬼子见了王德兴，惊魂未定地问。

“‘老毛子’的没有，太平大大的！”

“皇军的有？”

“也没有。”王德兴灵机一动，马上又补了一句：“我

离屯半天了，有没有，说不确切了。等我进村看看，要是没有‘老毛子’，我来领你们。”鬼子高兴地龇了龇牙。

王德兴回到屯里，向我报告了情况。我跟他耳语了几句，他就走了。

回到瓜地，王德兴对日寇说：

“屯子里，‘老毛子’的一个没有，进屯咪西咪西，良民大大的欢迎！”

鬼子兵信以为真，就跟着王德兴进了屯，来到了事先做好准备的老张家。一进屋，这帮家伙急忙把枪扔到一边，脱了外衣，四蹄朝天地躺在凉炕上。见此情景，王德兴说：

“太君们休息，我回瓜地了！”

“好的，皇军的来了，统统地到这里来！”鬼子头显然觉得人少力单了。

王德兴回到瓜地不一会儿，又来了五六个日寇。进了瓜地一边吃，一边打听村里有没有“老毛子”。王德兴将刚才鬼子进村的事告诉了他们。鬼子高兴起来，忙让王德兴领着进了村。

来到小学校门口时，王德兴想，这些家伙合到一块不好打，就心生一计说：

“老百姓家卫生不讲究，学校里干净大大的，请太君到这儿休息吧！”

王德兴把鬼子带进学校安顿下后，就以筹备饭为借口，离开了学校，向我报告了情况。

我安排好了对付头一伙的力量后，就跟着王德兴来到了小学校门前。王德兴说：“你们先在外边等一等，我进去把

枪归拢归拢，打个老实的！”

他进了屋，抄起一棵大枪就往窗外扔。不巧被拦在窗外的铁丝网挡了回来。鬼子忽地站了起来就抄家伙。我一看不好，立即开了枪。有一个鬼子一骨碌下了地，伸手抱住了王德兴的腿。王德兴奋力拚搏，终不得脱身。我担心伤着他，就停止了射击。王德兴大声喊道："别管我，快打！"我瞄准目标，一枪把那个鬼子揭了盖，王德兴跑了出来。

与此同时，埋伏在老张家房后的赵奎武、姜德，带领刚刚发动起来的农民姜三和李保山等人，也下了手。

日本鬼子坐在凉炕上吃着小米水饭还嫌不解渴，一个劲地喊要凉水。李保山端了满满一盆水进了屋。他一看，一个鬼子吃饭还抱着大枪，就笑吟吟地端着水来到了他的跟前。鬼子刚伸手来舀水，李保山猛地连盆带水向他砸去。姜三乘鬼子不知所措的当儿，一把掳下了大枪，迅即退到屋外。就在这时，赵奎武的转盘枪和姜德的手枪响了起来。鬼子顿时喊爹叫娘，乱作一团。

赵奎武正在起劲地猛打着，屋里飞出一个香瓜手榴弹，正落到他的脚下，但没有爆炸——原来鬼子慌了手脚，没碰簧就扔了出来。有两个没打死的鬼子跳窗逃跑了，老百姓挥动着铁锹、梭镖追赶。这时，我们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把枪发给了大家，也参加追击逃敌。漫山遍野都是人，日寇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其中一个鬼子被惊呆了，见人们追来，没搬大栓就瞄准，被一个农民一枪击毙了。

经过几次实战的锻炼，群众的觉悟和战斗力很快提高了。敌人出现在哪里，就被消灭在哪里。沙虎南沟一带的九个

屯子，组成了强大的联防网，逃敌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了了。

几天来，大大小小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海林的日寇逃遁了，牡丹江市解放了，鸡西回到了人民怀抱……到八月十五日，令人惊喜若狂的大事发生了——日寇投降了！祖国光复了！

沙虎南沟一带同我们并肩战斗的父老兄弟们，纷纷来到我们住处报喜，我们也分别到各村去，同人民群众共享胜利的欢乐。各村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杀猪宰羊，整个山村沉浸在从来未有过的欢乐中。

那些汉奸、特务、警察署长、协和会长等罪大恶极分子，纷纷被愤怒的群众处以重刑；那些伪村长、伪屯长、伪警察等，除了畏罪逃遁者外，一一被武装起来的农民拘留起来。孙伯乐的那个特务侄子，被处了极刑。那些涂在墙上的"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圣战万岁"、"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反动标语，被人们用铁锹铲掉，代之以"消灭日寇！""严惩汉奸卖国贼！"等革命标语。每次集会，群众都用歌声表达内心的喜悦。胜利的歌声回荡在山村。

八月二十日，电波传来了上级指示，要我们迅即回营，另有任务。

乡亲们听说我们要走，纷纷前来看望。有的送来了猪羊，有的送来了水果，有的送来了大西瓜。我们劝他们拿回去，他们眼含泪水说：

"打天下你们舍生忘死；胜利成果你们一点不沾，让我们于心不忍啊！"

老人们拉着我们的手不放，孩子们扯住衣襟不让走。我望着这一张张敦厚热诚的脸，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拉着乡亲们的手来到了孙吉友的坟前。我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同战友话别：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却不能一起回去了；为了胜利，我们共同地经历了千辛万苦；胜利了，你却不能与我们共享快乐，同志啊……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千言万语哽在喉里。我呆呆地望着战友的新坟，眼前浮现出了赵尚志、郝贵林、戴焕章、赵德明等人的面容，为了民族的解放，他们怀着对胜利的向往，静卧在深山老林，长眠于三江平原。我说了声“再见吧，战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临行的这天早晨，乡亲们敲锣打鼓扭秧歌，簇拥着三辆披红挂彩的大车，把我们三个人送出了村。回头望，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村头，向着我们频频挥手。这时，激动的泪水湿润了双眼，我的视线由欢送的人群，再次转向了孙吉友的坟。这时，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耳边只响着乡亲们唱的歌声：

碧草萧萧夏日长，
共为救国忙；
祝歌一曲送长征，
从此各一方！
愿同志肩重任，
为国争荣光；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徬徨！

离开了这儿不久，我和姜德同志奉命去接收宝清了。赵奎武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壮烈牺牲在牡丹江地区。

二十五、进退宝清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上午，两架飞机从东飞来，在宝清机场、日本兵营、变电所分别投了几颗炸弹后，马上就飞得无影无踪了。“轰！”“轰！”“轰！”炸弹掀起股股浓烟，宝清人民欣喜若狂；日本如倾巢的黄蜂，惶惶然争相逃命了。八月中旬，我抗联战士刘凤文、杨凤鸣随同苏联红军一起进了宝清城。不久，我和周淑玲、姜德等同志也来到了宝清。

宝清光复了，但人民并未获得解放。为求解放，我们又立即投入了同反动派的大搏斗中。

当我抗联战士和苏联红军进占宝清时，同我们为敌了十几年的俞殿昌（此时任宝清县七星泡警察署署长），网罗敌伪人员，重新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收缴了“开拓团”的一部分枪支。以此骗取了苏联红军的信任，他当上了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宝清游击大队大队长。

俞殿昌一露头，宝清的反动势力立刻蠢动起来，有的投奔到俞殿昌的旌下，与其狼狈为奸；有的效法他的伎俩，窃据了军政要位。从此，宝清被控制在日伪残余势力手中。

就在俞殿昌窃取游击大队大队长职务的同时，宝清城里组织了两个反动组织；一个是保卫处，处长是伪宝清宪兵团分团长；一个是自治委员会（即维持会），会长是伪宝清街街

长武振鹏。

九月间，保卫处在各种力量的反对下垮了台。垮台后，由维持会长武振鹏出面，成立了宝清公安局，伪宝清警察署署长黄佐贤当上了局长，伪国兵二十八团少校林德坤当上了副局长，而俞殿昌则当上了公安大队队长，并率队进驻了宝清城。

从此，俞殿昌就成了宝清城内大权在握的人物，这就引起了武振鹏和伪国兵二十八团少校营长宫玉轩的眼红。他们串通了几个人，一举改组了公安大队，成立了游击总队，宫玉轩登上了游击总队头子的宝座。新成立的游击总队，加紧招兵买马，在原公安大队的基础上，很快网罗了四百多人，组成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俞殿昌；第二大队，大队长李德新；第三大队，大队长李济民；第四大队，大队长李世玉。这几个大队的头目，无一不是汉奸。

宫玉轩正在得意忘形时，俞殿昌勾结李德新缴了他的械，由林德坤当上了游击总队队长。同时，改编了总队，取销了公安局，成立了缉查处，原伪兵二十八团的准尉“宫疯子”（宫兴山）当上了处长。维持会也换了马：武振鹏下台，伪宝清县法院审判长彭玉石爬上了维持会会长的交椅。国民党县党部也挂出了牌子。至此，反动的阴云笼罩宝清，人民再次经受了灾难。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的形势，我们进宝清后，抓了三件事。

一、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此之前，宝清有无党的地下组织，我们不清楚。随同苏联红军一起进驻宝清的几个中国

同志，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人少力单，也没建立组织。我和周淑玲等同志到宝清后，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于九月份组建了党支部，由我任书记，杨凤鸣任组织委员，刘凤文任宣传委员。从此，以党支部为核心，团结抗日积极分子，同"下山摘桃"的敌伪反动派展开了斗争。在斗争中，我们于十一月份发展了第一名党员——原抗联五军四团二连的地下工作者、民主大同盟宝清分会的宣传部长赵鸿丰同志。

二、组建大同盟。日寇投降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形势，合江省委决定在各地组建民主大同盟分会，以团结各阶层人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进驻宝清后，为贯彻省委的这个指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至十一月一日，东北民主大同盟宝清分会正式成立。宝清街业成区小学校长武正民任会长，省委派来的干部赵宇慈任副会长，原抗联的地下工作者赵鸿丰和七星泡小学校长陈凤亭负责宣传工作，当地进步人士米树贤和王少周分别任组织部长和总务部长。大同盟召开了成立大会，挂出了牌子。之后，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大同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行政府职能。当时，宝清街里挂着两块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大同盟的牌子就挂在它们中间。因此，大同盟不仅要带领群众同反动的维持会和反动武装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国民党进行较量。

大同盟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宣传工作。他们从省里取来东北民主大同盟的纲领、宣言、标语，到处宣讲，四处张贴，甚至连维持会的大门口也贴上了大同盟的标语。汉奸们

看到“要清算汉奸罪行”的标语时，有些惊慌，忙去问大同盟的负责人：“汉奸指的是谁？”当他们明确了就是指的“日伪汉奸”时，个个目瞪口呆。大同盟还几次组织人深入工厂农村，宣传建立人民武装、保卫胜利成果的必要性，号召人民交出私藏的武器，等等。经此宣传教育，有的交了枪，有的交了子弹，有的积极提供有枪的线索。这些，都为建立人民武装打下了基础。

三、建立人民武装。我们最先进入宝清的几个同志，虽然有护身武器，但太少，而且都是短枪，远不能和拥有几百人的反动武装相对抗。在此形势下，我们深感建立人民武装的必要。

我们进宝清不久，省委派杨清泉带着十几个人的队伍来到宝清。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又从人民群众中收缴了部分枪支，很快组建起了五、六十人的武装队伍。

我们虽然搞起了一部分队伍，但敌人仍处于绝对优势，随时都有向革命力量扑来的可能。为此，我们派人到佳木斯向省委作了汇报。应宝清大同盟的请求，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赵凯良率三百多人的队伍，于十二月进驻宝清城。从此，就改变了宝清的革命与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对比，构成了针锋相对之势。

三江人民自治军进驻宝清不久，赵凯良就把俞殿昌、李德新、李济民等召集在一起，谈判部队收编问题。经过两天多会场上的激烈斗争，终于达成协议，俞殿昌、李德新、李济民等，同意将其队伍改编统归赵凯良指挥。

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在宝清二校操场上召开了改编大

会。会议由宝清大同盟副会长赵宇慈主持，改编和被改编的队伍分别站在一起。同时，还有宝清各界人士和大同盟的成员参加。

俞殿昌等人对改编的事心怀不满。他们进入会场后，就寻衅闹事。但三江人民自治军和大同盟，完全按事先达成的协议行事，敌人无隙可乘。最后，竟以杨清泉的队伍把机枪放偏了位置为借口，吵闹起来。俞殿昌怂恿其部下向杨清泉和赵凯良的队伍开枪。匪首马永胜端起机枪向主席台扫射，当即打死会议主持人赵宇慈，击断了赵凯良的双腿，参加会的有十一人当场牺牲。人民军队立即组织还击。顿时，平静的二校操场，变成了枪声与喊叫声混在一起的战场。

我一看李德新的第二大队还没动手，就站出来高声喊道："二大队的弟兄，要镇静，不关你们的事！"李德新早与俞殿昌有矛盾，我曾作过争取他的工作。经我这一喊，李德新拉起队伍走了。三江人民自治军同俞殿昌的队伍边战边退，最后撤到城外，赵凯良就率队向富锦方面去了。

事后，我和周淑玲、赵鸿丰等，撤到了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了情况。俞殿昌几次派人找到苏军司令部要人，说我是"土匪头子"，说赵鸿丰是"汉奸"，扬言要治裁我们。苏军没理他们。

过了几天，苏军从东安开来一个炮团，团长是上校军衔。我和周淑玲找他，要他支持我们缴俞殿昌的械。他不仅不支持，反而谴责我们不应该改编俞队等。我们说："改编，是奉我们上级指示办的。"那个苏军上校把脸一横说："那就找你们上级去吧，我们不管！"这件事，使在场的中

国人深深感到，建立一支自己的强大的人民武装是何等必要啊！

在此情况下，我召开了支委会，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考虑三江人民自治军已撤离宝清，杨清泉的队伍也回佳木斯了，苏军又是这种态度，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不仅很难开展工作，安全也没有保障。鉴此，我们决定撤离宝清。我和周淑玲冒充翻译，乘苏军炮车去东安地委汇报情况，派赵鸿丰同志带领姜德、姜酒峰等二十几个人，星夜赶往佳木斯，向地委书记、负责城市群众工作的彭施鲁（注）同志汇报情况。

从此，宝清城完全笼罩在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下了。

当我乘坐着苏军炮车驶出宝清南门时，依依不舍地回头望望我们战斗过的县城，心中暗暗自语：

“宝清城啊，你等着吧，忠于你的儿女们终有一天会回来的！”

注：彭施鲁现在解放军国防科委工作。

二十六、烽火鸡冠山

我们从宝清撤到东安不久，合江省委派来的地委副书记白如海同志就到任了。

东安地区，在伪满时，原叫三江省，下辖密山、虎林、饶河、宝清、鸡西、林口六个县。伪省长是日本人，光复时，被苏军抓走了。副省长高振声是中国人，光复后，苏军让他继续执事。这个人的台柱，就是郭庆典、杨树范、陆景堂等人的地主武装，即人们所说的"中央胡子队"。

十二月末，白如海同高振声、郭庆典等人进行了谈判，要求他们听从东安地委指挥。但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怎肯把抢到的一切拱手交给共产党和人民？谈判破裂了，白如海同志的身份也公开了。如果他继续留在那儿，已经开展不了工作，也很危险。因此，他决定到鸡西市去开展工作。

在鸡西，抗战的炮火刚停，国民党反动派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的激战就开始了。从此，英雄的鸡西人民，再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东安地委书记吴亮平还没到职，白如海要去鸡西，就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安排一下。起初，白如海考虑姚仲达会说一些俄语，在今后工作中便于同苏军打交道，就点名让他一同去鸡西。但姚仲达素性怯懦，在宝清俞匪叛乱中吓破了

胆，一听说让他为白书记“护驾”去鸡西，就哭了。对此，白如海批评说：“敌人的刀还没摁到脖子上，就吓成这样子，成何体统！”

我看到白如海生气了，就诚恳地说：“白书记，我曾长期在东满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对那里的地理、民情比较熟，也会说几句俄语，让我去行不行？”接着，我讲了到鸡西后的打算：如果能站住脚，我们就在市内开展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将工作全面推开；如果不行，我们就到乡下去，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游击战。

白如海同志从我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抗联团长，又带了几年小部队，再加听了我这番“毛遂自荐”的话，就高兴地说：

“姚仲达、杨凤鸣、周淑玲同志到虎林去，配合驻在那里的我常永年三八支队作好接收工作；我和李明顺同志去接收鸡西，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可到鸡西去找我。”

我和白如海同志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后，就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搭乘苏军遣返白俄的卡车出发了。

途中，几次遇到“中央胡子队”的拦劫，都因我俩带着“苏军翻译”的证明，过了关。

经过一天半时间地奔波，于第二天中午到了鸡西境内的半截河镇。我们正在吃午饭，突然进来两个当兵的，说他们的大队长赖明发请白书记和我去“赴宴”。这使我俩顿时警惕起来。我们与赖明发素不相识，何以突然登门拜请？我们到了半截河并未声张，赖明发何以得到了消息？从情况判断，很可能是驻东安的郭庆典发觉我们走了，电告赖明发

的。他要袭击苏军卡车，不敢；到我们住处抓人，也怕苏军不让；最后设了“鸿门宴”。

我俩感到情况紧急，找苏军说明了原委，吃过午饭就出发了。一路急驰，当晚到了鸡西。

到鸡西的当天夜晚，我和白如海同志住进了火车站跟前的高寡妇店。

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旅店。房间的墙壁是一人多高的半截墙，相邻客房之间，不仅可以互相说话，而且互通灯光。为了警惕敌人突然下手，我和白如海颠倒而卧，合衣睡在一个被窝里。

我俩躺下不一会儿，就发现隔壁有两个人向这边探头探脑。我立刻用腿碰了碰白如海，又向隔壁目示两下。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警觉起来。之后，又多次发现那两个人向这边窥视。我和白如海表面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但一点睡意没有，各自把手枪握在手里。白如海同志悄声对我说：“老李，我们得想法把他们甩开！”他说着向隔壁目视一下，我点头会意。

旅店虽然烧着火炕，但室内气温都很低。隔壁那两个家伙叫苦不迭，显然冻得有些挨不住了。天快亮时，隔壁传来了嘀咕声：

“咱俩去吃点东西吧，天也太冷了！”

“嘘，小点声，惊动了邻居！”

“没关系，他俩睡着了。”一个家伙又向这屋窥视了一下说。

随即，门吱哑一声。

我俩听了听，那两个人出去了，立刻爬起来，盯着他俩的背影。当这俩个家伙走出一、二百米远时，我俩悄悄推开门，急速地朝街里跑去。没想到他俩发现了我们，拚命追过来，并大声喊："站住！不然开枪了！"我俩一拐弯，发现一个大院门口有苏军站岗，就朝那里跑去。到了跟前，我向苏军门岗说明了白如海的身份以及目前处境，要求见他们司令官。那个士兵听了后，把追赶上来的两个家伙赶跑了。原来，这里是苏联红军司令部。

后来弄清楚，跟踪我们的那两个家伙，原来是鸡西公安局局长"阎大马勺"（阎树明）从赖明发那里获得了情报，特意安排来对付我们的。

进入鸡西后，我们很快找到了东进工作委员会的同志，白如海同志听取了他们进出鸡西的情况汇报。

光复后，我地下党员陶宜民同志会同杨公益等人，在鸡西组织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东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进会）。

陶宜民同志原是抗联五军地下工作者，一九三八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处以无期徒刑，押在哈尔滨监狱。在狱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复前夕获释后，几经周折，与原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接上了关系。后按李兆麟同志的指示，同杨公益、韩星、刘文汉、朱玉山等人来鸡西开展工作。

他们从哈尔滨出发时，本打算用民主大同盟的组织形式，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抗战胜利果实。但沿途所见各地大同盟均被地主武装捣毁了。如以民主大同盟的形式

出现在鸡西，必难站住脚。因此，经陶、杨等七人商定，取向东进发之意，决定在鸡西以东进会代替民主大同盟。

陶宜民等同志到鸡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很快发展了几十名新成员，于十一月上旬召开了东进会成立大会，并正式挂出了牌子。同时，在滴道、平阳镇、梨树镇等地，也分别成立了东进会分部。

从此，陶宜民等就以东进会的名义印发传单、标语，宣传我党民主建国的方针，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同当地政府、公安局、维持会展开了合法的斗争。在斗争中，团结了一大批失散的抗日军人，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东进会的队伍迅速扩大了。

在东进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反动营垒的一些人物开始动摇。经陶宜民工作，鸡西保安队队长佟振声表示愿意接受东进会收编。永安屯的小地主陈锡元，是个有政治目光的知识分子，他不愿去平阳镇大地主毕绪奎的建军团当参谋长，主动要求参加东进会。后按东进会的指示，他作为东进会的地下工作者，到毕团里当了参谋长，为东进会提供了一些可靠情报。

要收编佟振声的保安队，需要请示省委。为此，杨公益、陶宜民先后去合江省委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因途中遇到了叛军，未能按期回来。

就在陶宜民同志离开鸡西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先遣军谢文东的参谋长吴康，率队进了鸡西。

一天，吴康召集保安队开会，东进会的成员朱玉山混进了会场。会上，吴康叫嚣：

“东进会是共产党搞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捣毁，把它的成员一网打尽！”

朱玉山听到这，偷偷地溜出会场，回到东进会总部向韩星同志讲了情况。韩星同志感到情况紧急，马上把在鸡西的东进会同志召在一起，商讨对策。考虑敌武装近千人，我东进会人手少，而且没有武装，就决定撤到梨树镇去。

这时，梨树镇分部手中已经掌握了一支小队伍。说起弄枪来，这里还有两个故事值得提一提。

伪满时，穆棱煤矿（矿址在梨树镇）是日伪当局与白俄联合开办的。为了镇压工人，矿主组织了四五十人的护矿队，每人都配有枪支。

光复后，原八路军战士、在煤矿上作“特殊劳工”的徐广泉同志，曾接管了护矿队。但由于他带头贴“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很快就被原东北军的兵痞杨占华夺了权。从此，护矿队就成了“祸矿队”，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义愤。

自从东进会分部成立后，东进会负责人徐广泉就在打护矿队的主意。他同陶宜民同志几次与苏军司令部联系，要他们协助缴护矿队的械，均遭拒绝。最后只同意出两个兵跟着去一趟，而且声明他们不动手。

一天上午，徐广泉带着两名苏军战士向护矿队走来。徐广泉同志边走边琢磨，护矿队有几十人，而自己空手一人，怎么缴他们的械？他在八路军里当过排长，懂得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道理。当他回头一眼看到两名苏联士兵跟在身后，恰似自己的护卫一般时，心中顿时生了主意，便大步流

星地朝护矿队大院走去了。

到了大院，苏军士兵问："我们俩怎么办？"徐广泉胸有成竹地说："在院里来回游动就行了。"说完，他几步插进了护矿队的营房。

营房里，有的在睡大觉，有的在打麻雀牌，有的在"推牌九"(注)，呼五吆六，烟雾缭绕。徐广泉进屋后，多数人似乎没看见他；个别认识他的，信口应酬了几句，仍在照常赌博。徐广泉嘴里应付着，眼睛锐敏地扫视了一圈。当他一眼看到靠近炕梢的墙上挂着一枚四十八瓣的手榴弹时，猛地跳上炕，一把抓在手里，大声喝道："不许动！"正在赌博的人惊呆了。

"弟兄们，"徐广泉说，"这事不干系你们。杨占华欺上压下，把护矿队变成了他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我是奉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命令，来收缴护矿队枪支的。"他说着，用手向外指了指，"你们看，苏军已把门封死了，谁往外跑，就打死谁！"经徐广泉这么一吓唬，往外一瞅，果然有两个苏兵在院子里游动。想抄枪的，也不敢伸手了；想溜的，也不敢动了。

就这样，徐广泉一个人缴了护矿队的械，重新组织了护矿队。从此东进会手中有了武器。

就在缴了护矿队械的第二天，徐广泉带着两个同志，来到了建军旅旅部的门前。

光复后，为了加快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除了对原有的

注：一种赌博形式。

土匪加封“先遣军”外，还到处搞“地下建军”。在这种气候下，梨树镇穆棱煤矿坑木把头万奎英搞起了一个建军“旅”。“旅”部设在他家，门口上挂起了建军旅的牌子，并设了双岗。当东进会摸清了他只有三条枪、两个哨兵时，就决意搞掉它。

站在“旅”部门前的两个哨兵见来了三个生人，故意提了提神。徐广泉上前说：“我们是从牡丹江来的，有要事跟你们万旅长谈。”一个哨兵进院了。

不一会儿，万奎英出来了。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哪里象个旅长，倒象个土绅士！他把来人迎进屋里，急令侍童献茶。万奎英边喝茶，边打量徐广泉等人的装束，猜测他们的身份。当他一眼发现这三个陌生人衣服里插着手枪时，顿时有些手足无措，呆了半天才问：

“敢问诸位，光临敝舍有何指教？”

“我们是东进会的，奉苏军司令部的命令，来收缴贵旅的枪支和建军所用的一切物品，望万先生给予方便！”

万奎英听着，脸色一沉，但瞬间就换上了笑容，故作斯文地说：

“万某德疏才浅，肩此重任，甚感力亏。今日贵会给此良机，实为万某有幸！诸位稍坐，万某从命！”说着，他站起来，打开柜子，拎出一个小旅行兜，放到徐广泉面前说：“请过目！”

徐广泉打开一看，公章、办公用纸、建军花名册，还有一支手枪，整个旅的家当全在这里了。接着，万奎英唤进了两个哨兵，令其放下大枪，回家了。这样，东进会又增加了

两支大枪、一支手枪，万奎英的建军旅也就彻底覆灭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份，陶宜民同志历经艰险来到了梨树镇。他一看鸡西东进会总部的人大都在这里，就知道鸡西被敌人占了。他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任务，决定再回鸡西。

陶宜民带着家住鸡西市内的崔树本潜回鸡西后，经与东进会成员李茂园、车炳桓等同志积极工作，鸡西的革命人民再次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为省委派人来全面接受鸡西，奠定了群众基础，锻炼了干部。

我和白如海到达鸡西时，正是“阎大马勺”得势之时。他靠拉拢腐蚀等手腕，保住了公安局长的宝座，又接受了国民党授给他的先遣军四十五团团长的头衔，成了鸡西市反动势力的核心人物！我们觉得，“阎大马勺”及其反动武装不除，人民武装就难以建立与发展。为此，我们同陶宜民同志一起，在李茂园家研究了缴公安局械的部署问题。

春节临近了。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鸡西人民，满怀喜悦地进城买年货。由李茂园、车炳桓等同志秘密组织起来的一百五十多名朝鲜族青壮年农民，混在进城的人流里，涌进了城里。晚间，他们悄悄地来到了预定的集合地点——发电厂附近的矿山机械厂。

这天晚上，我和陶宜民等同志去苏联红军司令部联系，要求他们协助我们缴公安局和保安队的械。苏军答复我们的要求时，已经快到半夜了。

我们急忙离开了苏军司令部，来到了矿山机械厂，进行夺取公安局枪支的具体部署。

天刚刚亮，一些赶车送劈柴的、挑担送菜的人，陆续来到了鸡西公安局大门前，被门岗拦住了。他们乘敌不备，一下子夺了门岗的枪，然后急速地冲进了营房，把还在沉睡的公安兵缴了械。

我们对被俘人员认真执行"留去自便"的政策，他们深受感动，有的揭发了"阎大马勺"逃跑前藏枪的罪行。根据揭发，我们先后搜出了七、八十条枪。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还协助我们收缴了保安队的部分枪支。

我们把这些枪支装在大车上，拉到矿山机械厂，分发给早已编好班、排、连的青壮年农民。从此，鸡西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伍。

鸡西公安局被缴械后，人民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军参政。光复时各地拉起的"自卫队"，也先后接受了我们的收编。

在此形势下，我们在一栋空楼的门口上挂出了"鸡西独立团"的牌子，在各十字路口上，张贴出了"独立团招兵告示"。从此，上千号人的独立团，很快就组织建立起来了。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召开了独立团正式成立大会，孙轩华任团长，陶宜民任政委，东安地委副书记白如海同志兼任鸡西县委书记，我任公安局长。之后不久，把国民党的县长丁家逦抓了起来，陶宜民当了县长。在此期间，我们还把民主妇联、民主青联、民主学联等群众组织建立起来。至此，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人民武装等，在鸡西初具规模了。

我们收缴了公安局的枪支后，盘踞在半截河的地主武装

头子赖明发，立即表示愿意接受我党领导。从此，我们收编了他的队伍，并任命他为游击大队队长。

赖明发对共产党素怀敌意，接受收编，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我们缺干部，虽说收编了他的队伍，却只派去了几个干部。因此，他的队伍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

收编后不久，县委获悉，赖明发正勾结谢文东策划叛乱。为此，县委决定，派王飞和我带一个中队去半截河，任命王飞为教导员，我为大队副，对赖明发的队伍实行监督改造。随后，又派去赵鸿丰同志任副教导员。

我们到半截河后，更引起了赖明发的忌恨。但这个老于世故的地主头子，表面上却还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我们带去的队伍，作为一个中队，同赖明发的队伍编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操练，表面看，完全是一家人。但实际上，却各揣心腹事。

赵鸿丰到半截河不久，赖明发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心腹把他盯上了。姓李的借口帮助赵鸿丰熟悉情况，布下了圈套。他说，这里有五个中队，四个中队在城外，明天要陪赵到城外去看看。赵鸿丰初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连个感性了解都没有，就信以为真了。

当晚，赵鸿丰说了明天的打算。我听了，感到惊讶：

“你知道他们是要你干什么去吗？”我以惊疑的目光凝视着赵鸿丰。

“是去看看各中队的情况。”赵鸿丰不加怀疑地重复着姓李的话。

“他们是让你去送死！”接着，我给他介绍了赖明发一

心要搞掉我们的大量事实。赵鸿丰听后，如梦方醒，惊叹说：“险些上当！”

第二天，为了避开敌人圈套，又不给赖明发留下口实，我就派赵鸿丰带着一支队伍到古城子起枪去了。

古城子离半截河约五、六里路。那里原是一个日本兵营。日寇退却时，扔下了一些枪支，落到了地主和群众手中了。

这天早晨，赵鸿丰带着队伍，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了。刚刚走出半截河，迎面来了一支队伍。赵原以为是自己人，没太在意。等走近了一看，队形很不整齐，引起了他的警惕。他举起望远镜望了望，来的队伍里有背大枪的，有背小枪的，走起路来歪歪斜斜，这不分明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吗？因为当时我们的队伍，除了干部外，其余全是大枪。赵鸿丰立即命令战士就地展开。当敌人来到跟前时，两军开了火，枪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近期以来，我们察觉谢文东曾着便装偷进赖明发的家。这说明，赖明发加快了叛乱的步伐。对此，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充分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加强了情报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赖明发拟在中央饭店设“鸿门宴”，妄图将我中队长以上的干部逮捕，缴我全体战士的械。

针对这种情况，我请示地委副书记白如海同志。他指示：务必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打破其叛乱计划。

当时，我们带去的队伍不过百人，而赖队却有五、六百人之多。据此，我们拟利用在道德会大院开会之机，将其中

队以上指挥员全部缴械，然后缴其全大队的械，重新改编队伍。这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需要请示地委。于是，派王飞同志去东安向地委汇报，听取指示。

但王飞是游击大队的教导员，外出好几天，容易让赖明发生疑。为此，他编好理由，临行前去找赖明发请假。

恰在这天早晨，赵鸿丰同志率队去古城子取枪，我在半截河的队伍就减少了一些。

当王飞同志来到赖明发大院门前时，大门紧闭，只听院里有好多人在说话，在走动。他顺着门缝往里一看，赖队的许多人都聚在院子里，胳膊上系了白毛巾。不知是暗中窥见王飞来了，还是在大院四角的炮楼上看到了王飞，只听一个人对赖明发说："他来了！"

"在那儿？抓住他！"赖明发歇斯底里地叫起来。

王飞顿时觉得不妙，回头就跑。于是，枪在身后响了起来，子弹在耳边唧溜唧溜地叫着，身前身后掀起了一股股烟尘。

这时，我听见枪声，断定王飞遇险了，就带队向赖家大院奔去。当我迎回了王飞，到达"火磨"(注)时，只见院里布满了兵。有个小头目伪装热情地招呼说："大队副，你过来一下！"我一看气势不对，就一个箭步窜到了一个掩体后边，其他同志也各自选择了地形地物。这时"火磨"里的冲锋枪就叫上了。因为我是大队副，再加上身边还有几十人，我一声喊撤，自己的人，还有敌五中队的一部分人，就一起撤向

注：当地的粮食加工厂，人们都称"火磨"。

城外。

到了城外，赵鸿丰正在指挥着队伍同敌人激战。我们兵合一处，很快把国民党的杂牌军压了回去。

打退了“杂牌军”，我带队来到了夏家亮子，把混进我们队伍里的赖明发的人缴了械，就同王飞、赵鸿丰一起，带队回鸡西了。

赖明发叛乱之后，就公开投靠了谢文东。一九四六年冬，赖队被我三支队和三五九旅摧毁，赖明发先是隐匿起来，后被搜出枪毙了。

我们撤回鸡西后，正逢地委书记吴亮平和二支队司令员谭文邦到了鸡西，立即向他俩作了汇报。这时有消息传来，几个“中央胡子队”进驻了平阳镇。吴、谭二同志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明天就去攻打平阳镇。

第二天拂晓，谭文邦同志率三支队，我带着鸡西游击大队，向平阳镇出发了。

刚刚来到鸡冠山下，就发现前面来了敌人。我和谭司令员急忙带队从西坡抢占山头。敌人似乎也发现了我们，呼喊着从东坡往上抢。于是，横亘在鸡西与平阳镇之间的鸡冠山，就成了两军拚搏的战场。

我军终于抢在敌人的前头占了制高点，摆开了阵势。黑压压的敌人涌上来了，二百米，一百米……我阵地顿时响起了枪声，子弹雨点般地向敌人射去，手榴弹一颗颗在敌群中爆炸，我指战员的喊杀声，同敌兵的惨叫声混作一团，震撼着山谷。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都被打退了。从拂晓一直战到天黑，敌人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狼狈逃窜了。

从此，“中央胡子队”已溃不成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场战斗之后，我军乘胜前进，顺利地攻克了平阳镇。

随后，为彻底消灭敌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鸡西游击大队奉地委指示，配合三支队和三五九旅，开赴剿匪的战场。经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至一九四七年夏，逃遁在山林里的“中央胡子队”已基本被荡平。从此，鸡冠山下的缕缕炊烟，代替了鸡冠山上的烽火；人民群众的歌声，代替了两军交战的枪炮声和杀声——鸡西完全解放了！

二十七、深山剿匪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民主联军在龙头山与宝清的“中央胡子队”展开激战，歼灭了据守龙头桥的宝清第三匪队，击毙了大队长李济民，击溃了前来增援的一、二、四、五四个匪队。宝清城的守敌闻讯而逃。从此，宝清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宝清解放后，立即组织了人民政府，建立了中共宝清县委员会，成立了人民武装——宝清游击大队。从此，在宝清县委领导下，为捍卫人民政权，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展开了斗争。

在解放宝清时，匪首俞殿昌、郑殿昌、马永胜、李德新、于福胜，以及特务头子徐百图等，先后遁入山林，干脆当了土匪，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这些残匪都是当地人，对宝清的地理民情都很熟，每消灭他们一个，往往都需付出很大代价。

“九一八”事变后，我在宝清、密山一带打了七年游击，熟悉宝清一带的山山水水。为了尽快剿灭这些残匪，东安地委决定，把我从鸡西调来宝清，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配合民主联军和三五九旅进山剿匪。

到宝清后，遵照县委的指示，我挑选了几十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了剿匪队。又从各村抽调了几十名苦大仇深的青

壮年农民，组成担架队和爬犁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开展阶级教育，同时又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我就带上队伍，拉上给养和弹药，深入到深山老林里，寻觅匪首于福胜等人的踪迹了。

于福胜，报号“福胜”，伪满时投靠了日寇；日伪垮台后，成了匪第五大队队长焦殿武的姑爷，并参加其匪队，当上了中队长。宝清龙头桥一战，他率残部遁入山林，在龙头山一带为匪。

龙头山，横亘于宝清、密山之间。一条公路从它的脊梁上穿过，沿途多是高山深谷、林木参天的险关隘口。因此，匪首于福胜常常据险设卡，拦路行抢，打家劫舍，祸害人民群众。

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带领剿匪队来到了龙头山。根据群众反映，于匪常与“郎炮”交往，我们就把“郎炮”家包围起来，然后派人叫门。

门开了。出来的不是“郎炮”，而是他的老婆。经询问获悉，近几天于匪活动在大肚子桥一带。于是我们就奔大肚子桥而去。

到大肚子桥时，已快十点钟了。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作了剿匪的宣传动员。从群众中了解到，昨天于福胜还在宝密桥上劫道。于是，我们急忙吃了午饭，经半个多小时的急行，来到了宝密桥。

到了宝密桥，于福胜已经逃走了。我们立即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群众说，于匪在村里勒索了十五两大烟土后，就沿宝密河北岸往西去了，可能回西大山他的老窝了。

这时已是掌灯时分。乡亲们听说我们是来消灭于匪的，就张罗着给我们做饭，安排住处。但同志们消灭匪患心切，哪里还顾得上吃饭？急忙坐上爬犁，沿宝清密河西进了。

大约走了十几里路，队伍来到一个山坳处。远远望去，只见山坳有一点亮光。我立刻命令同志们放慢脚步，搜索前进。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十分简陋的“马架子”。门前还有一个持枪活动的哨兵。我和同志们观察了一阵，断定是个土匪窝，就悄悄向它摸去。当我们距离“马架子”仅有五、六十米时，我小声命令身旁一个战士：“干掉他！”战士只发一枪，敌哨兵就应声倒地了。我一看打倒了哨兵，就带领战士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包围了“马架子”。

这时，屋里的几个土匪正在抽大烟，还未及下地，我战士的长枪就从窗口伸了进去，并齐声喊：

“你们被包围了，缴枪饶命！”

“我投降，你们不要枪毙我？”里边搭话了。听声音，是于福胜。

“缴了枪，政府就宽大处理！”我回答说。

于是，于匪和他的同伙把九支大枪从窗口扔了出来。但是，据群众反映，他在宝密桥上劫道时，使的是一支“撸子”。因此我说：

“于福胜，你还在顽抗，不能宽大！”

“我都把枪缴了，还顽抗什么？！”

“为什么把手枪留下？”

于福胜一听我们摸到了底细，就把“撸子”也从窗户扔了出来。

匪徒们走出屋，我命令他们在“马架子”前朝东站成一排，然后让战士一个个地把他们绑起来。当绑到于福胜时，他反问我：

“你不是说缴了枪就宽大处理吗？为什么还要绑？”

我说：“你们不是向政府投降吗？不绑上，中途跑掉一个，我怎么向政府交代？”战士上来把他绑了。

然后，用爬犁把他们送回县里，关进了监狱。还没等判处，于匪伙同大地主王二爷的孙子一起炸狱，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活捉了于福胜之后，我即率队到宝清东南山里寻找大特务头子徐百图了。

徐百图是宝清宪兵队的特务头子，是靠杀害抗日战士发迹的。

一九四三年，徐百图带领八名特务，以打袢子为掩护，在宝清东南山里设了点，专门搜集抗联活动情报，抓捕抗日人员。

这年农历正月的一天，我一支由八人组成的抗联小分队误入特务点，被徐百图用酒灌醉了，乘我战士熟睡之机，徐百图带领特务一起下手，当即用斧头砍死了四名，其余战士带伤还击，撤到了山林里。为此，徐百图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当上了宝清宪兵队特务头子。

光复后，他纠集特务分子逃进东南山为匪。进山采集山货和打猎的农民，几次在山林里撞上他，都被洗劫一空。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我派人装扮成猎人，背上干粮，深入到宝清东南山里，侦察徐百图的踪影。

我侦察员在山林高处搭起“趟子房”，垒起锅灶，烟筒整天冒着烟，意在招引敌人。白天，他们以狩猎为名，在山林里四处奔走；晚上，回到住处，研究分析了解的情况。

一天早饭后，一个猎民装束的人朝“趟子房”走来了。他进了屋就掏出手枪威胁说：

“有什么吃的，赶快拿出来，免得丢了命！”

这个人就是徐百图。我侦察员怀中有枪，本来可以就地把他抓住。但为了摸清其巢穴，并将其匪众一网打尽，我侦察员捺着性子跟他说：

“何必这样呢！你有出路，也不至于落得这般天地；我们有办法，也不愿到这里挨冷受冻。亲不亲，一个山上的人嘛，收起枪，请喝酒！”我侦察员留他吃喝一顿，又给他背了些粮食送下山。当来到一条山谷的沟口时，他说什么也不让送了。他接过米袋子，说了声“后会有期”，就朝沟里走去了。

一天下午，我按侦察员报告的情况，带队来到了徐匪进入的山谷。谷底，清澈的溪水在冰缝里淌着。我们沿溪向山里进行，掌灯时分，来到了一个小沟汊的拐弯处，忽然发现山坡上有光亮，我就带着战士们摸过去了。原来，徐百图的匪窝就在这里。

一间小屋，土炕上点着一盏油灯。灯下，睡着三个猎民打扮的人。我侦察员一眼就认出其中有徐百图。我布置好了警戒，悄悄撬开门，同一名战士来到了徐百图的炕前。我用枪触了触徐百图的脑袋说：“起来吧，县里来人接你了！”徐百图揉了揉眼睛，坐起来了，其他两个特务听到声音，也



醒了。他们一看地下站着两个拿枪的人，伸手就到枕头底下去摸枪。我战士嘿嘿地笑了，说了声：“别找了，在这里！”这三个家伙一看枪已被抄在人民战士手中，傻眼了。于是，我们用条绳把这三个家伙“串连”起来。

徐百图缚手就擒了，我对他说：

“我们到这里，不是来要你的命，而是为的枪和大烟土。你要是都交出来，就能争取政府宽大处理！”

徐百图已是落网之鱼，自知死在眼前了。但他一听说可

以争取宽大处理，就似乎看到了活命的希望。于是，他说出了存放大烟土和藏枪的地方。

当晚，按着徐百图的交代，我们来到了一个黑瞎子洞，取出了一部分枪支。回到县里，在伪县公署门外的“粮仓”底下，又起出了三十多条枪和几百两大烟土。然后，把徐百图等三人投进了监狱。因为徐匪罪恶累累，人民纷纷要求严惩，在镇反时被处决了。

生擒了徐百图后，我们随即转向东北山区，追剿匪首马永胜。

伪满时，马永胜先后担任过伪宝清警察署署长、特务搜查班班长、司法主任等职，是个双手沾满抗日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九三九年，马匪曾率二十多名武装警察进山“讨伐”，打死我抗联战士七名，夺去大枪七支，子弹四百多发。为此，他受到了日寇的重用。

光复后，马永胜又投靠了谢文东，当上了国民党先遣军少校大队长。在我三江人民自治军来宝清改编其匪队时，马匪同俞殿昌共同策划了武装暴乱，打死我宝清大同盟副会长赵宇慈等十一人。

宝清解放时，马匪携其家眷，率其残部，窜入宝清东北山林为匪，搅闹得大和镇一带人民不得安宁。

我率领剿匪队经一天一宿的急行，就到了大和镇。为备足进山用的粮草，我决定在大和镇休整三天。

一说休整，同志们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有的在抓紧时间掌鞋，有的在缝补被柴草挂扯破了的衣帽，有的在帮助老乡为队伍准备干粮。大和镇的人民群众听说我们要进

山剿匪，就杀猪宰羊，碾米磨面，犒劳剿匪队的同志们。整个大和镇，就象过大年似的。

就在这时，从南山里下来三个猎人，听说我们是来剿匪的，就找上门来，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他们在南山里打了一冬猎，所获几张皮子，全被马永胜匪徒抢走了。经向当地政府了解，这三个人都是贫苦百姓。我又进一步向他们打听了马匪的住地、人数、装备等情况，最后问：

“我们马上去收拾这伙匪徒，你们敢不敢带路？”

三个猎人一听说去打马永胜，眼里顿时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异口同声地说：“只要能消灭这伙强盗，就是豁出命也甘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翻过几座山，来到了一个山谷。这时，天已黑了。据向导说，马匪就住在这条山沟里。于是，我们谨慎地搜寻着前进。

我们正在悄悄地向山里移动着，突然山坡上打来两枪。事后才知道，我们去搜山时，马匪的父亲正患痢疾。当他从地窨子里爬出来大便时，听到山下有动静，就急忙打了两枪，意在给儿子们报信。可是这两枪，却给我们指明了目标。我即刻带队向响枪处包抄过去。

马永声、马永福及其同伙“沈大巴掌”，听到枪声后，断定山下有情况，迅即爬出地窨子，进入山林。唯有马永胜的父亲据守在地窨子里。我命令战士们齐声喊话，地窨子里仍往外打枪。于是我们就集中火力向地窨子射击。待地窨子里断了枪声我们冲进去时，马匪的父亲已经断了气，只有马匪的老婆躲在地窨子的一个角落里。我们问她马匪的去向，

她说不知道。战士们搜查到天明，也没见到马匪的踪影。原来，马永胜一伙在山林里一听枪声密集，知道来抓他们了，就往吉林省九台县逃去。在逃跑途中，马匪又打死了几个围追堵截他的民兵，然后便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到了九台、敦化等地，混进了县直机关，担任了狩猎队队长、会计、旅馆经理等职。一九五二年终被宝清公安机关抓获，处以极刑。

捣毁了马匪的巢穴后，除留少部分兵力继续寻踪马匪的去向外，我即率主力西插索伦岗，清剿李德新匪队。

李德新，原任伪宝清县森林警察大队长，与抗日军为敌十几年。光复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先遣军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宝清解放时，李率残部遁入索伦岗为匪。

索伦岗，原是无人定居的不毛之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拓团到了这里，才建起了围子。索伦河从东向西流经岗下，两岸长满了柳毛丛。经侦察获悉，李德新匪队就驻在索伦河岸边的一个鱼亮子房里。亮子房周围，东北两面长满了柳毛丛，西面，是长满塔头草（墩草）的大草甸子。草甸子尽头，与一条大沟塘子相连。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匪巢。

农历十一月份的一天早晨，我率队来到了李德新匪队驻地。观察了一阵后，我作了如下部署：一班，进驻亮子房北的柳毛丛，负责阻击逃跑之敌；二班，潜入房东边的柳毛丛，以断敌人东逃之路；我带三班发起正面攻击；西面不围，以放敌出营务求全歼。部署完了，各自进入阵地。我带着炮手出身的战士翟凤阁摸到亮子房跟前，就近观察敌情。

天刚蒙蒙亮。李德新的匪队还在热炕上死睡，门窗关得严严的。我俩聚精会神地观望着眼前这座小房。忽然发现房顶上有人在晃动。细一看，原来是个哨兵。翟凤阁一枪就把哨兵打掉了。随即，我率队发起攻击。枪声爆响，子弹象流星似的向敌巢飞去。

李德新被枪声惊醒了，慌忙命令部下出击。匪徒们拖着大枪往外跑，有的还没出门，就丧了命；有的只穿了一件衬衣，被打死在窗台上；有的光着脚，被钉死在炕沿上。李德新带着队伍从后门冲出来，妄图北撤，被我一班的火力挡住了，折向东边，又遭我二班的痛击，急忙往回卷。这时，我率三班冲上来。李匪一看大势不好，率队进了大草甸子。敌人完全按我们的部署走了，我就将三股兵力合在一起，集中向大草甸子射击，同时一齐呼喊着"缴枪不杀！"但这些匪徒自知罪恶深重，不肯放下武器，就在塔头草上跳来跳去。我战士见此情景风趣地说：

"同志们，李大队长给我们竖起活靶子，可要打出个水平来！"

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射击着，敌人一个个被撂倒在大草甸子上。只有李德新带着几个人逃进了与大草甸子相连的沟塘子。我一看李匪逃了，就率队绕道去追击。

当我追进沟塘子时，李匪正在一个山坡上凭险据守。我见地势对我不利，就一面打着，牵制敌人；一面分出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李匪的侧面与后面。三面一起发起攻击，匪众顿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李德新在败退中一时找不到掩体，就单腿跪在地上向我射击。我一看笑了起来，我在掩

体后边，你跪在明处，这不是请死吗？我一甩匣枪，这个与抗日军为敌十几年的匪首，就呜呼哀哉了！其余匪众，也无一脱逃人民战士对他们的惩罚。

当我打扫完了战场，清点完了战利品时，太阳已从东山上露出了笑脸。我整顿了队伍，命令爬犁队拉上战利品，同志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踏上了归程。旭日照耀着山路，红旗在白雪皑皑的林间飘扬，战士们的歌声在山谷间回响：

号声呜呜好似催战鼓，
风云变色杀气冲霄战士如猛虎，
手提敌头征衣血涂糊，
白山黑水我作主，
任迈步，齐欢呼！(注)

遁入宝清山林的其他匪首，如俞殿昌、焦殿武、李世玉等，也分别被民主联军和三五九旅消灭。至一九四七年春，宝清的匪徒基本被荡平了。

历经抗日烽火洗礼的完达山区，从此又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注：此歌为抗战时期的《凯旋歌》第三段。